炎黄春秋

第10期
2015年

邵燕祥等：耀邦百年纪念

超越"五阶段论"

我参加饶漱石专案组的遭遇

王洪文的升沉

张思之：民国时代的律师伦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特 稿

1 胡耀邦人格与政治道德 …… 邵燕祥
5 人心为上 …… 陈丹晨
7 走在历史最前列的政治家 …… 杜 高
9 政治文明的新起点 …… 王学泰
12 青山有幸埋忠骨 …… 袁 鹰

春秋笔

16 曾彦修来信类抄 …… 何 方 整理
23 “八老”与1980年代政治格局 …… 徐庆全
29 “红色词语”的勃兴和流变 …… 钱 钢
36 邓小平“8·18”讲话的现实意义 …… 陈 剑

沉思录

40 超越“五阶段论” …… 杨善准
42 反腐败治本一策 …… 吴 敏

人物志

45 王猛与奥运会 …… 俞 虎 苏 南
50 王洪文的升沉 …… 李 逊

往事录

59 《雪白血红》蒙难记 …… 刘家驹
63 山西补选四届人大代表风波 …… 石名岗 李 辅
65 民国时代的律师伦理 …… 张思之
67 中国律师的本土传统 …… 傅国涌

亲历记

71 我参加饶漱石专案组的遭遇 …… 陈 虹
76 亲历延安抢救运动 …… 杜 惠
81 随周总理陪同外宾参观二三事 …… 华方治
82 一次难忘的外调 …… 于峰华

品书斋

84 盲从与利益考量——读《我们忏悔》 …… 陶东风

海外事

86 苏军的性暴行与斯大林的态度 …… 李建军

编读窗

93 对《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的质疑和辩疑

顾 问（参加社委会）
杜润生 李 锐 何 方 郭道晖
江 平 陶斯亮 胡德华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王海光 方 宁 方 实
卢跃刚 冯其庸 曲润海 苏双碧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大同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 吴 象
吴明瑜 沈志华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北英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陆 德 陈 敏 邵燕祥 金冲及
周瑞金 赵德润 胡冀燕 钟沛璋
保育钧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徐庆全（副召集人） 贾磊磊 钱理群
徐小岩 凌 云 高 放 高尚全
资中筠 展 江 萧蔚彬 章诒和
董 健 韩 钢 鲁 谆 雷 颐
魏久明

社委会 杜导正（主任） 徐庆全（副主任）
李 晨 胡竞成

总编辑 杜导正
副总编辑 徐庆全（常务）
执行主编 王彦君 冯立三 丁 东
杜明明
网络主编 王海印
编辑室主任 赵凡响

社 长 杜导正
副社长 徐庆全（常务） 李 晨
秘书长 杜明明

总经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行部主任 孔 屏
办公室主任 王海印

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l@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10元 **全年定价** 120元

终审 徐庆全　执行主编 丁 东　校对 乐 彤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耀 邦 百 年

为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2015年8月14日本刊在北京召开了文学艺术界人士座谈会。邵燕祥、陈丹晨、杜高、王学泰等在会上先后发言，袁鹰提交了书面发言。现予发表，以飨读者。——编者

胡耀邦人格与政治道德

○ 邵燕祥

我跟胡耀邦同志没有私人过从，甚至没有近距离接触过。但什么时候想起他，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之感。

让一个只远远地看见他的人，对他感到亲切，在他逝世后二十六七年，越发感到他仿佛仍在身边一样亲切——这对于一个世俗所谓"大人物"，我以为并不容易。

那么这种亲切之感从何而来？

从1949年往后数，我只在1955年到1957年这两三年跟他有过某种交集，但也是间接的，不过那一段生活经历对我个人影响深远，是忘不了的。

1955年9月，团中央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由胡耀邦主持。我被提名参加。在一种荣誉感的激励下，写了献给大会的《青春进行曲》。一开头就呼应了当年夏天响应团中央胡耀邦号召开往黑龙江萝北的第一支"青年垦荒队"："不是一阵风/刮跑了/荒原的宿草，/是我们/在黑土上/耕开深深的犁沟"；又写到"这不是/山岘上的云雾/返照的幻影，/是一座青年城，/我们亲手所兴建"的愿景。耀邦要求我们"做伟大祖国的忠实儿女"，也正是我衷心的志愿；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酝酿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耀邦也认为团员们应该努力成为共产主义者。1956年，我就写了那首"当我十四岁的时候/光荣地加入了青年团"，并且誓要让"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我感到了跟耀邦的默契，好像我们之间的心真是相通了似的。这首歌由老音乐家李焕之同志谱曲传唱一时。耀邦该也听过吧。

到这时为止，好像一切还都是风和日丽。再往后事情就逐渐复杂起来了。

写"辣椒"式讽刺诗的后果严重

1956年，《中国青年报》在扩版时开辟了一个讽刺的版面，题名"辣椒"，虽与前两年中央一级党报去苏联学习"先进经验"有关，却也是经耀邦拍板的，符合那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随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和学术工作方针，对各项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形势。一时思潮中，"独立思考"和"干预生活"之声大震。我应"辣椒"编者舒展之约，一年中在那里发表了三首讽刺诗。与此同时，我还配合团的思想教育工作中提出的，不要把青年们思想活泼、爱提问题当作个人主义缺点，写了一首"团委书记心肠好，老怕我们走路会跌倒"。这些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也被指斥为"右派言论"。几十年后冷静回顾，当时借鉴苏联报刊上的讽刺形式，有一种长篇专访式的"特写"，揭阴暗面，点名批判；由于苏联体制下党报被授予自上而下的批评权，几乎不容置辩，难免流于武断。我们有时不免是教条地学其皮毛，我就不大讲究批评的艺术，讽刺时简单直露，忽视效果。授大批判者以柄，该由自己负责，不能诿过于《中青报》编者。何况"他们"若想抓你，你没

邵燕祥

写讽刺诗，照样可以从别处找碴儿。

说实在话，因为“辣椒”版定位在批评讽刺，我们才一门心思求辛辣，但真的并无意于“拆墙”“扒锅”。就在1956年年末，也正是“辣椒”的主编舒展传达编委吴一铿的意图，把我和另一位编辑沈仁康叫到一起，当场赶写一大组歌颂建设成就、鼓舞建设热情的诗，配上画，组成1957年元旦的一块版，即如期见报的《1957，好！》，据说读者反响不错。可惜过了半年多在反右派高潮中，连延安来的吴一铿大姐亦未能幸免，光是她领导下的“辣椒”，已足构陷入罪，遑论其他！后来听说总编辑钟沛璋以下全报社划的右派远远超过“百分之五”的控制数字！

还在刚过年时，舒展就告诉我，元旦那一天《中青报》的社论是在耀邦直接创意下写出的。迎接1957年，社论历数了1917年、1927年、1937年、1947年这几个历史上与中国命运攸关的“逢七之年”，文章写得富于文采，突破了“应景文章”的八股套路。这不仅是个文风问题，还透露了耀邦启发大家多读书、了解历史，并从历史看未来的想法。尽管当时人们读历史，也离不开受限多多的书目，但一旦养成读书的习惯，迟早是会生成对照之心，怀疑之念，以至追问之志，也就逐步接近真相和真理了吧。由此我也知道耀邦从小爱读书，读书，继之以思考和写作，成为他毕生的习惯性需要。渴求知识，追求真理，这是他区别于许多身居高位颐指气使的“死官僚”的根本点之一。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

在那个动荡多事的1956年，还有两件由思想文化及于政治的往事难忘。

苏联有一位女作家，戈·尼古拉耶娃，曾以长篇小说《收获》，跟丁玲等一起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并受到中国读者关注。后来她又写了《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新毕业的女生娜斯嘉来到工作岗位，跟原来官僚化的秩序、保守怠惰的作风格格不入，她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起来斗争。1956年年初由草婴译为中文后，我们的团中央号召全体团员向娜斯嘉学习，在发行三百万份的《中国青年》杂志分两期转载全文。这部小说是“干预生活”之作，在苏联适应了赫鲁晓夫新政为改变斯大林时期农业长期落后面貌，而力求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基层领导的政治要求。我想耀邦则是以他政治家的眼光，认为正可借助于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来激发我国团员和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官僚主义的勇气。事实上“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和尼古拉耶娃小说的影响，在当时我国文学界也得到热烈的响应。产生了后来被批判为“毒草”的，如《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作品。“干预生活”在苏联本来是属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内的思潮和口号，到中国的政治运动中，转身沦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其实是历史的误会，其中或亦包含着官僚保守势力无意的误读、有意的曲解。但历史地看，当时耀邦和团中央对“干预生活”的娜斯嘉的支持和提倡，指向反对腐蚀党和政府肌体的官僚主义，是具有前瞻意义的政治行为。只是由于一年后国内政治风云莫测，不仅诸多敢于独立思考，写了“干预生活”作品的中青年作家成了右派，许多天真的“学习娜斯嘉”的青年人同样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是耀邦始料不及的，也是他虽痛心却无可救助无法挽回的事。因为中国在更大范围深陷“左”倾悲剧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

围绕着林希翎的是是非非

还是这个尼古拉耶娃，1955年写了一篇论

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译介到中国，也一度在文学界成为关注的热点。这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法律系女生程海果，写了一篇商榷文章，以“林希翎”笔名发表，引起注意。这个年轻的来自海军的林希翎，不能适应有大量年长的调干生同学的情境，他们对她也有不适应的感觉。互不相容，又缺乏沟通，在生活检讨会上不断要求林希翎检讨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等等，以致矛盾激化。有人化名写了一篇《灵魂深处的脓疮》，用近乎仇恨的笔调对林加以“揭发”。此文竟由《中青报》刊发了。我当时还没有读林的论文，但看了这篇东西，直觉很不靠谱，以为带着挟嫌诬枉的味道。几天以后，在同一版面同一位置上刊发了《文艺报》编辑涂光群一篇匡正的文章，认为对青年不可采取这样恶劣的态度。后来我知道前一篇文章发表后，耀邦就在第一时间批评了报社，要求他们尽快做出补救。他多半是首先着眼于一张团报应该如何进行批评，这关系到青年团如何进行思想教育，如何指引青年之间健康地交往。听说他后来也像吴玉章校长等其他革命前辈一样，接待过林希翎的来访，理所当然地既给予安抚，也批评了她的缺点，鼓励她继续努力，健康成长。

这年年底，我接到林希翎寄来油印的“控诉书”，控诉她所在系党总支对她的迫害，并说要诉诸法律云云。我复信叫她注意不要让激愤损毁健康，也不要被横暴挫折了信念，并建议她把此件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监委”各一份。此事我没有进一步介入，但我知道，林是学法律的，即使她告到法院，这也属于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至于我让她向毛主席等反映，更是合情合理的建议了。

而到了反右派斗争中，由于林希翎已因她的言论被认定为大学生中的极右派，我在她发表“右派言论”半年前写给她的信，却也被谥为“唆使右派分子林希翎向毛主席、党中央进攻”了。

反右派前期，耀邦恰恰出国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对国内事无法过问，两个月后才回国。这时他所能得到的有关信息，包括林希翎的动态和遭遇，一定比我多得多。林希翎事会对他有所困扰，他也确因前一年对林的态度而遭物议。但以他三十年的党内斗争经验，在种种因素的纠结面前，其心情恐怕不是像我止于“无可奈何”，而要复杂得多吧。

这是50年代那两三年冷暖阴晴，风雨雷电，变幻不定的政治大气象下，我被卷入了耀邦也曾介入的一些不大也不小的事件，在不同位置上的特殊交集。

耀邦主导了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两大壮举

反右派斗争把我贬为异类，退出了正常的政治生活。文革初起，只听说耀邦等在团中央遭到侮辱性的残酷批斗，又听说下放到河南干校监督劳动，语焉不详，但其情其景可以想见。

1977年至1978年间，耀邦重新回到我的视野，我愿意说他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这一次是更刻骨铭心的精神上的交集了。

当时耀邦先后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他的动向成为人们，包括我们这些沦为“异类”二十年者关注和传说的热点。当时一片废墟，“百废待兴”，而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巨大的魄力，开始平反了上亿人的冤假错案，并揭开思想解放的序幕。这既关系到如何评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以至这个党的一段历史，同时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历史积案和未来出路，我们的命运就这样同国家、民族以至执政党的命运，首先是政治决策者每一动作密切联系到一起了。同志间竞相传抄，奔走相告，庆幸或将有一个新的开始。

耀邦策划并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与实施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包括给“地富反坏右”摘帽子）这两项壮举，应该用一句常常挂在人们口头却未必都那么实在的话，叫“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用在他的身上，我以为恰如其分。我是亲历者，我知道这两件天大的大事，惊天地而泣鬼神，它不仅涉及上千万个家庭、上亿人口的生死祸福毁誉，而且涉及全民重审历史，重判真理，解放思想，开辟了走向精神自由之路。当然，没有人会把这旷古功勋归之于耀邦一人，但若没有他在其中起主导作用，集思广益，慎思明辨，敢于担当，也几乎很难想象会在短短几年内趁热打铁，竟此全功。

这些已有许多参与实际工作的同志和专家

学者记述和研究，后来在80年代耀邦对各方面工作宵旰忧劳，更广为人知。我也和文艺界内外的知识分子一起，历经思想文化领域“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诸战役，历经全局性改革开放思潮和实践与反改革开放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曲折反复，复杂难辨，我们从耀邦公开的言论和决策中，体验他的思想脉络，他的人文关怀，以至他的困难重重，感同身受。

耀邦关怀和保护多灾多难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也密切注意他的遭际。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两大难关闯过来了，他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了。但没想到，耀邦每走一步都遇到阻力，高层内情不甚了了，就我们耳目所及，就有党内的老作家看不起他，用十分不屑的话语贬损他，还有党外的老作家，竟挑剔到他讲话时的形体动作。凡此种种，折射了他在政治上被排挤的困境。当然，主要的反对势力在党内高层。然而公平地说，正是以耀邦为主导的党内健康力量，通过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讨论，出亿万斯民于“水火”，不仅解其“倒悬”，并且登之“衽席”，使大家从精神上思想上看到了解放的曙光。与此同时，也从道义上挽救了濒于政治破产的这个党，至少在8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恢复对中共的信任，对党寄予希望，是与耀邦等许多同志的政绩以至个人魅力分不开的。而偏偏是身沾平反之惠的某些人，居然在其后的政争直到所谓“生活会”中反咬一口，令人不能不想到《农夫与蛇》的寓言。后来我看到满妹说在父亲病危时她脑子里也浮现了《农夫与蛇》，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耀邦的一生堪称政治道德的典范

就个人经历来看，耀邦从几乎被冤杀的“红小鬼”，成长为一个大国、大党开明的奋发有为的领导人，甚至可以说带有传奇色彩。但是这一切竟以悲剧的结局而落幕。这是偶然的吗？

从1987年年初耀邦被罢黜，两年多以后凄然逝世，至今已二十六个年头了，那时落生的孩子，快到“三十而立”之年。人们对世事的认知也人各不同地有了深化。据我个人掌握的有限但可信的资讯，在今日中国，在几乎人人都在感叹道德滑坡，甚至认为整个社会形成的道德沦丧标志着社会的溃败之际，通观耀邦革命的一生，突显了其政治道德的崇高。

在一个不太短的时期以来，在公开的舆论媒体上，人们谈论社会道德状况时，即使不说是讳言政治道德，也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政治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中的领先地位，因为，“统治阶级的文化就是统治的文化”，前者决定了后者。在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是“泛政治”的国度，政治道德，首先是政治主导层的道德面貌，尤其是他们的政治道德的水平，不仅关乎治乱，而且影响人心，借用一句古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是一个绝大的话题。

这个话题的提出，对这方面典范人物众口称赞，实际上会形成对某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毫无道德可言的人的道德压力。因此在他们心目中，耀邦一直被视作政争的对手即所谓政敌。这些人，以及继承他们衣钵的若干人，其政治行为和私人行为，都是既经不起传统道德的检验，也经不起革命阵营半个多世纪以来标榜的“无产阶级道德”的检验，他们已不仅是什么习见的不讲诚信的问题，而是言行不一、心口不一，彻头彻尾的两面派，甚至是抛掉了假面的公然无耻。他们竟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振振有词地矢口否认世界上有古今中外普遍的价值标准。这样，他们就得以胡作非为，肆意妄为，连历史上任何社会任何宗教任何族群公认的普世道德信条和通例中，最起码的“勿盗窃”“勿欺骗”戒律都置之不顾，把公权力化为私人占有，把国库化为私家保险箱，这还不是明目张胆的“窃国者侯”吗？当然，对他们已经不是谈论道德尺度的问题，而是应该绳之以法了。

耀邦一生的言行，如日月昭然于天地间，他的局限性和缺点失误也如日月之蚀，无须避讳，他有尽多可以让我们长此怀念，并以之为镜，从他取法、获得启发之处。这是耀邦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和道德遗产。

中国的百年历史，耀邦的生平阅历，他本人的自励自律，他与同志和人民群众的双向互动影响，铸成了独一无二的胡耀邦人格。不管各样人们怎样评论他，都不重要。因为真实的他早已成为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了。

（作者为诗人、杂文家）

人心为上

○　陈丹晨

"四人帮"被捕后的第六天，胡耀邦虽赋闲在家，却对国事已有深谋远虑，让叶选宁转告他父亲叶剑英以及华国锋，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他强调"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胡耀邦为什么那么重视"人心"，把"人心"看作所有事情的支撑点、核心的核心。因为共产党是历来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最终目标就是"解放全人类"。面对文革造成的浩劫，冤狱遍地，人民正遭受巨大的痛苦，他首先想到的是老百姓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困境和愿望，他们未来的命运。一切应从此出发，考虑问题，解决问题。这不仅仅是一种顺乎民心民意的政治谋划，而是怀着深厚的同情和睿智的远见，以及他历来对人的生命的重视，才提出这样的思想。这在当时党内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创见，他的思想是前沿先行的，他是党内先进思想文化的代表。进入新世纪后提出来的"以人为本"，正是承续着胡耀邦的"人心为上"思想而来的。

文革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宣部部长、党中央秘书长、主席、总书记等职务，无论是在工作还是讲话中，都充分表现了他的"人心为上"思想。王若水曾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遭到权威人士的批判，指责为"自由化"思想，说应该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试想一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是人的生活吗？离开了人，还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样简单的逻辑却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被扭曲，歪理大行其道；也正因为这样才会有文革把人变成鬼，把人不当人。胡耀邦的"人心为上"思想通过实际工作，特别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把鬼变成了人，使得上亿的人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得到应有的生存和发展，尊严和自由，几乎是中外历史上少见的人数如此众多的冤案大平反。真是功德无量！

从土改开始，每次政治运动都会制造出一大批阶级敌人。历次政治运动成了批量制造阶级敌人的机器，吞噬无数生命的怪兽。说起来每次运动把揪斗对象限制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实际上即使百分之一也足以骇人听闻。到了文革前，公安部明文规定的阶级敌人就已有所谓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千万人，株连其亲属就有一、二亿人，当时全国八亿人口，这是多大的比例！其中右派，据毛泽东1968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小学教员中百分之十是右派、反革命，占全部右派的三分之一。文革开始又增加了"敌(人)、特(务)、叛(徒)"三类。轮到第九类就应是中央文件里明确规定文革重点打击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声称"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几乎全国各级大小领导干部多数受到冲击，都成敌人有点说不过去，就又创造了一个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算敌人。结果到底谁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定刘少奇这个"头号走资派"时都觉得难以服众，于是再给他加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第九类还有一个对象，就是知识分子，因此对他们蔑称为"臭老九"。但是把知识分子都列为资产阶级，作为全面专政对象，好像也说不过去，于是领袖又表示开明，说"老九不能走"。至于资产阶级，一直被认为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多数的政治运动目标都是声称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是敌是友也是变幻莫测。这种任性制造阶级敌人的做法随心所欲，如同儿戏，但是被打击的人却掉入苦难的深渊。这样一来，党和政府就要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至暴力对付这个庞大的阶级敌人群，或镇压，或揪斗，或改造，或内控，或防范。他们的家属和子孙也因此有了"原罪"，世世代代烙上了家庭出身的"金印"，而受到歧视，上学、就业、婚姻、升职、参与政治活动等等都不能得到一般人的正常待遇；每个人档案里的履历表有两栏重要的内容："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是鉴别此人可被使用和信任程度的标识。每逢新的运动发生时，总是无例外成为最先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活靶子遭到批

陈丹晨

斗。文革前，北京市就表示要打造成纯洁的水晶板，所有阶级敌人都要迁出本市。文化部文件说要在机关里“犁庭扫院”，把所有认为有问题的人彻底处理，集中起来审查。这些想法做法到了文革时，特别是1966年的“红八月”，就由红卫兵更激烈地完成了，“打砸抢抄”、驱赶遣返五类分子出北京回原籍。

值得深思的是，一般老百姓受到蛊惑，也普遍接受了这种偏见，对“阶级敌人”轻则避之不及，重则“共讨之”“共诛之”。小说、影剧等文艺作品描写坏人一定是出身地富或是暗藏的阶级敌人。总之，他们成了“恶”“坏”的特定符号。记得文革结束后，看到过一部东德电影，里面就有那些普通民众包括老大妈成了施虐者，在街上随意辱骂犹太人是“犹太猪”，让犹太人在地上爬、学狗叫等等肆意虐待的场面。这种场面在文革期间在中国大量重演。其结果就是造成社会族群的撕裂和仇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排斥、歧视和迫害。南非曾经有过黑白族群撕裂，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形成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严重族群撕裂。中国这种政治歧视，也把相当一部分人排除在正常社会之外，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成了一种贱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家庭成员中出了一个五类分子，而全家倒霉。

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族群撕裂，制造歧视和仇恨，加剧社会矛盾，人心动荡，很难想象国家还能够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更不必说兴旺发达了。胡耀邦正是看到了这点，上任伊始就积极解决文革中的冤案，然后又提出解决“右派”问题，接着提出解决“地富”问题，倡导、主持和推动了大规模平反活动。破除积累了二三十年的陈规陋见，阻力重重。有些人强调毛泽东钦定的案子不能翻；有些人积极为在文革中受了委屈的老干部平反，但对文革前的冤案却坚持不能翻。文艺界有一位老领导多次讲话，历数文革前几次大批判和政治运动都是毛主席革命红线贯穿始终，都是正确的，最多略有扩大化。即使平反以后，受害者仍被视为异己另类。

更有甚者，七八十年代之交，人们破除迷信，进行历史反思，对文革以至伟大领袖提出质疑，有些高层领导就认为形势颇像五七年右派进攻那样，甚至还要厉害，说希望不要迫使中央再来一次反右派。胡耀邦进行这样大的平反工作，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在思想上、政治上排除万难，克服种种阻力，才使亿万民众回到人的正常生活中来，享受人的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旧的思维习惯直到现在也未绝迹，仍还有些人对待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某些不同意见或新的思想观点，就似见到敌人那样惶惶然，动辄喊着要“亮剑”，要揪人“严惩”，又想搞阶级斗争，制造阶级敌人。他们不懂，大家都是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共同享受着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才是现代文明人。

早在1980年2月《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胡耀邦就曾激动地说：“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这对今天还是抱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陈腐的敌对思维的人，仍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共产党历来认为自己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军队是“人民解放军”，成立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政府门前都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文艺界的刊物标示“人民文学”“人民音乐”。“解放”“人民”是两个关键词。因此不能想象在解放以后人民中间竟能制造出那么多的阶级敌人，占着那么大的比例。难怪这些被打成“阶级敌人”的人群在得到平反

回归社会后称之为第二次“解放”。

胡耀邦的“人心为上”思想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热爱，对遭受灾难和不幸的人们的巨大同情。他以最大的热情献身于人的解放，人的正当权利的维护，人的自由创造和发展，人心的张扬。“二战”以后，人们有感于战争对于人的生命的大规模毁灭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人道主义思潮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突出表现在对人权、人的生命的尊重，看作最为重要和至高无上的；对于战争和暴力都是反对和谴责的，提倡和平对话等政治手段解决矛盾。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文思想史上新的进步标志。胡耀邦正是共产党内具有这样先进思想文化的代表。他立德、立功、立言，将永远载入史册。

（作者为《文艺报》原副主编、文学评论家、传记作家）

走在历史最前列的政治家

○　杜　高

他结束了我的苦难

我今年85岁。1930年我出生在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7岁。父亲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我是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的一代人。时代

杜　高

环境和家庭影响，使我从小就接受左翼文化和进步思潮的熏陶，12岁我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演剧活动。意想不到的是，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风暴，改变了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命运。因为我当时和胡风赏识的作家路翎同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很敬重他，路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公安部逮捕，我和几个朋友立即被指控组织反革命小集团，配合胡风集团向党进攻。我们被当作“肃反”对象隔离审查。路翎是一位文学天才，他有优良的品格。1952年，我们的待遇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路翎的工资被评为每月200多元，在当时很高。他主动向组织上退还工资，只留下20元生活费，他说每月还有一些稿费收入，生活够用了。每当我看到今天的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员，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路翎，这样一个人居然被打成“人民公敌”，在监狱里被逼得精神错乱。实在不公！

就在我被禁闭的日子里，另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剧作家吴祖光，为我们鸣不平，他认为，把一群可爱的青年人当作反革命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没想到，他这些话已经触动了最高权力的威严。

1957年，凡是对“肃反”不满的人，都被打成右派。党再三动员吴祖光提意见，他诚恳地说了一些话，结果被打成戏剧电影界头号右派分子，灾难再一次降到了我和几个朋友头上，我们都被划入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遭到声讨和批判。

1958年4月，我和青年剧作家汪明被关进半步桥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12年的劳动教养生涯，汪明惨死于劳改农场。文革开始后，我们的罪名又升级了，吴祖光再次被批斗，《人民日报》发表大批判文章，“二流堂”“小家族”的后台老板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变成国家主席刘少奇了。

1969年12月发布1号战备令，我由北京市公安局押送回原籍长沙，交由群众监督，在街道劳动。

直到1978年9月，中共中央“五十五号文件”发到全国，我这个还在街道上做工的右派分子，听到一声震动魂魄的春雷。1979年春天来临，我果然接到中国剧协的通知，他们已帮我办好户口迁移手续，我可以立即回京了。

我一无所有，夹着一个铺盖卷，悲喜交集地回到离别了24年的戏剧工作岗位。我已经从一

个有生气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50岁的小老头了。当我走进吴祖光的家，握着瘫痪的新凤霞大嫂颤抖的手，拥抱着还健在的老朋友们，我们放声地痛哭了起来。

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1/4个世纪里的遭遇。它埋葬了我的全部青春年华。

我那时还全然不知道为把我们从黑暗的深渊里救出来，一个伟大的人物进行了多么英勇无私的斗争。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我读到难友戴煌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后，才听到了耀邦同志那“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惊天动地的声音，我的心震撼了。当我读到在耀邦同志的促进下，为吴祖光、为我、为“二流堂”的人们平反改正的叙述时，我禁不住感动得泪流满面。可惜这时，耀邦同志已过早地离世了。

走在历史的最前列

在以个人迷信为特征的专制时代终结，改革开放新时代开启的重大转折时期，胡耀邦是走在历史最前列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坚定地认为，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从精神上解放亿万中国人民，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必须从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彻底的拨乱反正。他在思想理论上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回归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上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他顶住压力，首先平反了1976年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给全国人民以巨大政治鼓舞，接着为在文革中蒙冤的老干部们一个个恢复名誉，先后平反了彭德怀案、陶铸案、六十一人叛徒案、二月逆流案……这一连串的重大冤案的平反，有力地伸张了正义。而更艰难，更具广泛社会震撼力的，是为55万个右派分子改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政治大解放和精神大解放，它的历史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对于中国文艺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平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和吴祖光“二流堂”右派集团案的平反改正，产生了几乎是颠覆性的影响，推动了更多冤假错案的平反，改变了整个文艺界的政治面貌。与此同时，耀邦更大刀阔斧地领导了全国各个领域的冤案平反，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国民党时期军政人员遗留下来的旧案，更为地主富农分子全体摘帽，宣告这个特殊的群体回到人民当中，不再受政治歧视。今天回顾历史，完成这么艰巨复杂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消除历史积怨的工作，都是为着把中国推向一个和谐民主的现代公民社会的重大举措。这需要有多么远大的政治视野和多么深邃的政治见识，多么宽阔的政治胸襟和多么宏大的政治魄力，需要有一颗多么深沉的热爱人民的崇高心灵。唯有胡耀邦，这位14岁就献身革命，经受烈火锤炼的勇士，才有承担这个历史重担的胆识，完成这个重大历史使命的魄力。以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崇高的责任感，成为终结一个旧时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历史英雄。

探索领导文艺的新途径

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胡耀邦是一个最具有人性魅力和个性魅力，而使人永远难忘的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他并听他讲话，是在1952年8月。那时他刚调来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那时从朝鲜前线回来，留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青年艺术剧院直属团中央领导，院长由团中央书记廖承志兼任。8月里的一天下午，胡耀邦忽然到剧院来了。事先也没有通告，也没有布置开欢迎会。只听见院部的秘书伍平扯着嗓子喊：“大家快到院部小礼堂来呀，团中央的领导来看我们啦！”剧院的年轻人从楼上楼下纷纷跑进小礼堂，围着耀邦同志，他笑嘻嘻，和大家亲热地拉着手。他哪像一个大首长呀，大家鼓掌欢迎他，伍平搬来一张木头凳，请他坐。他站着，热情洋溢地挥着手，对大家说：“青年艺术剧院是最有希望的剧院，你们是最有前途的文艺工作者，因为你们的每场演出都是为青年服务，青年是我们祖国的希望，所以我们做青年工作的人是最光荣的！”这几句话深深地留在我们心里，几十年都没有忘记。大家热烈地向他鼓掌，耀邦同志也越说越激动，先是一只脚踏在凳子上，后来就索性跳到凳子上了。剧院里的年轻人就议论开了：胡耀邦和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不像大首长，还是当年的“红小鬼”。这就是耀邦的本色，他激情如炬，葆有一颗永远年轻的赤子之心。

1980年2月12日和13日，我又一次见到耀邦同志，并聆听他的讲话。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从“左”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创作了许多催人泪下的优秀作品，但也出现了一些一时还不被人们理解的，尖锐地触及社会矛盾，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它们引起了文艺界的激烈争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都因为写了干部的权力腐败，揭露了权力部门的不正之风，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这些题材是我们过去的作品从未接触过的，它们引起人们惊异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文艺领导部门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采取怎样的方法加以引导。耀邦建议，不忙禁演，不忙批判，也不忙做结论，要营造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让不同意见的文艺家们坐在一起，平等地、自由地、各抒己见地交换意见，尽可能求得认识上的一致。一定要坚决摒弃过去那种戴帽子、揪辫子、打棍子的恶劣做法！于是，在中宣部的领导下，中国剧协、作协、影协联合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会议结束时，耀邦同志在京西宾馆大礼堂做了两个半天的长篇讲话，文艺界1000多人聆听了他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分8个论题详尽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正确地认识社会现实、文艺创作的题材无比宽阔、文艺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培养一支敢想敢干、百折不饶的文艺创作大军。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他挥动手臂，充满信心地说：80年代是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开始，也是文艺界向新的高峰迈进的开始！

最难忘记，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是在这个会场上，他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用响亮的声调、激越的情感，向大家庄严宣布：“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会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热泪盈眶，庆幸那个借文艺批评之名对作家实行残酷迫害的可怕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我还被一个场景所感动，当说到“四人帮”对作家的迫害时，耀邦丢开讲稿，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周扬说：“什么四条汉子啊，四条好汉嘛！”我看到周扬顿时眼眶里闪动着泪光。

时间过去35年了。耀邦的讲话和他对文艺工作者的情感仍然深深地感动着我。这个座谈会的历史意义，在于耀邦对党在文艺领域的历史错误的深刻反思，并认真总结经验，探索一条新的途径，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极力倡导的营造民主和谐的气氛，开展平等自由的讨论，以团结不同观点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促进文艺事业繁荣的方针，今天仍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这是耀邦同志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贡献，更值得今天的领导部门认真思考和学习。■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

政治文明的新起点

○　王学泰

谈到胡耀邦先生的贡献，无论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遭遇来说，都有想法可说。虽然与耀邦先生相隔悬绝，但人类社会中公道是非自在人心。

我在1958年上高二时就被整，那年秋天大跃进中，我们下乡深翻土地。当时全国热气腾腾，只要上头一说什么，老百姓不能稍有怀疑。经历了1957年到1958年上半年的反右，我已经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了。但那时的宣传真是挑战人们的智商，例如普及“超声波”，说这是中国在高科技上的突破，它解决一切问题。协和医院用它治疗疑难杂症，许多病用超声波一超就好了。还有郊区某公社的生产队长，给我们介绍农村运用超声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玉米能长到两尺长，黄瓜长到三尺长，驴七八天不喂，干起活儿来特有劲儿。这些给我造成许多疑问，从小我就是专爱“打破砂锅璺到底”的人，后来看到有疑问的人被划为右派的现实，我学会了忍。可是下乡之后，带队的“营教导员”嘱咐我们要深翻40公分，明年这里是亩产万斤田，你们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觉得很惊讶。他又说试验田要深翻4米，明年要亩产120万斤小麦。我对数字是很敏感的，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就偷偷问老乡，一麻袋能装多少小麦?老乡说，一麻袋可装。200斤。我心里一算，这个120万斤得装6000麻

王学泰

袋，一亩地折合6000平方尺，一麻袋装满了小麦，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一亩地可码1000袋。6000袋就得6层，要码一房高，什么样的麦秆儿能把这么高的小麦挺起来？我们住在老乡家里，晚上吃晚饭要开会谈下乡的思想收获，我有点忍不住了，就将自己的疑问提了出来，希望领导给大家解释解释。话一出口，马上会上大乱，纷纷指责我态度不对。教导主任抓到这个苗头，引导我说出所有的疑问，第二天开全校下乡同学大会，把我从下乡队伍开除，回学校大炼钢铁。

当时有疑问的肯定不只是我，但人家聪明，没说，而我就像童话中无知的小孩。这一年，尽管我在学校化工厂表现尚好，期末操行评定也是“中”（分优良中差劣五等），这是班中的最差生了，如果这一年考大学，一定落榜。高三的时候，赶上一位好班主任，他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我对当时美学论争十分有兴趣，遇到一些哲学问题就向他请教，因此，我在高三毕业时操行勉强是“良”，我们班有三位“中”，全部落榜。遇罗克与我同级不同班，文理科兼优，就因为操行是“中”，而没有大学上。原因也在于其父母均被划为右派。

大学期间与张闻天先生的公子同班，而且同宿舍，睡对头床，同宿舍里我俩聊得来，他在1957年初中毕业后，到茶淀农场劳动了3年，他跟我谈到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与彭总对“三面红旗”的意见。那时已经到了困难时期，没吃没喝是中国人每日每时都在面临的问题。虽然，几乎每天都有假话教育，但现实生活告诉我，彭总、张闻天等人对“三面红旗”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我与几位特别要好的异校同学谈了我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我特别赞成陆定一在一次报告中所说的“贾谊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贾谊的《过秦论》中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我认为“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是企图用打仗的方法搞建设，那是不会成功的。

异校的同学在院校调整中偶然分到一班。1964年大学毕业思想清理中，被某青年教师发现我们有与众不同的思想观念，于是被勒令交代，最终被划为“反动学生”。清理反动学生运动是反右斗争在大学生中的继续，从1963年到1966年在全国划了1000多名。我是被公开戴上帽子的，处分是劳动考察3年，到南口农场二分场高校大队监督劳动。1969年后回到学校，1971年分配做教师。1975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因为与老同学偶然谈起儒法问题和批孔中矛头转向周总理，并认为江青对中国政局作用是负面的。受那位同学牵连，1976年7月26日被判13年徒刑，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1978年平反。从16岁到36岁，我被折腾整整20年。

一次凤凰网采访我，谈及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动荡。我说，中国情况很特殊，100多年来社会动荡不止，争斗不止，还没完全走上正轨。政权多次转移，旧的社会解体，但一个新的文明社会尚未完全建立。我想，新的社会模式，首先应该是公民社会。前两年，周本顺写文章说“公民社会是西方阴谋的陷阱”。《宪法》中有40多处提到公民，由公民组成的社会，不是公民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现在“江湖”成了流行词，什么是“江湖”社会？在古代它是皇权专制社会解体之后的产物，专制社会秩序解体后，没有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它。因此“江湖社会”的特点是无秩序性，弱肉强食。这是从暴君专制化为“暴民乱治”。“江湖社会”缺少社会公认的一些基本规则，常常凭暴力说话，如戏词所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所谓文明就是遵守规则，力求在双赢博弈中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崇尚暴力。

过去有一个时期崇尚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原是法国历史学家梯也尔、基佐等人发现的。马克思讲的阶级斗争是说在财产私有社会中由于剥削残

酷、贫富差距加大，工人阶级队伍扩大，逐渐成为自觉阶级，从而组织起来与资产阶级做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被剥夺了，实现了社会革命，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阶级斗争虽有余波，但此时完全能够依靠法律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过去毛泽东设想的阶级斗争要斗几百年，此时所谓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阶级斗争了，它只是实现社会有效控制的手段了。

传统治国是静态治国，所谓国泰民安为统治者追求的理想目标。毛泽东认为世界是一分为二的，矛盾斗争永存。如果从哲学角度看，可备一说。但如果用来治国，把对宇宙的宏观描述，运用到微观社会治理上来，则国家百姓永无安定之日。因为“斗”的前提是要有两拨人有根本利益冲突，新社会大家都处在无产状态，人们谋生方式都是由国家权力安排好了的（如城乡二分制、单位制等），人们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了，他们之间还斗什么？于是就要人为地制造出95%与5%这两拨人来。多数人斗少数人，专少数人的政，给大多数人增加了幸福感。这是动态治国，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人敢这样做。

文明的产生有赖于劳动与静态时期人类的思考。枪杆子能打天下坐天下，能干很多事情，但是枪杆子出不了文明。文明的产生要靠生产发展，靠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靠人类总结经验与思考，它是不断积累的结果。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动乱，都是“积累”中断，甚至对以往积累的毁弃。在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历史中，中华文明没有长足的进步，有些领域还有倒退。从两汉到清末民初，农业生产率没有什么提高（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先秦百家争鸣，几乎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不能企及的高峰。所以中华文明要攀登到新的高峰，首先要告别动态治国。

国家如何治理？社会如何和谐？虽然时代不同了，国家、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想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应该是共同追求的目标。过去斗了数十年，经济滑到崩溃的边缘，人人一副阶级斗争脸，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弄得上上下下都不得安生。因此毛主席逝世后，高层领导与民众中皆出现了新的思考，胡耀邦就是这种新思考的重要代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叶剑英派自己的孩子到胡耀邦家征求他对如何治理的意见，他提了3条：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说这是党和国家摆脱危机的“隆中三策”。我觉得耀邦同志，心里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要趁此机会，拨乱反正，让国家发展走到正轨上来。他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要把过去遗存的问题一并解决掉，轻装前进。应该树立新的起点，这个起点要建筑在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上。所谓政治文明，其核心就是确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一切上层建筑都是为了人而建立的，因此为政必须以人为本。

胡耀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再三强调，不整人，不要整知识分子，不要随意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把作者打成反革命。在耀邦看来，要实现宽松和谐的政治局面，不仅中央要有明确的政策，下面具体执行的干部也不能任凭个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榘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为了清除“四人帮”散播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他几次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并向文艺界领导讲明，文化繁荣有赖于创作自由。本来文艺界是“内行领导内行”，应该是文明的地方，可是他们整人之野蛮，也是人所共知的，因此，耀邦特别重视文艺界领导干部的启蒙。因此，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与他对政治文明的向往是分不开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严 正 声 明

近期发现网上流传着一些《炎黄春秋》Word格式的电子版，该行为系盗用我社的名义，且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篡改并恶意传播，严重侵犯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及作者的合法权益。我社将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炎黄春秋杂志社

青山有幸埋忠骨

○ 袁　鹰

袁　鹰

胡耀邦同志安葬江西共青城以后，我和老伴吴芸红一直有个心愿：去陵前拜谒。芸红是耀邦同志主持团中央时代的老部下，更是心心念念想去瞻仰耀邦陵。二十年前他刚去世时，我们曾去中南海旁会计司胡同寓所吊唁，在那幅最能传神的遗像前，行礼致敬，默读李昭同志大花篮的缎带上写的“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安息吧！”不禁失声痛哭。几天后芸红随同团中央的同志参加人民大会堂的追悼会，静听赵紫阳总书记致悼词，见到大会堂外面青年学生一排排静默致哀，秩序井然的动人情景，至今不能忘怀。对这位伟人，正像他女儿满妹所著回忆父亲那本书的书名：《思念依然无尽》。2008年5月，我终于得到一个去南昌的机会，一接到通知，就想着一定要抽个时间一偿宿愿，临行前，老伴再三关照：去耀邦陵时，如有可能献花圈，务必写上她的名字。

江南5月，正是草长莺飞的艳阳天气，汽车在南昌至九江的高速公路上奔驰，到德安转上去共青城的路，一直在林荫道上行驶，越驶近我越觉得心情沉重，怀念、哀伤、愤懑、感慨，种种情怀郁结，一时竟无语凝噎。进入陵园，先在门口买了一只花篮，在素带上恭恭敬敬地写下“老部下袁鹰吴芸红敬献”字样。感谢同去的两位朋友，帮我捧着花篮，走上喻示逝者七十三岁生命的七十三级台阶，来到墓碑前。由七十三吨花岗岩制成的墓碑，造型不同于一般常见的墓碑，呈三角图形，有如飘扬着的旗帜一角。由上到下依次镌刻着烫金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共产党党徽，显示着墓中人为中国革命献出的一生历程。墓碑右上方，是耀邦同志的侧面浮雕像，像下由中共中央定稿的《胡耀邦同志生平》，楷书写成、烫金镌刻在墨玉花岗岩的碑座上。

肃立墓碑前，我恭恭敬敬献上花篮，三鞠躬，不禁泪如雨下。敬爱的耀邦同志，您终于远离费心伤神的是非之地，忘却种种不公平、非正常的遭遇，获得彻底的自由，好好地安息吧。行礼过后，转身向东远眺，越过一片林地，就是烟波浩淼的鄱阳湖，一望无涯，胸襟顿时开阔。《思念依然无尽》中详尽叙述了共青垦殖场同志陪同他们兄妹冒雨反复选择墓址的过程，生动感人。他们最后选定这个本来默默无闻、树木稀少仅有四十米高名叫富华山的小荒山，真是选对了。它不仅面对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现在已成了白鹭、天鹅栖息繁衍的固定家园，永远充满了灵动活泼的生命，而且富华山的名字，正是体现了安葬在这里的伟人实现富强中华的壮丽理想。安葬十多年来，共青城的所有成员，胼手胝足，呕心沥血，将这座红土的荒山经营成花木扶疏、林荫如画的一座青山。“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杭州西湖边岳飞墓前的那副名联，同样可以移到耀邦墓前来。

那天并非假日，扫墓人还是纷至沓来，在我们后边捧着鲜花上山来的，是来自西北某省区党校的一批老同志。尽管气喘吁吁，但都神情严肃，几位白发女同志清泪盈眶。我们又一次回头向墓碑告别，从南侧下山。在半山的休息厅里，含泪观看了安葬时的录像，看到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志一行护送耀邦同志的骨灰盒，

由北京飞到南昌转来共青城，李昭同志率领子女捧着党旗覆盖着的骨灰盒缓步走向墓地的情景，看到共青城同志和少先队员们列队恭迎的场面，默默地行礼，默默地告别，谁也没有讲话，但是谁的心里都有千言万语。

休息厅外，有个出售纪念品的小卖部，主人是位花白头发的老大娘，她微笑着说："买点纪念品带回去吧。胡耀邦是个好人，他会保佑你一生幸福。"我认真地对她说："大娘你说得对，他也会保佑你幸福的，你这里生意不是很好吗？"老大娘笑着回答："对！对！我们都托他的福。"

告别陵墓往回走，我仍然沉浸在哀伤里。同去的《南昌日报》一位年轻女同志打破沉静，轻声问："您刚才在花篮的带子写'老部下'，您和您的夫人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吗？"

我回答："我的老伴从1953年秋天起到1983年离休，除去文革十年外，一直在团中央做少年儿童工作，还当过几年《中国少年报》总编辑和《辅导员》杂志顾问，当然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直接得到他的领导和教诲。我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在党报工作，从'文革'结束到耀邦去世，无论他当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直到总书记，都可以说是他的'老部下'"。

她又说："那你们一定听到过他的许多讲话了。"这句话，引起了我的许多记忆。

老伴吴芸红常说五十年代少先队工作在耀邦同志领导下打下基础，是成绩最好、做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个黄金时期。1953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说："培养教育新的一代，是共产主义的根本事业之一。爱护儿童、教育儿童是具有国家意义的任务，也是新中国人民的一种共产主义美德"。"我们应该把今天的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健康活泼、勇敢、诚实的新一代"。这个"五爱"方针，当时不仅在广大青少年中、在教育界都引起热烈反响，直到今天仍然是全社会的道德风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团中央号召少先队员参加"小五年计划"的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国家小主人的意识。胡耀邦曾经热情地对少先队员们说："你们现在做小五年计划，将来就做大五年计划。"他又号召全国少先队员积极开展植树造林、除四害和学习普通话等三项活动，为祖国为社会做好事，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芸红清楚记得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工作时期的许多感人事迹，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忠贞不贰，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一身正气，关怀同志，平等待人。直到文革后期在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劳动时，还常见到年近花甲的耀邦同年青人一样挑泥担水，上山运石头。她同团中央的老同志一样，对老领导永远怀着深深的敬爱。五十年代她刚调到团中央工作时，身体瘦弱，同事们都叫她"小吴"。有两次在楼梯上遇到胡耀邦，耀邦都亲切的问："小吴，你胃病好点没有？"这件小事，她至今念念不忘。

我最早直接聆听耀邦同志的讲话是1959年10月首都庆祝中国少先队建队十周年的庆祝大会，那时，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庆十周年的"首都十大建筑"的第一项工程，刚刚落成，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巍峨雄伟的人民殿堂，难以抑止兴奋和自豪。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向少先队的小弟弟小妹妹讲话，他着重讲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三支队伍："第一支是伟大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这是领导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第二支是我们战斗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应该是一支不知疲倦、不怕任何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突击队。第三支就是你们少年先锋队。你们这支队伍，我想应该是一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积极进行准备的预备队。"他那天讲话的题目就是《预备队的光荣任务》。全场少先队员们听到这里，顿时感到自己肩上增加了重担，好像突然长大了许多，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人民大会堂立刻成为激动和欢跃的海洋。我有幸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的业余作者参加了那次大会，耀邦同志的讲话，实际上也是对一切少年儿童工作者包括儿童文学工作者肩上所负神圣使命的庄严号召。

作为一名长期在文艺宣传岗位上服务的报纸编辑，我感受特别深刻的是耀邦同志对知识分子、文化人和文学艺术家真诚的尊重和坦率的交往。他从不说"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分子"之类的套话，而是推心置腹地亲切谈心，如同对老朋友一样讲心里话，坦率而真诚。他不用秘书代拟

讲稿，总是侃侃而谈，议论风生。1979年元旦第二天，耀邦同志刚刚就任中央宣传部长第一次同首都三百多文艺界人士见面，向大家祝贺大有希望的新的一年。他请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和文化部长的黄镇郑重宣布：文艺界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根本不存在有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彻底扫清了多年压在全国文艺界头上的魔影。他说：林彪、“四人帮”把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党和文艺界的关系。他说：

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这还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多作建议。我想到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一个“问讯处”——指出文艺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代的资料；一个“休息室”——歌手们的口渴了，有一杯凉开水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文艺工作者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打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

如此简明扼要而又生动准确地阐明党的宣传部门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到会文艺工作者都感到闻所未闻，耳目一新，反应的热烈可以想见。人们都想起多年来自己的种种欢欣与辛酸共存的亲历，心情更加激动，都期望耀邦同志讲的这些话能逐渐落到实处，虽然大家也明白绝非易事。

八十年代初一个早春，我列席过他主持的中宣部一次工作例会。会上，他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形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在排除种种干扰阻挠，深入人心，受到广大党员和知识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拥护。经济形势的转机和初步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也使老百姓高兴。但是他也提醒大家，长期肆虐的“左”倾思想和陈旧观念，仍然还有强大的影响，有如早春时节阴冷的阵阵寒雨。讲着讲着，他背诵一首辛弃疾的词：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辛弃疾这首《汉宫春》，并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但是耀邦同志引来比拟当时的政治气候，却十分恰切。他逐句点解，古为今用，更显得生动活泼。尽管那一时期政治生活中还有“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不时千方百计地阻挠侵袭，但是它们绝对挡不住春天的脚步。耀邦似乎对自己这番旧词新解比较满意，讲得津津有味，兴致盎然，特别是解释“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这几句时，心情忽然显得欢快，又习惯地站起身，大幅度地挥动手臂，仿佛已经看到东风吹拂，熏红了梅花，染绿了柳叶，人间万物，芳菲满眼，再没有多少空闲时间了。这时候，他就眯起眼笑出声来，笑得率直，坦诚，使到会者都受到感染，静静的大会议室里霎时间荡漾起愉悦的笑声。

1980年2月，耀邦同志倡仪为《假如我是真的》等几部有争议的话剧举行一次“剧本创作座谈会”。这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多年以来，特别是文革十年中，文艺界人士已经习惯于那种声势严厉、一锤定音、将作者置于被告席上听候发落的审判会，跟着来的就是连篇累牍的批判，肆意上纲的声讨文章。但是这一次的会完全不同于人们熟悉的那种“批判会”，而是平等相处、以理服人、和风细雨的谈心会。耀邦同志在会上细心地静听到会者的意见和愿望。他在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八个字的要求：敢想敢干，百折不挠。这八个字，当时乍听之下，似乎也没有多少新奇之处，今天回想起来，却感到语重心长，字字千钧，真正实现谈何容易。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提出这八个字，多么富有战略眼光和睿智的预见性！耀邦同志满怀深情地说：“我觉得当前最可宝贵的就是这八个大字。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我国文学艺术新的大繁荣时代，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艰苦的事业，你不敢想敢干、百折不挠，那怎么干得成！我们的队伍太小了，我们还不是一支大军，是一支小军，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

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说到此处，他突然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提高声调：

“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

这个突兀的举动完全出于大家的意料之外，全场的文艺工作者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动，立即以发自肺腑的掌声和欢呼表达自己衷心拥护，有几位老人禁不住泪流满面。这种动情的热烈场面，在我几十年参加文化界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的经历中是极其罕见的。窗外还是2月的严寒，室内却已充满盎然春意。人们都深情地凝望着他，亲切地感到站在台上大声疾呼的，不仅是一位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中央领导人，更是一位可以对他交心、对他诉苦，甚至对他发牢骚的良师益友。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时隔三十年，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反复阅读《思念依然无尽》的时候，多次想起老诗人臧克家先生“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名句。耀邦同志生前主持一次次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改正，使无数含冤受屈多年的好同志和知识界人士得到平反昭雪，重见天日，重新回到党的队伍和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岗位，他会料到最后自己竟遭到“莫须有”的冤屈，身后二十年未得彻底昭雪吗？是的，有些人现在虽然功成名就，华堂豪宅，似乎活得有滋有味，但他们在人民心中早已死了，人们甚至不屑再提起他们的名字。而胡耀邦同志虽然已经去世二十余年，他还活着！《思念依然无尽》第一章《永远的沉默》写到1987年耀邦离开工作岗位后的一次“最后的故乡之行”，离开长沙去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尽管轻车简从，还是被正在那里举行森林工作会议的人们发现，热烈欢迎他，要求同他合影留念。沿金鞭溪游览时，又被认了出来，数千游人不约而同挤在山路两边鼓掌欢迎，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跟他握手合影。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照，仅在金鞭溪到索溪峪的数公里山道上，他与游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这种罕见的热烈场面，使得警卫人员有些紧张，他却坦然说：“别担心，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近日读《李锐诗词本事》，也提到此事，有诗云：

天下奇冤一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青山有幸埋忠骨。站在耀邦陵前，望着山路上那三三两两络绎不绝、沿着七十三级石阶来拜祭的人群，我又一次想起李锐老人的这句诗：“活在人心便永生”！一位伟大的革命家的凛然正气，他在民族历史转折关头的不朽功勋，他那襟怀坦荡、真挚热诚的音容笑貌，都将永远活在几千万共产党员和亿万老百姓心头，永远与鄱阳湖畔的青山绿水红土地同在！■

（作者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丁　东）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通过以下方式购买。

淘　宝　网：http://yhcqwd.taobao.com/
支付宝账号：13611159388
微　信　号：yhcqwx
邮政汇款：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政编码：102488
联系人：崔秀岭　　电话：010—60342528
手　机：13611159388

有奖征集民间抗战实物档案

为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更好地保护散存于民间的抗战档案，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专门新建了民间抗战档案纪念馆，并决定面向全国征集有关抗战的实物档案，包括抗战时期的书信、日记、文件、书籍、照片、奖章、证书以及其他实物等。

我局实行有偿有奖征集。对凡征集入馆的抗战实物档案捐献人均给予一定的征集费，并颁发证书；组织专家对征集到的抗战档案进行评奖，并给予奖励；对征集到的实物档案分类结集编印成书公开出版。

联系方式：023–68863589
张先生、王女士
13996376236　高先生
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
2015年8月10日

曾彦修来信类抄

○ 何 方 整理

今年3月去世的曾彦修同志是我难得的知己加诤友。多年来,我们就一些理论和中共党史问题交换意见,他一笔一画地写给我的信札,绝大部分是对我送请他指正文稿的修改意见。这些信反映了他对我的深厚情谊,更是他深刻和犀利见解的珍贵记录。我很想把他信里表达的一些思想同朋友们分享一下。现分5个问题,按来信时间排序,做点摘抄。

谈个人崇拜

(一)我在《党史笔记》中写的《普遍整风与知识分子》一章中,提到我们在延安整风时学习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的情形。对此,彦修同志于2002年8月31日来信:

"我意,整风中陈伯达在建立个人崇拜方面是立了汗马功劳的。陈的两篇文章《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整风中受到极大重视,学的时间很长。这二文提出了,党中央内部历来就有正确和错误路线两条路线在斗争着。正确路线的代表,始终是毛泽东,从党成立的那天起。《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更明确指明,此文奠定了中国革命要走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的理论基础。我觉得在延安整风中,除毛自己的文章外,最重要的就是陈伯达的几篇文章了。我对毛的个人崇拜,就主要来自陈的上述二文。至于刘少奇的《修养》、《党内斗争》,则主要是强调必须消灭个性,人人都必须成为'驯服工具'的教科书,尤其是《修养》,只要人成为工具,而不要人有思想,是启蒙主义的尖锐对立面。此文的消极作用至今在一些同志头脑中仍占统治地位,我们要建的是苏式党,大大不利于邓小平的一些正确思想的贯彻。"

(二)2003年5月10日来信,彦修同志在读到《党史笔记》中有关毛泽东给毛岸英找老师的一段文字后说:

"我等不想以此沾光,同时,这任务不是毛直接指定的,是陈伯达、胡乔木分别指定的,删去为好。我过去所以说明此事,是有人不知凌云时间最长,我离东柏坡去西柏坡后,又改由于光远与之联系。毛岸英则只承认田家英一人,一因田以后在毛处工作,又是第一个,二是学中国文史,小毛最缺乏此方面知识。故此数句务必删去好,以免我们有沾光之嫌。"

(三)2003年10月18日来信,要我阅读沈志华在2002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的《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一文,说:

"此文证明,1958年后所谓苏方要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宣传,全是假的。根本问题是斯大林死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后,挖了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祖坟,毛自己立刻就要从儿子党变为老子党。他十分甘心做斯的儿子,但斯死后,特别是被批后,他就要把中苏关系彻底转变过来。特别是1956年秋冬苏联在波匈等地遇到困难后,他就感到苏已无力东顾,该他当老子了。1957年要以苏联为首纯属虚晃一枪,目的在暂时麻痹外国党,更重要的是想引发国内的亲苏势力上钩,掌握党内上层倾向。总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均是寻借口反对赫鲁晓夫。毛的第一敌人是赫,赫之罪在于敢于揭发斯大林。此文我认为已解决问题,故放大后供你仔细看看。"

他在文章页边还做了些批注:"波匈事件时,我在苏访问。苏政治书籍出版局负责人在会见我们时,对中方去人帮助他们下坚决镇压决心表示感谢!"

(四)他得到李锐作于2003年11月13日的《如何看待毛泽东》一文的打印稿后，在稿子上加批注寄给我，说：

"第三页上，指出1950年5·1口号末句，毛主席万岁，是毛自己加的。此事想来你也知道。我过去听说过原中宣部宣传处长王宗一在文革中自杀，听说与口号有关。王初拟稿中无毛万岁，毛加上后，王似乎表示过惊异，文革中遂被定为反毛，不得不自杀。"

(五)2004年5月26日来信：

"同在1949年12月斯大林70寿辰之前赶出来的《斯大林传略》一样，'斯大林——今天的列宁'，就是斯大林自己加的，现在俄罗斯有档案为证……毛的推行个人崇拜运动，绝不是出自简单的个人虚荣心理，而根本上是他的历史总结的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个人绝对独裁统治，使它不能受到万分之一的动摇。"

"宣传亩产数万斤粮食的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毛本人出自农家，不会真相信的，但他坚持如此宣传甚久，就是纯属政治需要了。凡是毛不同意的，他当时就要大发作。1945年8月上旬，美国在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解放日报把消息登到第一版，标题也较大。毛立即大加批评。第二天或第三天，有些单位就听了这个尖锐批评的传达了。(我在中宣部就听过陆定一的传达。那时陆刚离开报社，挨批的可能是博古、余光生等，陆那天传达时明显地更加口吃。)"

对于有关抢救运动的章节中谈"积极分子"这一段，他说："当然，多数人是被迫服从，所谓'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一年到头就希望作'政治运动'，因为这是这类人的唯一本事，这是至今还很突出的问题。即吃'运动'饭问题，而上级党组织往往以此为所谓'党性'是否坚强的标准。"

(六)2004年7月13日来信：

"其实，各地负责人的所谓'头脑发热'，也全是假话。这热源来自农民，来自自己？全不是，完全是来自毛的要求。所以，这种检讨也全是在做戏。把几十亩田的稻子割下来堆在一块田里，谁会看不出来，除非死人。所以，这些全都是一人骗大家，大家骗人人。"

"中国自己没有做大国主义的条件，却偏偏要在斯大林死后，一下子大翘特翘尾巴。对这些事，至今还被不少人自鸣得意地大吹特吹，兴奋地追忆往日的'光荣'，这能总结出什么历史教训来呢？"

"去掉了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就去掉了一切专制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古今中外一切专制制度的命根子。日本的军国主义制度，最后还是立在对天皇的神似的崇拜上。一个没有彻底脱离个人崇拜的社会，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相反，流行个人崇拜的社会，则必然是一个专制野蛮和落后的社会。"

"我觉得'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是单纯的集中，那民主是集中施舍的，而不是民主了。又，'接班人'问题更荒唐，同皇帝找继任人是一回事，即终身制的领导人寻找另一个终身制的领导人，于世袭君主制无异。"

"中共的前途究竟是前进还是应该大退特退，在一些人中，主张退的人还是强大有力的。这些明显的推翻1978年冬扭转中国大逆流的那次大转变，能不能就已经很巩固，以后就不会有逆转了，还难说的很。历史上大倒退，在人类历史上频频发生，一个回合就巩固下历史大胜利的，历史上很少见，或几乎没有。中国的情况可以说这种复辟危险更大得多，因为人民无权，历来一切均由上层几个人或一个人决定。盲目乐观在中国可说毫无根据，而且明明白白是一种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的事情。"

谈张闻天和党史

(一)2003年3月30日来信：

"其实，'实事求是'是常识，中外自古有之，本与马克思主义无大关系。现在忽然上升成为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稀有的宝物了，正好说明不实事求是，是久已成风习了，这才显出了实事求是的珍贵。"

(二)在读了我所写《张闻天的民主追求与实践》一文后2003年6月1日来信：

"遵嘱仔细拜读张闻天与民主文，虚实结合，很感动人。所云诸事，至今不为外人所知。上面所关注者，唯在怕下面的人给他加'伟大'二字，听说没有，就放心了。你此文发表后，人们观感

又将大升一步，提出中共领导者中一个真正杰出人物，一枝被折断了的红梅。”

“全文无意见。只第5页第一行‘较少谈法治’，可否改为‘不能谈法治，万不得已以法制代充。其实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有的极端者，其法制多如牛毛。真的法治必须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三)2011年5月6日致何方、萧扬、程中原信：

“我上次所举五个例子尚甚不完全，未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歌特反关门主义，凡张(闻天)所涉及者，几无一不是创造性、现实性的大理论问题的正确解决。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李大钊，功在建党，他二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新青年时期有些重要理论，但那是民主主义理论，西方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民主、人权理论，也很伟大。但在分析中国问题上，就显得浅。不强调反帝，还谈什么？不大能解决问题。自党成立以来，党内可称理论家者，确是毛公。二十、三十年代以来，瞿秋白、恽代英诸先辈，都未能显出他们理论结合实践的大成绩。而张闻天一出马就有社会性质、歌特反关门主义二大结合中国实际的巨大理论贡献。当然，同时张在‘九一八’后，也首当其冲，大写反对非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文章，那是坚决执行斯大林的理论。其他诸关键时期的理论活动则是正确或很正确而且是很杰出的(如西安事变)。党内其他诸人，除毛有不少重要理论贡献外，可谓并无他人。”

(四)2011年6月9日致萧扬转何方、程中原信：

“对张的赞誉，言辞上我建议以稳重为好。第一次让位，我前已表示过几次意见，张提议自己出去恢复白区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客观上当然就意味着离去总书记职。当时回白区就意味着只是重建白区工作，只有上海租界可以藏身，当然就谈不到要在上海租界来指挥红军了。因此，这件事可以说客观上是意味着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但，形式上则还不是那么明白地让位。

“用中国咬文嚼字说，第一次可以说‘辞位’。第二次是‘让位’。第三次是‘弃位’。当然文字上决不能讲这些，可否只具体说明情况，把第一次说成是‘实质上的交位’，避免说我们也在‘造神’，造一个‘谦逊之神’。

“我的总意见是不必具体说明是不是‘三次让位’，让读者去评价：是两次、两次半、三次。

“千万不要让读者、党史界有一个印象：何方、程中原、萧扬等亦在‘造神’，造一个‘谦逊之神’。以此，我们可以意到而言有所不到，不宜言满而意尚不够清晰，有待解释，这就后者不如前者了。

“实质问题我们要谈清楚，表达方式则宁可赞而不够，有所保留，不可令人感到赞而浮夸。”

(五)2012年11月24日和12月16日两次来信，谈他收看北电科技台播放金一南少将专题后的感想，12月16日信说：

“我是从湘江大败以后听起的。若干要点转介于下。1，大转移事只白崇禧一人全估计到，时间也很准：在1934年秋冬之间秋收以后。蒋未怎么重视。2，红军被逼走的路线，唯蒋手下一参议之类的杨永泰一人提到，要在改线设防。蒋说是否石达开老路，未予重视。3，特别挖苦了博古。说李德只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刚毕业生。去苏区原因似不明。博古利用之。从此，即由博古、李德二人决定一切。4，对张闻天，比前尊重很有限。不过是称为‘总书记’。对杨尚昆、林彪，渡金沙江前甚重视，以后即未提及。(当然这也是歪曲历史)，在人物中特重提彭德怀；于周，也不怎么重视。5、‘四渡赤水’，略提及，未予夸张，视为军事上的应急行动，不再讲过去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若干年前，同台，有一上校专讲‘四渡赤水’几否定了原来的神话。)6，根本未提及叶剑英发现密电一字。7、对陈昌浩平反似极大。仍是暗示，多数观众恐怕看不出来。一是徐(向前)陈北上后，一次用电话来表现：陈对对方说‘不打，不打！’；不久又一次陈仍回答说‘不打’，一二秒钟后，又补充一句‘组织服从！’显系对徐说话，最后拿出司令员要服从政委的金牌来压服徐向前。可见以前对陈昌浩全是污蔑的。你接触过陈昌浩没有？他1938年下学期，时刚逃出宁夏、辗转回延安几个月，竟然教我们近代西方革命史，从文艺复兴讲起，不知他的学问从哪里得到？何时得来？其口才之绝佳，胜王明、博古十倍。8、最后两次，先是评蒋方人才，谓手下武人、习惯名次，依资历为何应钦、顾祝同、刘峙、陈诚……等。但以陈诚为有真本事。造成江西红区最大损失的，也是陈诚。陈诚能与士卒共甘

苦,行军时,有马不骑,有轿不坐,有美食不吃,后在台湾和平土改成功,是蒋方一人物。”

谈知识分子和胡乔木

(一)彦修同志读《党史笔记》中《普遍整风与知识分子》一章后于2002年8月31日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谈“抗日初期进入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大小知识分子问题”:

2014年10月何方看望曾彦修(右)时合影 马立国 摄

“建议对此历史事件大加议论歌颂一番。这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共党史上异常光辉的一页,也是对历史上中共烈士们抛洒鲜血的一种回报。以我本人而论,我并不知道多少红军奋斗的情况,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推动我走向延安的,包括我所知瞿秋白牺牲的大略经过及其遗作‘多余的话’。当时只是对他诗句的末句‘黄昏已近夕阳红’感到不解。

“事实上,应该承认1938年前后这批人,包括我们二人这种小知青,都是那个伟大时代最先进的中国人和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社会和学校的大小知识海洋中浮在表面上的那层油花,即真正的社会精英。这个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这么一次,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南宋、南明出现过一批知识分子南渡,当然也值得赞美,但他们是避难,而不是北上拒敌,所以它的历史光辉就小多了。1939年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时,高潮已过,该来的已经来了,再来便只能是零星的了。由于37-38年这么多大小知识分子完全自动涌向延安,才使党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党。这批人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瞒着父母走的,可谓孝于国,孝于党,而不孝于父母。我也至今提到母亲即要流泪,哽咽难语。一个人对母亲不孝,能说不终身痛苦?正由于其成员来自各阶层,而很少是工农,因此,就大大影响到中国中上阶层很多人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之谣,不辟自破;共产党、红军究竟是‘匪’还是全国人民的灯塔的问题,在全国豁然而解。

“必须明确辨明,几万知识分子到延安,是去了一大批财宝,而不是去了一大批负担、一大批‘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整风开始后,对这个问题的说法便似乎往往有些颠倒了。先说是‘半条心’,即投机;后说是‘两条心’,即特务。此项估计,相当时期内已经成为基本估计,可谓差之千里,谬之无限万里矣!”

“‘三八式’问题。此段我认为很好,但觉得还不够些。我不但与你同感,而且认为这是党的一个重大的不幸。你这段文章的意见,我多次与人谈过。党始终掌握在1921—1925年的第一代中,至多加上几个苏维埃前期,即1927—1930年的一些前辈手中,而且都是终身制。但中共涌现的人才,最多、自觉性最强(有些人从南洋、欧美跑回来)、最有生气的是‘一二·九’至‘三八式’前后这段中。可是这一段中的人物,竟始终没有一个人在党、政、军的中央以及省部决策层中起过作用,终其一生始终在‘低干’‘中干’”中度过,真正可称为‘高干’者也无。我曾一一算过,一二·九至三八式前后(两代紧接,时常合而计之),任职最高者之中不过蒋南翔、黄华二人,教育部长与外交部长而已,又都是很后来的事。这与操持国政,在中央党政军决策毫无关系。此外,有一个姚依林,晚年入了常委,仅为对付经济危局,起安慰赛作用。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看看,不行了,于是人皆可以上凌烟阁,入军机处。这是中国也是党的一个大悲剧,断层了三十年、四十年(从1956年八大算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才不继、

优良传统断裂、腐败与坏人用事、拣到篮子就是菜等一系列难治之症的种因。像地质史上玄古纪、太古纪之后，一下就跳到了白垩纪，中间的都没有了。类似现象，蒋似乎也多少有过，即在军事上，他始终是以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等一批保定系出来的老人作方面总司令，而不敢大用较有能力的孙立人、黄维这些人。

"从'一二·九'到'三八式'的人物中，在中共史上根本未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一代，这不仅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大不幸。在中国有一个相反的比较成功的经验，这就是自然科学、文史界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为代表的若干大学，自二十年代起，经三十、四十年代，整整三十年间，出了好几代大学者，以至解放后还是靠这几代学者在为新中国撑门面。到图书馆一看，今天仍站得住有参考价值的仍是二、三、四十年代的书及这时代人的著作。此专指史方面。而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人，由于不断改造思想，不断地挨整，不断地当牛鬼蛇神及专政对象等，使得这些人很多也中途凋谢了，甚至非正常地死亡了。故此就没有使解放后留下的老专家们培养出多少大名家来，尤其在文史方面，几乎有一刀两断的现象。

"我想，如果'一二·九'、'三八式'真当权了，也跑不出马恩列斯一套。因为党的模式已由斯大林定型化。最高决策人是终身制便什么大改革都不可能了。世界各国共产党要打破黄炎培说的那个周期律，首先必须严格执行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何人一生只能任两届。不然，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终身制？又有哪个终身制不把事情完全弄糟，或把一些极重要的事情弄糟的？'三八式'即使有一些人参与了决策，但于长期大局恐也无大补，盖斯大林党已成型，各党均不能不照搬。'三八式'当权，原则上也不会例外，只是反右派、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类问题，或不至于如此严重。"

"'知识分子没几个人敢起来争鸣'。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敢争鸣。多少可以算'争鸣'的，我以为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梁漱溟，争鸣的问题确很大，很重要，梁的意见也是对的。即我们实际上比斯大林下手更辣、更彻底地把农村当作殖民地来掠夺，来发展重工业。梁讲的'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不大好听，但呼吁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后来的事情越来越证明他意见的重要。另外半个是胡风。胡三十万言书我至今未看过，但他反对庸俗社会学（即庸俗的阶级分析论）、反对五把刀子的提法，原则上是对的。其实他就是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片面歌颂、图解政策、演绎口号、歪曲真相等。胡的语言是怪一些，名词也特别一些。他的要改造人们'精神奴役的创伤'，其实即鲁迅的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怪里怪气的提法。字眼怪些，但意思是深刻的，怎么是反革命？如看其实质，胡即反对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片面歌颂主义等。至于马寅初，提出一极正确但又是常识性之建议耳，谈不到争鸣。不听他的话，便是坚持教条，不顾中国的实际需要。我的意思是实际上并没什么人敢起来争鸣。以陈独秀问题论，'日特'问题，有谁同意？但谁敢争鸣（康生自己也不会相信，跟着说，迫于向斯大林交账耳）。西路军问题，连徐向前也不敢起来说明史实。'外蒙'问题，毛本人可以同斯大林争，但陈嘉庚一到解放区就提出这个问题，则说他是'反苏'。我1949年夏即得知此说。"

（二）2004年5月26日来信：

"（延安）哪一个天天吃小米饭的青年想过要改吃白面、大米，那里根本不生产这些东西，谁个去做这种可笑的所谓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梦？王实味的话是有些愤激，其实并没有哪个青年起来、关心过、反对过什么衣分几色、食分几等之类的事情。照上面那类'绝对平均主义的'怪论，那么，拼着性命到延安去的，倒不是全国青年中最先进的部分，而是全国青年中最落后的部分了，简直令人笑掉牙齿。现在某些写党史的先生们，请问：你们把当时全国最革命的这部分革命青年，写成落后不堪的分子，这不是污蔑是什么呢？其实在延安的青年生活已较优越了，在前方的同志们更苦得多。"

（三）读我所写《时代问题十讲》一文（里面谈到共和国成立后无大师）**后于2005年12月23日来信：**

"有作品即成右派。离开反封建，离开争民主、要自由，巴金即写不出东西，至多批判现实主义。若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他肯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此为欧阳山、丁

玲、周立波诸老所坚持者，写出来便无人看也。延安《解放日报》登过一文，《报纸是教科书》(听说是陆定一写的)其实，小说又何尝不是。胡乔木这人是二重人格：他要维护与推广的，其实是他内心反对的，因为此人究竟是有水平的。进城前，中宣部在东西柏坡时，只有几个散兵游勇，听由陆定一、胡乔木二公分派一点临时小任务。那时，胡乔木有一次偶然对我说过一言半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欧阳山的《南区合作社》均是赶任务的东西。言下之意，视若敝屣。但他在公开场合，又必须是政治标准第一。那时他这种一言半句的私房话，似乎只对他手下的两个听话工具田家英、曾彦修二人说过一句半句。据我观察，在延安时他可能不一定会对别人讲过私房话。对吴冷西，可能会讲一句半句国际形势的私房话，因为乔木知道世界大战是怎么回事。但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呢？他若不如此，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躲得过延安那一劫吗？有才又有见解，能存在吗？我辈之能活下来，在那时其实是才识俱无的。阁下可能好一点，我那时就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从未考虑过斯大林有何不对。唯第二次大战爆发前后有点不成熟的疑问：怎么没见到苏德准备战争的号召呢？”

(四)读《党史笔记》中谈党史编纂学一章后来信：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于自己被某个人君格外施恩选拔重用过，即所谓人主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坚持人民本位到底的立场，这叫‘曾经圣人手，字字变黄金’，并不是那么正确的。”

“胡乔木、毛思想一致问题。我觉得胡受到的教育，使他不大可能同毛思想一致。胡究竟是个书生，本来深受民主与自由主义影响。田家英和我二人在其领导下编语文教科书一年，深知胡极佩服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等。因毛拔胡于诸文人之首，胡‘于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我看胡根本上是个二重人格与利害问题。他自己已上了神坛，下不来了。”

“胡陆(定一)关系问题：据于光远较详地告知我，进城后一直是胡领导陆。于云，有一次陆不在场，胡对几个人说，‘可叫陆当北大校长去’，即公开表示胡可分配陆的工作了。此项权力，当然来自毛处。”

“拿日丹诺夫与胡乔木作比较，难说得很。日公一直抓一市一区的全面工作，他还在军事委员会中代表斯大林、党中央。在文化思想理论中，则其位远在少奇之上。《莫洛托夫访谈录》也盛赞日氏自学努力，学问好。但：日公的文化基础知识比胡似差得远。从日的著作看，他的知识面比胡也差得远。日确有一样是内行，即音乐与音乐史。这是他的强项，所以做了两次报告。他骂文艺界名人时，就成泼妇骂街，有失体统了。”

谈延安生活

(一)2004年5月9日来信：

“延安各大小单位、学校等，原来都是在大路边或大路边很近的山上窑洞中的，除了毛在杨家岭等各处住地筑有小围墙，边区保安处的监狱筑有大围墙，康生的肃反情报部门设在枣园里面的深山沟里外，其余一切机关，都并无围墙，原则上是开放式的，而且都在大路边。例如，原中央书记处所在的蓝家坪住址，就在通往榆林的主要公路的西侧矮山坡上，是无任何屏障的。党中央机关比较集中的杨家岭，沟口也在大路旁，并无任何屏障。可是自1943春初起，即在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之前四五个月起，土地还在半冻结时，各大小机关、单位、学校，即无例外地开始大建土围墙了，施工费了几个月，有个别人还开玩笑说，这真叫“圈地运动”。这种施工，长达几个月，不管围墙有几百米长，都要修建。从此，到撤出延安为止，各机关、学校均只有一个警卫严格的大门了，彼此之间的来往就完全停止了。延安各机关、学校之间已停止任何交往，往来的只有机要交通员，延安成了一座沉寂的城了。此种状况，竟被保持到延安撤退，即1947年的春天，均无改变。”

(二)2004年5月26日来信：

“整风运动形成一个单位内部小组之间不能自由往来，个人之间更不能自由来往，而且人与人之间往往还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还成什么体统？延安有几年几乎就是一个死城，但是从来没有饿过饭。”

(三)2013年11月27日复萧扬(抄送给我)

信，谈对东北沈阳一研究人员来文的意见：

“敌占东北后，东北抗日军队事似由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在管。1938年已回延安的杨××（已忘其名），似即常住东北境外的苏联，领导此项事业。

“1938年上半年，他住在中宣部，给我们讲中国近代革命史一课，还不错。《解放》杂志38或39年有他一篇《悼王德林将军》，王即抗联第x军军长。

“据知，我义勇军前两三年路线完全错误，采取土地革命政策，将地方绅士及商人等赶入敌营，一致对我。我方已完全无法立足。后与苏方交涉，得苏方协助，兵员可全撤苏境。”

谈苏联和国际问题

（一）读《党史笔记》关于个人崇拜一章后2004年3月30日来信：

“苏联从1934年12月或1935年初之前才开始的大屠杀，开始一年还并未那么大张旗鼓。真正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大杀共产党员，是1936年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才开始并大宣传的。而在中国土地革命区域内，大杀根本并无其事的所谓‘AB团’，则发生在1930年。这是比斯大林大杀内部党员干部还早五六年。这决不能说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绝对是中国的创造，与苏联毫无关系。苏联斯大林那时也在不断大杀人，但杀的多是十月革命后留下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还没有轮到大杀党内干部。”

（二）读我所写谈战后国际形势的文章后于2010年二月初四来信并附我的回信：

“战后冷战形成，是否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恐怕是要以情报局成立正式开其端，事实上这些国家当时还是苏占区，各国政府，共产党，虚名耳。而各党的一些领导人，大体上是长期在莫斯科住着的人。这个情报局会议，就是正式把这些国家固定为一个集团，今后一切都必须听苏联指挥。铁托想保持点独立，对不起：你就是间谍匪帮！中国在建国前即通过各种方法表示输诚。（刘少奇是去请示的，他似乎是“贵宾”，但更是“跪宾”。回来后在沈阳的领导会还是干部会上讲：中苏干部间发生争执，中方错的——三扁担；中方对的——扁担三。这是我在广东从南下干部中听来的。

“中国全境解放，斯大林初时恐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惧的就是怕在东方出现了个大铁托。苏联最盼望的，我以为与美一样，就是南北朝。这样，南是美蒋，北是苏中。中国就非全靠苏不能过日子——那时中国就完全是斯大林的一个附属国了。

“欧洲方面自成立煤钢联营后，统一欧洲之类的活动有两三年似乎是法国在主导的。直到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订立。我觉得，似乎情报局成立，至北大西洋公约成立，冷战局面便正式形成了。这时，实际上中国已即将全部解放，我们大家均在注意国内问题，对此一时期的世界政治局势，几乎丢在脑后。苏方在原子弹未造出前，也不敢大动。宣布原子弹已造出，似在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略后。所以，我很同意你文章的主要分析，但是否可再明确一些，即：冷战正式形成于情报局与北大西洋公约签订这一过程中。朝战似乎是形成后的第一次比试——它本身当然是冷战局面中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　丁　东）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八老”与1980年代政治格局

○ 徐庆全

追溯改革开放的历史，常常能够碰到“八老”治国这样的说法（也有的说是中共“八老”议政等）。说的是，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首的8位元老政治家在新老交替、政体转型期间，在政治上拥有实际决策权力。

“八老”是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指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邓颖超；一个是指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万里、习仲勋、邓颖超。我认为，前一个版本比较接近当年的历史情况。这首先要从“八老”是怎样形成的说起。

“八老”的形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以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的身份，总揽党政军大权，任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7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出4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主席华国锋和这4位副主席组成。这次会议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事变动，即在四川担任省委书记的赵紫阳，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为赵紫阳后来进入中枢机构奠定了基础。后来人们知道，这是邓小平的提议。

后来成为“八老”之一的李先念，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在文革中尽管被冲击，但并没有被打倒。他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参与者，此后协助华国锋主持经济工作。1979年3月，李先念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1982年9月，他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产生了新的增选名单：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

陈云在党内资格老。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排第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那时，邓小平在常委中排名第六，低于陈云。这次陈云增加了一个新职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纪委是中共最高纪律检查机关，在当年新老交替的过程中，中共组织机构以及人事安排，与这个机构有很大的关系，有人说，起到了总其成的作用。所以，以陈云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复出后身任要职，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凸显。

另外，陈云在党内一直主持经济工作，1980年经济调整前后，陈云再一次主抓经济工作。他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著，成为几乎与邓小平并肩的两“巨头”。此后，由于邓主张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陈更偏重于计划经济，两人有时候各说各话，各有追随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双峰政治”时代。

邓颖超虽然在党内并没有担任过要职，但也是老资格党员，加之是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夫人，总理不在夫人在，尤其是当年怀念总理的情绪在党内外弥漫着，邓颖超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顺理成章。

王震，党内地位不高，在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连任。这次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内的“格”高了。

王震在1975年担任副总理，此前，邓小平也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王震对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大力支持，在这个时候，两人的关系开始走得更近一些。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王震一度地位比较特出：他不属于被人们视为文革受益者的华国锋、汪东兴等那一个群体，与正在赋闲的党内老干部有更多的沟通话题；他又是在职的国务院副总理，尽管排名

比较靠后，中枢的事情知道一些，可以向老干部们传递更多的“小道消息”；他为人又耿直，老干部对他比较认可。所以，那个时候，王震异常活跃。

1975年，王震协助邓小平工作。1977年开始，王震极力推动邓小平复出。1977年2月，王震就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就是通过他扩散出去的。1977年3月10日至2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为邓小平复出呼吁，王震也极力配合，呼吁及早恢复邓小平的职务。1977年5月24日，王震和邓力群、于光远又去看邓小平，邓小平和他们谈话，后经于光远、邓力群整理，在《邓小平文选》中留下了两篇文章：《“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复出后，很多事情比较倚重王震。在《邓小平年谱》中可以看到：邓小平有许多的批件，或者带上王震或者批给王震；邓小平处理国防、教育等事情，听取汇报，也叫上王震。对于仅仅是中央委员且在国务院副总理中排名靠后的王震来说，邓小平这样做，对王震的器重不用多说。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王震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与邓小平有关。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在通过要增补的12位中央委员中，杨尚昆、薄一波名列其中；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和中央委员彭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尚昆，毛泽东时代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第八届中央委员；1956年，在邓小平任总书记时，他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与邓小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这次复出后，地位上升很快。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1981年7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协助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薄一波，毛泽东时代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国家经委主任、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曾经说过他与邓小平的关系：“过去，在晋冀鲁豫，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副书记。有事开个会，小平同志说个‘干’，就不管了，剩下的事就让我去办。后来，小平同志又让我去管工交财贸，他是总书记。也是开个会，事情就让我去办。这次还是，他是主任，开个会，事情就让我管，他很放手。”

说这番话的时候，薄一波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指名薄一波当副主任。

1979年1月，薄一波从12年的冤案中走出来，邓小平首先找他谈话，安排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1982年，薄一波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薄一波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有10年，前5年作为邓小平的助手，后5年作为陈云的助手。

彭真，文革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历史上，党内地位比较高。在这次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前，在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次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八老”或者逐步巩固在党内的地位（如邓小平和李先念），或者复出，然后再逐渐确立党内地位（如彭真、薄一波）。这三四年的过程中，中国政坛几个比较重要的部门，都显现了“八老”的身影。与此相伴随的是，华国锋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权力。

不过，在1982年前，“八老”是在各自职位上行使着自己的权力，还没有形成所说的“八老治国”或者“议政”的情况，但是，已经开始显现他们因对经济和政治改革看法趋同的聚合。

顾问委员会成立，“八老”的作用开始凸显

在“八老”等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后，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大都年高体弱，精力不济，干部队伍呈老化趋

势；另一方面，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老同志要退让，要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来接班；要趁老同志还在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1981年，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在需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大多数老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认识还不很一致，尤其对老同志让位，一些老人的心态更为复杂。有些老干部受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资格嫩，压不住阵脚，等等。总之，接班人和让位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落实起来，十分艰难。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看法。他说："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让路，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向党和人民交不了账。"

老同志如何交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初步思路：有人说，青年人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们还没有正式讨论，今天我先发个议论吧！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阶层腾出位置。

1980年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做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再次针对一些老同志的担心和顾虑进行说服："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1975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

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这个讲话。9月10日，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一起，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为全党做出表率。

11月10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政治局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是不适当的。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同志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认为，从年轻化角度考虑，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不适宜，他推举了年轻的胡耀邦。鉴于军委主席暂无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年轻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1982年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说：“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

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

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做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的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

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过程中，“八老”的地位开始凸显：

一、从中共十二届领导人组成看，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三老”在政治局常委之列，显示出“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格局：胡耀邦（党的总书记）和赵紫阳（国务院总理）年轻，在第一线工作，后面有“三老”压阵。从1982年以后，“三老”之间对国家改革开放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邓算一方，陈云、李先念算一方。因为有这样的分歧，政治局常委不再开会，年轻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需要在两边进行协调：既要执行邓的指示，也要听陈云、李先念的意见。这样“三老”就基本上退出了前台，率先开始了“八老”议政或者治国的格局。

二、顾问委员会的定位“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为“八老”议政或治国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从中央到省部级，履新者与老同志组成领导集体，上面加上一个顾问委员会，过渡时期的领导体制：履新者尊老，在位的老者强势，在“顾问”之列的老者退下来失落而心理脆弱（怕得不到履新者的尊重），有时候干政的作用格外凸显。所以，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从中央（“八老”）到省部级形成一个老人治国或者议政的局面，顺理成章，而且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总比毛时代一人说了算好；更重要的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三、邓小平设计和创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他自己出任主任，实际上是当了老人们的“头儿”。用通俗的说法，邓小平可以说是“抓老”。这样，新老交替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要邓小平来处理。客观上，邓小平就成为各种力量的交汇点，也是制衡点。而邓小平也在制衡中确立了在“八老”中的最高领导地位。

四、陈云主持中纪委的工作。前面说过，中

纪委是中共最高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组织机构以及人事安排在陈云通盘考虑下总其成。所以，陈云实际上主持着干部培养的工作；1982年，在他建议下，中组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培养年轻干部。所以，用通俗的说法，陈云可以说是“抓小”。他对中共组织队伍的建设和后备干部的选拔付出极大努力。

五、1983年6月，中央书记处以书面通报的方式告知中顾委：“现在有些省反映，住在省里的中顾委委员，对省委工作的干预较多。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请中央顾问委员会研究一下如何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做到他们既能发挥‘余热’，又不至于干扰省委的工作。”这是说的地方的情况。而从中央的情况来说，1984年，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说：“不要老是讲‘发挥余热’了，有时候发挥得别人都受不了啦！”

从中央的“八老”到地方的顾问委员，怎样充分发挥余热，又不会对一线(年轻)同志的工作造成干扰，始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解决好，地方当然更不可能解决好。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为贯穿1980年代的一条历史线索。

邓小平和陈云领衔，“八老”各有侧重

说到“八老”治国，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到1986年，邓小平和陈云领衔。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2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先说第一阶段。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八老”治国的模式以中顾委的方式确立后，“八老”在中央的格局也基本上形成：

邓小平倚重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央形成了一个“邓胡赵体制”，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赵紫阳谈，让他们去执行，基本上是总揽政治和经济的总布局。陈云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地位，基本上把住了中央组织系统的人事任免这一关——他倚重乔石和宋任穷，管好组织工作。

从1980年波兰事件之后，陈云曾有名言：一个经济工作，一个宣传工作，搞不好就要翻船。就经济工作而言，从1980年到1984年，中央的各项经济工作，都闪现着陈云的身影，此前也抓过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常常为陈云所倚重。第一线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也要或主动或被动听取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就宣传工作而言，这一时期陈云格外重视，他特别倚重胡乔木和邓力群，掌管宣传工作：中央书记处是胡乔木，中宣部部长是邓力群。

邓小平和陈云风格不同：邓小平是“钢铁公司”，铁腕执政，而陈云常以中庸取人，以柔克刚。在那个时期，两人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有着高度的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体制。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这两条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党的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在整个1980年代，贯穿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两个基本点”如何统一的问题。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在这个年份，强调前一个基本点；在下个年份，强调后一个基本点。所谓邓力群总结的：单年反右，双年反左。与之相随的是，所谓的“八老”治国，基本上是邓小平和陈云“两老“领衔的双年和单年的格局。

在这个格局下，“八老”中，邓颖超在政治上基本上不说话；彭真在主持宪法及法制建设，算是单列。其他“四老”都在邓小平和陈云两老领衔的格局中，闪现自己的身影，发挥各自的作用：

杨尚昆，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听命于军委主席邓小平；薄一波，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观点一致不隐瞒，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上都有自己的看法；王震，经济改革是邓的支持者，政治上更是超越于邓——对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侧重于后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他在前一个“基本点”支持邓，后一个“基本点”上，他支持陈云和李先念。

在这样的格局下，那时中国的政坛，常常出现后人比较困惑的画面。兹举几例：

画面一：“八老”中的王震，自称戎马生涯一辈子，用他自己自谦的话说是一个“粗人”。他或许从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此外，在那个年代，王震在意识形态领

域也有发言权。譬如，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最早就是王震在讲话中公开提出来的。

画面二：1983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工作，邓小平、陈云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书记处书记胡乔木、邓力群。会议刚开始，陈云发言，拿出稿子念10条意见，大体上是针对总书记胡耀邦的。邓小平和胡耀邦感到很突然。邓小平说这些事以后再议吧，给总书记胡耀邦解了围。不过，会后邓力群却主动传达，将中央高层的分歧暴露给地方。

画面三：1986年，在筹备中共十三大召开时，由薄一波牵头，成立“十三大人事安排小组”。薄一波由此抓中央平时的干部调动权，并向赵紫阳表示，十三大以后，还要长期保留这个小组，以便控制干部管理。

画面四：1988年4月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出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这一年，杨尚昆81岁；上一届的国家主席是李先念，这一年，李先念79岁。81岁的人取代79岁的人担任这一职务。另外，引人瞩目的是，这一届人大，还选出了王震担任国家副主席。

梳理这一段历史，类似上述的场面，还可以举出不少。这样的画面，折射出“八老”尤其是在邓小平和陈云领衔下的政坛格局。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到1992年中顾委机构撤销。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开国元勋全部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八老”中，彭真和邓颖超基本上全退。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杨尚昆在国家主席任上（王震为副主席），从党和国家核心决策层来说，可以说是半退。邓小平仍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仍然为副主任）。同时，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处理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要邓小平来掌舵，处理重大问题上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样的决定，从以后的历史来看，实际上是确立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时的格局来看，以中央决定的形式，确认了邓小平在“八老”中的领导地位。

不过，这时的“八老”，年事已高，无论是全退还是半退，都基本上不再公开露面。陈云有着多年的组织工作经验。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确立邓的地位之后，陈云也基本上退隐。他们对中央决策的意见，也只是私下交流而已。

邓小平、陈云确立第三代领导集体

不过，在中国政坛高层格局中，遇到重大问题时，八老依然是决策之一分子。譬如，1989年5月18日，邓小平召集八老中的大多数成员开会，面对着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做出了戒严和撤换总书记的决定。5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同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王震、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等开会，提议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李鹏、姚依林谈话，就改换领导层问题向两人交底。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正式提出了三代领导集体的概念。

谈话中，为了巩固江泽民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了“核心”的概念。同时，邓小平告诫他们“不要不服气”。谈话最后，邓小平说：

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为了“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

“红色词语”的勃兴和流变

○ 钱 钢

“红辞年代”

就某一类型语词的孕生方式、传播烈度和对社会发生的影响力而言，1956—1969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年代。

这个历史单元之前，中共革命史上曾出现过诸多红色词语（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但没有一个时期能如1956—1969年堪称“红辞年代”。即使这个历史单元之后仍然有过景观各异的“红辞现象”（“全面专政”之类），但“红辞年代”顶峰过矣。1956—1969年，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遭逢的历史课题，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刺激，社会的平均知识水平，以报纸和广播为代表的传播工具的进步，这一切条件的综合，催生了“红色词语”的急速繁衍。而“红辞”的盛行，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走向发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对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红色词语”勃兴和流变的轮廓。[注1]

中共各级党报党刊都曾为”红辞“的传播奋力驰驱，而《解放军报》一马当先。它反证了1956年后的一个微妙现实：毛泽东不喜欢一个时期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而60年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的《解放军报》却越来越受到毛的青睐，成为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阵地。林彪对《解放军报》曾直接间接地做过76次指示。毛泽东在1964年应贺龙请求为《解放军报》题写报名，还为《解放军报》理论专栏《思想战线》题字。《解放军报》作为一份普通公民不得随便订阅的内部报纸，60年代发行量一路飙升，到文革竟高达近200万份，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1966年，毛泽东、江青派女儿肖力（李讷）到《解放军报》，1967年26岁的肖力夺取《解放军报》领导权，直接控制该报1年6个月。毛甚至亲自批复过肖力关于《解放军报》宣传要点的报告，并要《人民日报》参照。

在文革发生前的1956年到1965年间，《解放军报》上传播强度[注2]居于高位的有“资本主义”和“三面红旗”（包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两个词语。它和批判、反对“资本主义”与毛泽东提出的

中的核心”，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989年11月7日，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接任中央军委主席。

这样，江泽民达到了中共权力的顶峰，具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等党政军三项最高职务。在中共历史上，五十年代的毛泽东曾经有过这样的位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有过这样的位置。

在对待江泽民任职这个问题上，陈云和邓小平高度一致（甚至有一种说法说，江泽民是李先念提名推荐的，实际是李先念先听取了陈云的意见）。陈云对江泽民非常支持，在新出版的《陈云年谱》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少他跟江的谈话以及就某一问题给江的批示。

十三大后，中央顾问委员会机关临时党委撤销，下属支部也同时撤销。外地的顾问委员说是由当地党委安排工作学习，也没有实际作为了。之后，中顾委老同志们有组织的活动日渐淡化。

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决定结束中顾委这一机构，让江泽民放手工作。10月，中共十四大做出决定，中顾委如期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八老”参政的局面成为了一段历史，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责任编辑　王彦君）

超常规战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线密切呼应。各年度的强势红色主题词如下：

1956年："（反）官僚主义"（137）。

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39）；"（反）官僚主义"（312）；"（反）资本主义"（396）。

1958年："三面红旗"（2816）；"（反）资本主义"（472）；"共产主义"（1497）；"（反）教条主义"（489）；"政治挂帅"（350）。

1959年："三面红旗"达到该组词语传播强度的峰值（3070），当年军报文章总量为12909篇，平均每4篇中就有1篇使用该组词语。"（反）资本主义"（473）；"共产主义"（1212）；"政治挂帅"（305）。

1960年："三面红旗"（2130）；"（反）资本主义"（423）；"政治挂帅"（397），"政治挂帅"达到该词传播强度指数的峰值。

1961年："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355）；"调查研究"（839），为该词强度指数峰值；"三面红旗"的指数虽大幅下滑，但仍居高位（1280）。

1962年："调查研究"（432）；"三面红旗"（690）。

1963年："阶级斗争"（556）；"（反）修正主义"（496）；"四个第一"（417）；"调查研究"（314）；"（反）资本主义"（387）；"三面红旗"（574）。

1964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331）；"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360）；"四个第一"（625）；"阶级斗争"（791）；"（反）资本主义"（358）；"（反）修正主义"（469）；"调查研究"（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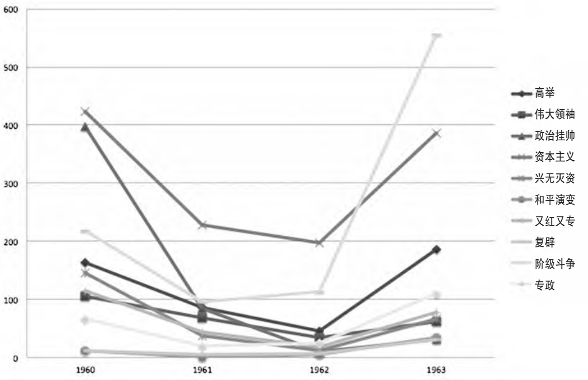
1965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407）；"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736）；"突出政治"（746）；"阶级斗争"（538）；"（反）修正主义"（411）；"一分为二"（365）。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红色词语"，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红又专""兴无灭资""（反）和平演变""思想革命化""接班人""大公无私""共产党员的修养""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反）主观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伟大领袖"。而文革时期的强势词语"（反）复辟""世界革命""精神原子弹"，这一时期也已初现端倪。

如果说，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红色词语"，鲜明地带有中共八大的印记，那么，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则使流行政治词语出现了游离甚或叛离中共八大路线的转折。这一时期的若干词语，对于一系列在60年代不断膨胀，直至文革时期达到巅峰的"红色语词"具有"源代码"意义：对领袖和领袖思想的颂扬之辞，突破了八大的节制；"政治挂帅""又红又专"，实际上是"突出政治""精神原子弹"的滥觞；对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表述，为后来从反帝、反修，到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类"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式的斗争词语，搭建了步步升级的平台；而"大公无私""兴无灭资"则分明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先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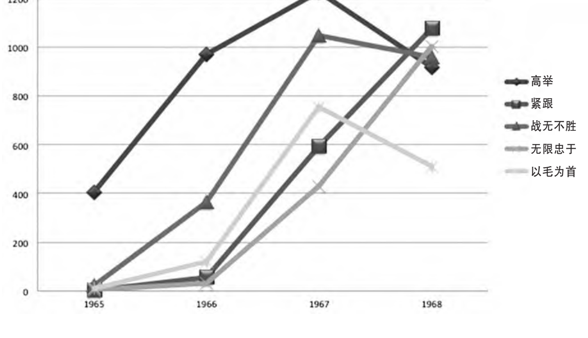
但是，1960年之后，有若干强势政治词语，在1961年和1962年强度持续下滑，到1963年状态又一起回升，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红辞小冰期"。这一耐人寻味的图形，透露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后被迫退却情势和中共党内斗争的复杂信息：

红辞小冰期（1960—1963）



文化革命，是红色词语的"井喷期"。"高举""紧跟""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无产阶级专政""兴无灭资/灭资兴无""顶峰""活学活用""最高（最新）指示""三忠于"、"四无限"等词语，如洪水滔天。以下列五个词为例——

文革红色词语井喷（1965—1968）



每个”红色词语”都有自己的历史。一些“红辞”昙花一现;一些红辞由盛而衰,另一些以顽强的生命力跨时代存活。许多红辞异形同义,概念反复,如对领袖的颂扬之辞。另一些却在不同时期同形异义,名实关系复杂费解,如“发扬民主”。对它们的一一考证和解读,对梳理“左”倾政治文化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红色词语”中的“政治”

“红色词语”中的“政治挂帅”“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等,都表述了“政治”和其他事物的关系。在流行于社会的过程中,“政治”一词事实上等同于“思想”“精神”,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的力量。但1949年执政以后,对经济规律、人的利益需求开始重视。军队告别战时共产主义状态,实行薪金制和军衔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甚至提醒“要防止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的倾向”。[注3]

1957年的“反右”,批判了“右派”对“政治挂帅”和“又红又专”的“攻击”,“红”成为一种立场。对人的精神作用的更大张扬,始于“大跃进”。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号召:必须实行“政治挂帅”,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提倡共产主义的崇高风格,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注4]

1958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解放》杂志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注5]一文,攻击现行工资制度,批判按劳分配,鼓吹“政治挂帅”。

“大跃进”的失败,使人们对“政治挂帅”进行反思。彭德怀在他因言贾祸的“万言书”中给予尖锐批评,“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后,政治的地位上升。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1959年接替了彭德怀的军内职务。他在1960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胜利的基本因素还是人民群众,还是广大官兵,还是靠军队中间的政治挂帅,政治工作,还是靠勇敢,还是靠政治,这可说是一切因素中间的主要因素。”

196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提出了著名的“四个第一”,即: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在各项工作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活的思想第一。

1960年8月1日,《解放军报》为军事博物馆开馆而发表的社论第一次使用了“精神原子弹”一词。

然而,正如一批“红色词语”在1961—1962年间遇到“小冰期”,在有关政治挂帅的问题上出现过另一种声音。1961年夏天,陈毅对北京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发表讲话。他说:“前一个时期,有的单位把那些埋头搞业务,少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的人,当作白色专家来进行批判。这是不对的,应该予以纠正。目前我们国家正需要大批专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埋头搞业务,对社会主义建设,对祖国、对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正是值得欢迎的。不仅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为他们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埋头搞业务。”[注6]

几乎在同时,聂荣臻也对青年发表了《语重心长谈学习》一文。他说:“我们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业务。红必须落实,不是空空洞洞的,从来没有空空洞洞的政治,政治总要通过实际工作来体现。……空洞地要求红,忽视对业务的要求,忽视对实际工作中知识和技能的钻研,那就会变成空头政治家。”“有的人片面强调要红,认为专了就不能红,因此,不钻研业务、不读书,认为专不专无关重要,这也是对又红又专方向的误解。”[注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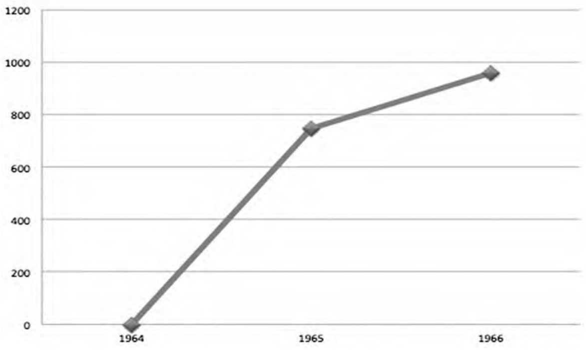
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充分肯定“政治挂帅”的前提下,一面大抓军队的“革命化”,一面大抓军事训练。他的言行,成为后来在“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搞折衷主义”罪名下遭到打击的借口。

1963—1964年,对“政治”的宣传又开始升温。1964年底,围绕《解放军报》1965年元旦社论的起草,发生“北稿”和“南稿”的争议。“北稿”由罗瑞卿在北京组织班子草拟,“南稿”由正在部队蹲点的叶群组织班子草拟。“南稿”奉林彪之命,强调“突出政治”。这是“突出政治”一词第一

次见诸报端。

1965—1966年上半年，“突出政治”一词不仅在《解放军报》，也在全国各媒体以空前的强度传播，形成“红辞高峰”：

《解放军报》上的“突出政治”(1964—1966)



就在这种浓烈的“政治空气”中，1965年，解放军几乎无震荡地进行了一场世界罕见的军队体制改革：取消军衔，大幅减低军官薪金。革命的道德激情，完全压倒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军队特有的军阶荣誉感。

1966年，《解放军报》连续发表7篇社论“七论突出政治”，《人民日报》也先后发表3篇社论“三论突出政治”，其中第二篇《政治统帅业务》，根据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关于“政治要统帅业务，但是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的指示精神，提出“任何政治，都要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把政治和业务割裂开来，认为政治和业务可以互相分离，这是根本违反客观实际，因而是错误的”。《解放军报》迅速对此做出反应，向《人民日报》发难：什么“政治必须通过业务来实现”呀，什么“突出政治归根到底是为了搞好业务”呀，统统是谬论。注8

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在社会语言中“政治”一词已经占据压倒优势，“把政治搞得浓浓的”“政治要在百分之百的时间起作用”等成为口头禅。1964年的“大比武”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罗瑞卿因“反对突出政治”而被打倒。在军队，一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成为全军乃至全国的榜样，人的精神的作用被夸大到极致。

“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以其惊人的胆魄进行的超常规发展的试验，试图最大限度调动人的能量，使全民以最小的物欲、最大的献身精神创造世界上最辉煌的经济发展奇迹。毛泽东在60年代激赏林彪在军队推行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让全国效仿的时候，再次表现出对超人精神的向往。

“红色词语”中的“斗争”

1956年中共八大结束后仅3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注9他所指的是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现阶段“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述。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再次否定八大决议，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10

“红色词语”的一个基调是“斗争”。斗争的对象，在1949年后最初包括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不法资本家、搞阴谋活动的“反党分子”；后来有资产阶级右派、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国际，从最初的帝国主义，扩展到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则从对南斯拉夫的特指扩展到苏联和几乎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帝修反”的斗争进一步延伸到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对象是中央所出的修正主义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关“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反资本主义复辟”等“红色词语”，在1962年8月后强度骤增。《解放军报》1962年全年使用“阶级斗争”一词的文章114篇，其中79篇发表于8月1日之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两年反省、退却阶段的中止。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本身就是60年代影响深远的一批红词的“词库”：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

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注11

《解放军报》对"阶级斗争"一词的传播强度指数，1963年达到556，1964年升至791。《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和平演变"这个词在1959年以前的《解放军报》没有出现过。它在媒体的第一次亮相，出自1960年康生在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康生说：

在世界各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的压力下，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做出某些和平的表示。当然，谈和平总比谈战争好。可是，连美国统治集团也不讳言，他们这种做法上的改变，是要以所谓"和平取胜的战略"来麻痹世界人民的斗志，破坏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所谓"和平演变"。注12

《解放军报》上的"和平演变"（1959—1964）

1960年媒体使用"和平演变"一词的频率增大，经过1961—1962年的"小冰期"，1963—1964年强度迅速上升：

"修正主义"一词和与此相关的"反修防修"等"红色词语"的流行，更直接的导因是十年中苏论战。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反对修正主义的立场。

"修正主义"一词的强势传播，同样是在1962年8月之后。当年《解放军报》使用"修正主义"一词的180篇文章，有136篇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后见报的。1963—1964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撰写的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陆续发表，使这两年《解放军报》上"修正主义"一词的传播强度指数分别达到496、469。

在文革发动之初就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的彭真，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讲话，也呼吁警惕内部出现修正主义：

同志们！不要以为我们这里不会出修正主义。如果不好好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教育，也可能出修正主义。注13

《解放军报》上第一次出现"苏修"的缩略语是在1965年12月29日第3版，一则报道的标题是：《苏修是美帝进攻世界人民的主要支柱　美苏印结成联盟反对中国反对革命》。而"帝修反"一词的原创者是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和人做斗争（阶级斗争）；和自然做斗争，生产斗争；国际上顶住帝、修、反；国内顶住黑风，向困难作斗争。"注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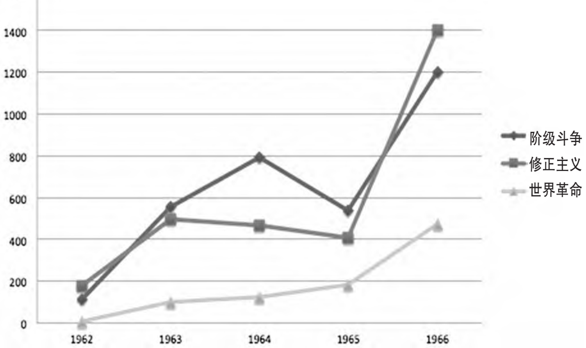
和"反修防修"的传播强度同步上升的，是"世界革命"。从1963年到1966年，这个词在《解放军报》的出现频率不断提高。

196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在当时引起全社会和世界的轰动。该文有一段名言：

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当毛泽东推翻中共八大的决议，重新定义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一个魔瓶便被打开。"阶级斗争""修正主义""世界革命"几个词的强度从1965年起同时跃升：

斗争红辞（1962—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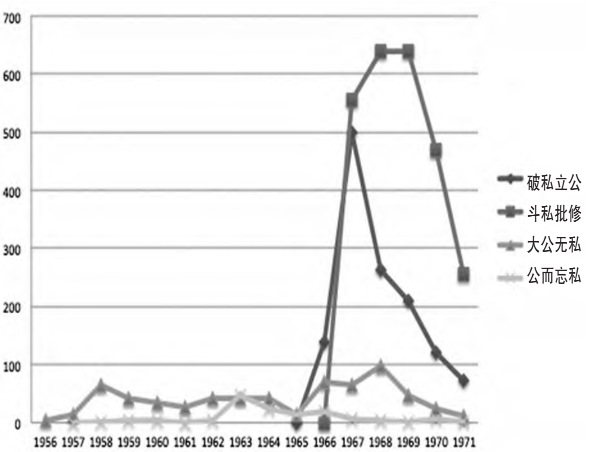


如果说，毛泽东在50年代用乌托邦主义调

制了中国式的“兴奋剂”，那么60年代，他调制的“不断斗争”的猛药则使中国在20世纪中期进入了“斗争”的永动机。

“红色词语”与“灵魂深处的革命”

在文革最狂热的时期媒体出现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语，把旨在“塑造人”的“红辞”推向极致。它是这一群“红色词语”繁衍、滋生的必然结果，这些词，包括“兴无灭资”“（反）和平演变”“接班人”“思想革命化”“改造思想”。其中，“大公无私”乃至“斗私批修”这一组词的流变，犹具标志性。如图所示：



值得考察的是，在远没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极端词语的年代，中国的历史为这些“红色词语”的化生预备了什么样的土壤？这就是1949年后一代职业革命家所遭逢的困境：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以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土地的分配相号召，动员民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战胜了国民党。但是执政后，私与公却成为一架无法平衡的天平。中共当时所认识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以公为旗帜的；而超常规的发展战略，必然要求人民放弃私。历史证明这是最大的空想。

“大公无私”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遗留的道德语言[注15]，国共两党都一直使用。在全面动员民众投入“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1958年，“大公无私”的传播强度增加。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另一句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度却更为强势：“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所担负的工作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能为别人服务，是光荣的行为。因此，你对服务对象越是热情、亲切，越是光荣，也会受到人们的尊敬。”[注16]

有人参观了最早成立的人民公社后谈到农民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解：“他们说：除开我的衣服用具外，什么都不是我的，但什么又都是我的，什么都有我一份。”[注17]然而公社化的进程远不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话那么温情。《解放军报》曾报道一名连队指导员，把老家即将盖好的新房子和为老母亲预备的寿材无偿交给人民公社“共产”的痛苦经历。[注18]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报纸猝然问世，又迅疾消失。在一次接见军队青年积极分子的时候，彭德怀对这个词表示了异议：

彭总又说到了服务态度问题。他认为“大家为个人，个人为大家”比“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好，前一句话里没有“我”字。他说：我们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要建成社会主义是长期的任务。也许十五年、二十年，也许还更长一点。但是我们的思想要领先，“各尽其能，按劳付酬”，并不是要人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我们应该树立多做工作、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注19]

这个词的传播于是戛然而止，“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继续充任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关键词。有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倡导共产主义思想表示怀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的提法违反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解放军报》为此曾组织专题讨论。有作者辩驳：

作为社会制度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实是两个不同质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作为思想体系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却并没有划得一清二楚的界线。“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为了要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注20]

“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这两个词，文革前传播强度相似，但它们的“音调”有细微的差别。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60年代再版，对传播“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精神起过重要作用。他在该书中指出：任何一个同志，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只有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私人目的和打算，他真正大公无私，那么，他有可能最大地勇敢、诚恳、坦白和愉快。从《解放军报》的报道可知，当时军队树

立的先进典型——雷锋、欧阳海、“硬骨头六连”等,无不把《修养》当作确立共产主义品德的必读书。该报多次出现“活学活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说法。

传播强度在1964年突然增大的“思想革命化”一词,和“大公无私”异曲同工。当越来越强调“人的因素”,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公”的含义,更鲜明地指向革命、指向党;“无私”的含义,则更鲜明地强调服从和奉献。

“破私立公”一词把“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中的“忘”和“无”变成了更无情的“破”,《解放军报》首次出现“破私立公”是在1966年3月29日第4版——

私心是资产阶级“驻我办事处”,私心越重,对敌人越有好处。

破私立公,改造思想,不能一劳永逸,也不能有劳有逸,要打“近战”“肉搏战”“持久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文革开始后不久,林彪鲜明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像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他把共产主义概括为“公”产主义。[注21]

从1966年到1967年,《解放军报》发表3篇社论,三论“突出一个公字”。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的面前。破私立公,是改造世界观的核心问题。

“革自己的命”的更高阶段是“斗私批修”。这个红辞把革除自我和你死我活的“反修防修”斗争紧紧连在一起,“一心为公、一切为公、一生为公”“见私就恨,有私必歼”等口号与之交相呼应。

“斗私批修”的英雄,是勇敢抢救旅客列车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驻山西省某工程部队十连战士年四旺。他“身负重伤、记忆力受到严重破坏”,而这位“批修的先锋,斗私的闯将”仍然念念不忘毛主席,歌唱《东方红》,背诵毛语录。

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初期,谁也没有预见这样的归宿。亿万个自我被消灭的同时,领袖一个自我急剧膨胀。民众善良的道德饥渴,青年在现代社会原应具备的公共观念、集体意识、利他精神,都在红辞一遍遍涂抹下,变成具有暴力倾向和自虐倾向的原教旨主义。而为了党的事业曾把“大公无私”在这个国度不遗余力传布的刘少奇等人,则在“红辞”喧嚣之时,鱼贯葬身火海。

注释:

注1　《解放军报》是一个典型的标本。50年代的《解放军报》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的“部队版”(《解放军报》原总编辑赵易亚语),而60年代后该报则成为传播红色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媒体。该报数据检索光盘的出版,使计量研究具备可能,本文资料取自该报。

注2　本文使用的“强度指数”,是指各年度《解放军报》使用某一词语的文章篇数。

注3　《解放军报》1956年9月20日第3版。

注4　《解放军报》1958年5月25日第1版。

注5　毛泽东加批语由《人民日报》在1958年10月13日第7版转载。

注6　《解放军报》1961年9月6日第1版。

注7　《解放军报》1961年9月18日第1版。

注8　《解放军报》1966年5月18日第1版。

注9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王光美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页。

注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2卷(上)第104页。

注11　《解放军报》1962年9月29日第1版。

注12　《解放军报》1960年2月6日第1版。

注13　《解放军报》1964年8月1日第2版。

注14　《解放军报》1966年3月3日第2版。

注15　如龚自珍就曾说过“大公无私”。

注16　《解放军报》1958年4月7日第2版。

注17　《解放军报》1958年8月26日第3版《进一步理解共产主义》。

注18　《解放军报》1958年11月19日第3版《崔振兴大破私有记》。

注19　《解放军报》1958年12月1日第1版。

注20　《解放军报》1959年1月18日第3版。

注21　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　王彦君)

邓小平“8·18”讲话的现实意义

○ 陈 剑

35年前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做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这一讲话是一篇论述政治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丰厚政治遗产。今天重温这个讲话，仍然强烈感受到重大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讲话的现实意义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如何克服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邓小平“8·18”讲话涉及如何克服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之所以强调这一内容，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邓小平与李维汉的谈话。李维汉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同周恩来、赵世炎等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后回国，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后，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1980年代任中顾委副主任。李是湖南人，毕业于湖南师范，是毛泽东同乡、同学，1918年4月，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共同创建新民学会。但这样一位和毛泽东关系十分密切的同学、乡友，在文革期间却惨遭迫害。这促使其思考。李对邓讲，在总结历史教训时，看来更危险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专制主义复辟。这个谈话对邓有很大触动，邓“8·18”讲话一个重要结论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严重错误，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义的余毒’”，如何根除封建主义余毒，是党面临的十分艰巨的任务。

邓小平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主要弊端，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对其表现做了详尽分析。并认为，这些与封建主义残余都有密切关联。

邓小平说：“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邓小平分析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家长制作风，邓小平也做了分析，“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邓小平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包括问题的表现和

问题产生的根源，十分精准到位。35年过去了，仍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揭露出来的诸多腐败大案中可以看出，人身依附和群体性腐败引人瞩目。在“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军队的“东北帮”和“西北帮”等腐败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实际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家依附“帮主”，下层依附上层，盘根错节，沆瀣一气、政商输送、聚敛财富、穷奢极欲、鸡犬升天。令人吃惊的是，一些省部级领导、部队的军级将官实际已经沦为“大老虎”的家臣、家奴。

当下中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象严重，官商、特权横行，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制衡，人身依附，对上级“尽忠”，个人崇拜现象有着丰沃的土壤。也就是说，邓所分析的“封建主义的残余”，至今在中国大地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仍然在我们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并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依然面临着如何清除封建主义残余的艰巨任务。可以说，党内如此强势且庞大的利益集团，甚至难以用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概括，而是在党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这意味着，当下中国诸多问题，主要不是所谓“西化”或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的尖锐问题。

21世纪，在世界文明潮流大踏步前进的时代，中共党内出现大面积的带有封建特征的人身依附的群体性腐败，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从大的背景看，这是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民主政治发育不充分所致。从社会转型分析，实际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与不完全的市场相结合的产物。

改革开放前，由于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生产力不发达，剩余产品很少，国家和社会物资匮乏，客观环境对腐败有一定遏制作用。那时候党内腐败主要表现为高级干部的“特殊化”和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高度集权前提下的改革开放，政府主导经济，官僚驾驭资本，权力与资本迅速结合，官场腐败加官僚资本膨胀，导致腐败迅速蔓延。

改革开放至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仍然是邓小平批评的那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体制，赋予了“一把手”很大权力。在这种体制下，“一把手”很容易把自己领导的单位变成独立王国。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山寨，“一把手”实际就是一个山寨的寨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把手说了算，促使干部靠依附关系升迁。“人身依附”就成为这种体制的重要特征。

现实生活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仍是革命战争时期的“等级授权制”。各种民意测验、民主推荐形式很多，但难以起到作用，很多事都是可以操纵的。现实告诉人们，“朝中有人好做官”，人身依附是获得权力的捷径。坚守人格、坚持原则等于迂腐保守、书生气十足。干部队伍中人格独立、精神世界丰富的人，往往被边缘化。

中国共产党是反封建起家的。但夺取政权后，反对封建主义任务戛然而止，封建专制主义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文化大革命，个人迷信达到极致，“三忠于、四无限”，把领袖推到神坛，使国家和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但文革惨痛的教训没有得到认真汲取。改革开放后，封建主义与极“左”思潮杂交出新的变种，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一套无视法律、“左”得出奇的东西，跟封建专制、朋党团伙血脉相通，基因相传，左、封、腐成了孪生兄弟。封建专制主义基因至今没有得到认真清理，甚至还披上华丽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居于庙堂之上，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为腐败团伙的“家长”，说明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仍有重大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22日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十分到位。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避免上述现象的产生呢？

二、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制度

如何才能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邓小平提出的思路是，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为了加深对邓小平这一思想的认识，让我们再次重温邓小平对好的制度的论述：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同志上述讲话，虽然已过去35年，但对当下中国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建立好的制度遏制公权力泛滥和严重的腐败。面对严峻的腐败形势，特别是掌握巨大权力的高层领导人的腐败，例如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等人的腐败，给党和国家，包括他个人和家庭都带来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周永康等人当然有责任，但我们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也十分显然。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中总结出深刻的教训，避免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

邓小平说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实际包含着毛泽东、邓小平对英、法、美等西方国家权力制衡制度的肯定。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制度，一定是一个权力制衡制度。如何建设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这实际上是邓小平提出，但尚未完全破解的问题。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对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起的作用，我们长期重视不够，认识不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落到实处。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一定是一个较为公平的政治制度，一定是公权力得到很好监督，并保障对每个人的人格和权利的尊重。这也是自由平等的基本含义。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权利。自由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言论、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实现。保证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就必须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而要在权力之间实现监督制衡，需要民主，包括选举民主、协商民主有深厚的基础。权力制衡有多种形式。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原则，是一个好的制度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特征，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制度必备的前提。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由于民主传统和民主意识薄弱，特别是选举民主缺乏深厚基础，现有的一些体制，其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中国人民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其巨大潜力和能量没有得到很好释放；由于一些监督和制衡手段相对乏力，使得公权力过于张狂，经常逾越法律的边界，产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同时也影响了公民言论、信仰等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此外，由于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公民政治参与不足，这些都影响了较为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建立。

如何建设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当然需要公民民主意识的提升，需要民主有一个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但在推进民主的同时，以下三方面内容不可或缺：

一是学习和借鉴。就是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的内容为我所用。在这方面，当下中国，理论上的混乱达到了新境界。一种倾向是，把人类政治文明应当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简单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或者用“西化”词语对西方政治文明有价值的内容加以排斥。实际上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没有“西化”的基因。现实生活中，危险的是对人类文明有价值内容的排斥。诚如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几十年的‘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现在看来，经常指责他人

“西化”的人，正是这种最大的危险。如果给他们戴一个帽子，就是阻挠中国吸收人类有价值的内容，就是阻挠中国全面进步的步伐。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讲话时总结的邓小平的六大遗产，特别是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在当下中国更需要很好地继承。就是要有政治勇气，克服各种阻挠，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的内容为我所用，而不受各种因素干扰，就显得尤为迫切。

实际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深对3个规律的认识，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中，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尤为重要。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制度才会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使13亿中国人受益。

二是加强制度设计。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来说，政治制度设计的重要性，类似于城市的规划设计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城市规划合理，需要树立历史观、整体观、动态平衡、超前意识等，只有这样，城市发展才会少一些折腾，城市布局才有可能合理。

制度设计，特别是政治制度设计，通过“选择”和“择优”，设计相对合理的体制、结构或程序，使它能达到“最佳”状态，并提供实现一定目标的技术方案。主要内容包括规则设计，通过设置刚性的规制以约束和规范特定对象，例如宪法、法律的制定，都属规则设计范畴；架构性设计，通过结构创设，建构一定的政治建筑，例如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属于半个世纪以前的政治架构性设计；程序性设计，就是以刚性的“秩序”来保证过程和结果的相对公正。

长期以来，我们对制度设计特别是政治制度设计认识不足，对一个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长治久安的巨大积极意义认识有限。对在制度设计中人类通行的理念和规则，例如对权力的制约，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认识，往往采取漠视的态度，这也使得我们现存的制度显现出的一些缺陷和不足没有进行深入探讨，没有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方面下功夫。

制度设计的意义在于，人都是有缺陷的，不能依赖“觉悟”“自律”，需要有完善的体制建构和制度钳制，需要有邓小平所希望的那种好的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普遍幸福，个人的尊严得以尊重，公民权利得以实现。

三是从现有制度入手。改革之所以要从现有制度着手进行，因为现有制度已经实施多年，其优势和强项，弊端和不足，已为人们认识，从现有制度着手进行改革，风险小且实施方案便于操作，也易为人们接受。

从现有制度着手进行改革，需要对现有的制度做深入分析，其优势和弊端都要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体制方面的弊端，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制定的改革方案也就很难取得成效，其弊端有可能会继续保留。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要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改革，需要了解这一制度的特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进行改革。只有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革方案，才会有很强的针对性，就会少一些风险，使改革的成本降到很低的程度。

从现有制度入手，即从现有的以存续多年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入手，重点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改革，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党内民主和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等内容。这些改革都需要有具体内容和细节给予支撑。■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　丁　东）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超越“五阶段论”

○　杨善准

当今中国经济改革正在深入，社会思想活跃，又很混乱。问题之一是出在判断是非的标准仍停留在“五阶段论”思维的框架内，理论的滞后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

社会发展史曾经是中国人必修的政治课，其核心是“五阶段论”。“五阶段论”的发明者是斯大林。他主持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五种社会形态规定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据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将其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灵魂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渊源。“五阶段论”断言，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由低向高演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根据这一规律，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

20世纪亚非拉广大地区曾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五阶段论”曾鼓舞被压迫民族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政治斗争。苏联、东欧和部分亚非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一度生机盎然。可是不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裂，苏联解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五阶段论”黯然失色。当今虽然少数国家仍宣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政治制度各不相同，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有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的分权制，还有世袭制。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显然，“五阶段论”已不能解释当今世界现状。

五阶段的确定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其要害是消灭私有制。农业文明早期，生产力低下，人们追求社会公正，有人把私有制说成是万恶之源。在这一大背景下，《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是经济不发达时代的产物。

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发达国家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一反传统的激进看法，不再主张消灭私有制。恩格斯于晚年明确承认当年“消灭私有制”的提法是一失误。他在临去世前写道：“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后来产生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争。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社会民主党国际存在至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很简单，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建立自由人的共同体，不是让大家成为穷光蛋，而是人人有产，共同富裕。可是不发达地区的革命者仍习惯于用陈旧的思维对待“消灭私有制”的论述，并简单地将其付诸实施。

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可以保证社会有序运行，这不等于说国民经济全都必须采取国有制或公有制。公平与效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事实上，中国不少国企亏损了国家补贴，盈利了高管首先得益，造成惊人的工资差距。而西方发达国家，不少亿万富豪经营一辈子集聚了巨额财富，他们不是把家产留给子孙，而是捐献给慈善机构。这充分说明，社会不公的根源同每个人的文化道德素质和价值观密切相连。在我们这个世界，有的人终身追求日益膨胀的私欲——权、财、色，而另一些人则把奉献社会作为人生目的。

“五阶段论”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切交给国家管理，似乎只要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英明领袖就能把社会带进无限美好的天堂。人类社会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有继承，也有扬弃。简单地把不同文明、不同国度的社会装进“五阶段论”的框架里，片面地把封建社会等同于愚昧落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荒淫奢侈，并不符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斯大林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在城市扫除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农村剥夺富裕农民。在中国，则发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事。社会主义成为

打人的棍棒。政治上打击地富反坏右,思想文化领域铲除封、资、修。党内走资派的大帽子满天飞,今天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明天就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校知名教授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不断挨批斗,甚至农村搞点家庭副业的农民也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外则要打倒帝、修、反。结果是社会动乱,国民经济衰败,人民生活困苦,国际上自我孤立,险遭原子弹打击。最高领导不得不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作为国策。

邓小平为了摆脱困局,力主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包产到户和允许城乡个体经济开始,进一步承认雇工经营、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时大胆吸引外资,使私有制得到恢复与壮大。政策的改变引起一些固守马列主义高调的人的不满。由于“五阶段论”仍然被认为是真理,搞私有经济乃罪大恶极。邓小平只得决定不争论“姓社姓资”问题,同时,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就出现了打左灯向右转的奇特景象。直到现在我们党一直遵循这一方针,避免争论“姓社姓资”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们开放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快速增长,人民收入较快提高,名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争论使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理论问题仍悬而未决。世界上社会主义五花八门,其内涵没有明确的界定,有国家社会主义,有封建社会主义,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民富国强,经济、科学、文化发达。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从上到下都善于科学辩证思维、道德品格高尚、富于奉献精神。

由于没有从理论的根基上分清是非,中央的许多重大举措不能理直气壮。不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切割,无异于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进入互联网时代,民间的探索者大有人在,一些经历时代风雨和大起大落的老人,反思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出于责任感和无私无畏精神,冲破旧的偏见,提出了新的观点。周有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提出,苏联的瓦解证明“五阶段论”是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如何分期,各期如何定名,要重新研究。他主张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涵概括为三个层次:经济上是农业化—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政治上是神权政治—君权政治—民权政治。思想文化上是神学思想—玄学思想—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强调实事求是,尊重权威,但不迷信,随着认识的加深,不断否定过时的认识,推出新的理论。任何理论只有在争论中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修正,才能显示其光辉,一旦僵化,真理也会变为谬误。周有光的观点不一定全都正确,但为创新开了一扇窗户,人们重新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月2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许多重大现实问题需要用创新的理论予以分析,许多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需要用创新的理论予以明辨,许多思想困惑需要用创新的理论予以阐释。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周有光的“三面三层”学说,可以从理论上说明当前中央政策的正确,进一步深层次的改革,也可以从周有光的论述中得到新的启示。以周有光“三面三层”理论为立足点,可以对当前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符合时代和现实要求的理论说明;进一步深入研究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新的共识。

我们不能口头上讲开拓创新,可是思维方法仍是老一套,只会给经典作家做注解,这同日新月异的世界新潮流相去太远。当今世界已进入人民群众聪明才智高度发展和新知识、新理论大爆炸的时代,不仅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如此。普通百姓关心国家大事,发表各种意见,这是民族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应当充分发扬民主,鼓励独立思考,探索前人未涉及的研究领域,欢迎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其向良性方向发展。

理论创新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思想家都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其观点不可能全都正确、永远正确。但是任何观

反腐败治本一策

○ 吴　敏

反腐败是一场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现在，“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实施已将近三年,高压反腐初见成效，“治本”的问题似应提上日程了。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前者以实现廉洁政府、廉洁政党、廉洁公务员的思想、组织和体制机制保障为基本内涵，后者是指对腐败分子的揭露、查证和惩处，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里决定性、关键性的枢纽，旨在实现领导核心的净化、优化和强化。如果这个枢纽被扭曲、被掣肘，其他三个全面都要受影响。全面从严治党所涵盖的诸多内容里，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失守了，全面从严治党就失败了。显然，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最后的撒手锏”。“撒手锏”者，从手中“撒”出去的“锏”之谓也。如果此招不起作用，手中就没有其他武器可用了，只能面临败亡的命运。

虽然我们党越来越强调反腐败，要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也采取了不少实际措施，惩处了陈良宇、成克杰等许多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但在1989年之后的20多年间，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一直发展到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地步。从去年至今，媒体称山西是“塌方式腐败”。其实，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以及与其狼狈为奸的诸多“老虎”和“苍蝇”相继被揭露，岂不也意味着他们当政时的那些声名显赫的国家级机关和权威部门，也是“塌方式腐败”吗？十七届军事委员会两个副主席都是极为恶劣的腐败分子，他们周围还衍生了相当规模的腐败团伙，难道还够不上是“塌方式腐败”？以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为轴心，里勾外连，盘根错节，形成了包括众多高层要害部门领导干部在内的庞大腐败群体，这不是“塌方式腐败”又是什么？而且，腐败现象已经不只发生于执掌国家权力的“老虎”和“苍蝇”身上，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被污染了，连向来被视为“净土”的学校、医院甚至幼儿园也未能幸免。

为什么“反腐败”口号越喊越响，而腐败浊流却愈益泛滥和凶猛呢？

邓小平早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331页）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过分集中又缺乏制约的权力是腐败的“总病根”，不可避免地要滋生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腐败现象。

怎样铲除“总病根”呢？邓小平80年代提出的思路，一是横向的“党政职能分开”，保证政权

点只要有一点新的闪光点，都应当受到重视。因为各种各样的闪光智慧加在一起，思想的涓涓细流才能汇集成智慧的洪流，形成完整的新理论，为全世界的思想宝库增添一份新贡献。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强国。■

（作者曾任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参赞、临时代办兼总领事）

（责任编辑　丁　东）

组织充分发挥职能；二是纵向的“进一步下放权力”，把党政机关掌握的权力逐步下放给社会、基层和公民，下放给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由他们按照法律法规行使权力和权利。遗憾的是，1989年以后的20多年间，“党政分开”连提都不提了；“下放权力”则是时放时收、此放彼收，总的趋势是经济权力下放得比较彻底，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权力特别是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则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集中于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在相当一些地方，索贿受贿、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肆无忌惮、恣意蔓延，而执法部门以“维稳”为托词和旗号，对群众的“维权”呼声和行为，对批评权力滥用和寻租的社会舆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动辄以强制或暴力手段予以压制，甚至编造罪名随意抓人。这样一来，过分集中又缺乏制约的权力更加有恃无恐、恣意寻租，成了为所欲为的“巨无霸”，腐败浊流自然就愈益泛滥和凶猛了。腐败病毒在党政系统愈益恶化，不可避免地要扩散到社会肌体各个领域，致使各个领域的公共资源发生蜕变，成了其执掌者谋取私利的凭籍和资本。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果断地“老虎”“苍蝇”一起打，挖出了一大批贪污受贿金额达天文数字的腐败分子，形成了雷霆万钧的高压反腐态势，初步遏制住了腐败浊流的继续泛滥。要进一步引深反腐败斗争，必须在强力“治标”的基础上注重“治本”，根据现阶段的新环境、新认识，借鉴世界各国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有益经验，坚决而全面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实际操作的步骤而言，应该先抓好执政党自身的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推进党内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有效制衡，重建党内决策机关（党的代表大会）、执行机关（党的委员会）、监督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相互之间的科学架构，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各级党代会在相当程度上被仪式化、程序化了，很难真正发挥党的决策机关的职能和作用。有关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诸项重大问题，党的委员会（主要是党委常委会）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经向一定范围征询意见，就基本确定了，召开党代会只不过是履行一下程序，办一个组织手续。现在党的决策机关实际上是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常委会。

关于党委和纪检委的关系，按照现行党章第19、25条规定，党委和纪检委均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均要向同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应该是平行、并列的关系，纪检委肩负着对同级党委的监督职能。但党章第43条又规定，各级纪检委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各级纪检委选举产生的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要报同级党委批准。这又否定了他们之间的平行、并列关系，使纪检委成了接受同级党委领导的下级机关。在日常实际工作中，纪检委既要接受上级纪检委的领导，也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一般来说，后者较之前者要更直接、更经常、更强劲。纪检委在处理重要问题时，首先得考虑并服从同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的态度和意见，很难完全履行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的监督职能。

在苏共历史上，列宁1920年主导建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是平行、并列的关系，二者均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和报告工作。但斯大林对联共（布）原有组织架构采取隐而不露、釜底抽薪的策略，一步步地削弱党的代表大会、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和职权。到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党的代表大会不仅已经虚化、仪式化了，而且党的监察委员会已被置于了党的委员会领导之下，使党的决策、执行、监督三种权力全部集中到了各级党委。

我们党要从根本上防治腐败，必须告别斯大林模式，明确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独立行使党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力，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体系，为实现党内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基础。唯有如此，我们党才能走出“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死胡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党内权力的科学配置和有效制衡，是对党内权力过分集中传统模式的根本否定，是对党内权力架构的再造和重建，势必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感、抵

触。但只有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配置给不同的权力主体，形成有效制衡的权力架构，各级党委的组成人员特别是党委书记，才有可能更谨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构筑起各级党委组成人员特别是党委书记政治安全的制度性保障。过去，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刀刃再锋利也砍不到刀背上”，表面上威风凛凛、气势如虹，实际上潜存着极大的危险，很难避免被权力腐蚀和吞噬，坠入腐败的深渊。去年以来，山西省揭露出来的申维辰、陈川平、杜善学、聂春玉、白云、王茂社、董洪运、丰立祥等腐败官员，先后担任过晋中、太原、长治、吕梁、阳泉、朔州、运城、忻州、大同的市委书记，他们的腐败罪行均发生于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有的甚至是“前腐后继”、走一处贪一处。全省11个市就有9个市的市委书记堕落成了腐败分子，这是何等触目惊心！客观地说，这些官员并非原本就是坏人，而是其手中缺乏制约的权力使他们头脑发晕，为所欲为。是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体制葬送了他们，把他们送进了监狱。

实现党内权力的科学配置和有效制衡，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党代会代表不能继续由党委组织部门内部确定，而要通过公开竞争性的选举产生，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且要缩减代表人数，确保党代会精干高效、便于运行；党代会也不能5年才召开一次，而要实行年会制，以便及时履行决策职能；各级党委不能再将权力集中于党委书记，而要实行集体领导，少数服从多数；还要充分保障和实现党章赋予党员的各项权利，实现广大党员及各级党代会对各级纪检委进行监督的制度化和常态化，等等。

要从根本上防治腐败，除了推动党内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更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推动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在现行体制下，诸如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等机制，对于大权在握的腐败高官，都没有多少约束力。国家层面的政治改革，尚待破题。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全面论述，仅对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提出一点粗略的想法，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为山西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丁 东）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400-610-0896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盒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530号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3第2461278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3第2461279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4100217号

王猛与奥运会

○ 俞虎 苏南

王猛（1920—2007），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38军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武汉军区副政委、广州军区政委，并在1971年7月至1974年12月和1977年2月至1981年7月期间两度出任国家体委主任。

有关庄则栋在江青指使下“反戈一击”揭发王猛，以致王猛被迫离开体委的事情，许多人都听说过。但王猛第二次任体委主任后，大胆突破“有蒋无我，有我无蒋”的底线，促成中国成功重返奥运会，开创两岸关系“奥运模式”的重要贡献，却鲜为人知。

一、邓小平交付任务：争取进入奥委会

早在1974年春节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听取王猛关于体育工作的汇报时就提出：

对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要多做工作，争取进去。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样的大国呢？

自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打开了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大门，日本和许多欧美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1973年，经过国家体委和外交部等方面的共同努力，在亚洲友好国家的帮助下，中国恢复了在亚运会的席位。王猛于1973年12月访问伊朗，就中国参加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的具体事宜与东道国友好磋商。伊朗首相胡韦达对王猛表态：“如果没有中国参加，我们就不举办亚运会。”

邓小平重返奥运的设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但是，紧接着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了包括体育战线在内的各行各业，重返国际体育组织的设想未能落实，王猛更遭受江青等人鼓动的“大批特批”，被迫于1974年年底离开了国家体委，到武汉军区当副政委。1976年粉碎“四人帮”，王猛1977年重返国家体委后，中国重返奥运会的工作才又一次提到了议事日程。

邓小平1974年交代给王猛的任务，有一个前提：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席位，必须驱除台湾蒋介石集团，决不能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这是一条底线。1973年中国恢复亚运会席位，也是遵从这一原则。

邓小平提出这一任务的第二年，1975年，新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访华，称支持中国返回国际足联是他竞选足联主席的承诺之一。他热切希望与中国一起找到完成这一目标的办法。那时王猛的位置已被庄则栋取代。由于政治形势所限，阿维兰热无功而返。

王猛1977年再次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后，中国成功地于1978年通过“驱蒋”恢复了在国际田径联合会和体操联合会的席位。下一个目标，就是奥运会了。

中国日益赢得国际社会广泛的赞赏和支持。1977年9月和1978年4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副主席萨马兰奇应王猛邀请先后访华。如果说之前国际体育界有排斥中国的倾向，那么面对已经打开国门的中国，奥委会就不可能继续采取封闭的政策。此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台湾方面的会员资格。

第六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是一位传奇式的全才人物。他出生在爱尔兰，当过编剧和电影导演；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1938年入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官至英军装甲旅副旅长；战后又担任过英国石油公司经理，堪称文武双全。因为具有调节矛盾的才能和很高的声望，基拉宁于1950年被因政治问题困扰几乎导致分裂的爱尔兰奥委会推选为主席，因此步入体育界。1972年，基拉宁当选国际奥委会

主席。

与中国有一段渊源的基拉宁在中国表示,一定要在他的任期内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他强调:解决这个问题应采用“演进”,而不是“革命”的方式。由于奥林匹克宪章允许承认地区,奥运成员并不一定是国家实体,因此不需要按照联合国方式解决此问题,台湾的运动员可以在某种前提下继续参加奥运比赛,而不应剥夺他们的机会。为此,基拉宁还专程到台湾做协调工作,表示出很大的诚意。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访华,同样也提到用“变通方法”解决中国代表团席位的设想。他后来成为中国人很熟悉的老朋友。

不仅是西方国家,东欧也表示欢迎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1978年10月,王猛访问两个与中国关系良好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的有关负责人告诉王猛,苏联已经在9月份华沙社会主义国家体育领导人会议上表态:希望中国有机会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看来,中国重返奥运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关键在于两岸代表权的“临门一脚”。

罗马尼亚方面向到访的王猛提出建议:希望能在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前提下,有更灵活的具体办法。这是一个很实际、很有代表性的建议。综上所述,变通处理台湾方面代表权问题,反映的不是罗马尼亚一个国家的立场,而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态度。

多年后,卸任的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重提那次访问中国的旧事:

我希望能够说服中国政府有关领导人重新审视他们的有关政治观点,以便找到一条途径让中国加入到我们的组织来一起推动世界足球事业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件事的“不容易”,在于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和主权冲突。大陆和台湾都坚持己方代表中国,都不接受与对方共同出现在一个国际场合的局面。这个看起来相同却又完全对立的立场固然避免了“两个中国”,但导致了两岸运动员不能共同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的僵持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基拉宁主席在与中国政府沟通的同时,还要做台湾方面工作的原因。

二、王猛首倡两岸共同参赛

代表中国体育界与国际体育界磋商讨论这一难题的,正是王猛。

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回国后,王猛就开始考虑打开思路,解放思想,扫除恢复奥运席位的障碍,变通处理台湾代表权问题。正在此时,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恢复通航和人员来往,促进和平统一。叶剑英宣布,自即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并呼吁:

由于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互不了解,对于双方造成各种不便。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信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艺术交流。

这个文件的发表非常及时,“进行学术文化体育艺术交流”,为体委在两岸代表权问题上取得突破提供了政治依据。根据中央的战略构想和自己出访中的见闻,王猛带领有关部门人员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其关键点是在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下,采取不驱除台湾方面代表的灵活办法,恢复中国奥委会资格。这一方案突破了历来“有蒋无我,有我无蒋”的底线。国家体委的这个建议是创造性发挥中央《告台湾同胞书》的精神,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以高度灵活性解决重大问题的创举,是解放思想的实际行动。

可是,当体委拿出此方案与外事部门协调时,对方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异议,认为体委的方案不符合“有我无蒋”的方针,主张要求台湾运动员加入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起参赛。而从现实出发,这个主张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

王猛据理力争,坚持体委的方案。在王猛的坚持下,1979年2月26日,各方决定采取折中措施,将外事部门的方案与体委的方案一同上报党中央。请示报告指出,虽然中国重返奥运会的形势“较前有利”,但即使一些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因为中国对台湾地区的体育运动尚没有实际管辖，也不同意撤销台湾方面的代表权，而是希望找到一个过渡的办法，使双方运动员都能参加比赛。为此，请示报告提出了两个选择方案：

首先是只承认设在北京的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地位，台湾的运动员可以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奥运会，具体办法由中国奥委会与台湾体育组织协商。这是外事部门的方案。

也可以考虑在承认设于北京的中国奥委会合法权利的基础上，特许台湾运动员以“中国奥委会台湾分会”的名义单独组队参加奥运会，但须改旗、改徽、改歌。即使台湾方面接受这种方案，也不会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这一方案是国家体委提出的。

最终，邓小平拍板，选择了国家体委的方案：在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奥委会席位之后，特许台湾体育组织以地区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不得使用原称号、旗帜和歌曲。这个方案的确认，为中国恢复奥运席位的进程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

三、“奥运模式”是两岸关系的重大突破

不过，这并不是最终结果。中国的建议还要获得国际奥委会多数国家的认可，磋商和博弈在继续进行。终点线在望，但还没有到达。

1979年4月，国际奥委会第八十一届年会通过决议：

一、承认在北京的中国奥委会；

二、继续承认在台北的中国奥委会。

同时提议对台湾方面参赛的名称、旗帜、歌曲进一步协商。

看起来这个决议与中国的建议很相似，但实际上却有两个“中国奥委会”，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仍是“两个中国”的框架，中国声明不能接受。但是，因为决议同时还提出就名称等问题尽快讨论达成协议，中国方面表示愿意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继续协商，解决分歧，采取了耐心推进而不对抗的正确策略。

1979年5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来函与中国方面探讨中国代表权的关键问题：台湾代表团的名称。体委和外交部坚持台湾方面必须改名，不能使用“中国奥委会”的名称，这是重大原则问题。

实际上，许多重大原则分歧，只要有关各方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拿出政治智慧，做出必要的妥协，结果反而很简单。如同当年中美联合公报中“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神来之笔一样。经过体委与外事部门反复的磋商和讨论，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最终修改为：

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在改旗、改徽、改歌之后，可以留在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内。中国的名称是中国奥委会，台湾可以是“中华台北”或“中国台北”奥委会。

对比之下，中国政府将原来建议的“中国奥委会台湾分会”改为“中华（或中国）台北奥委会”，是精妙的修改。“台湾分会”的名称会使台湾方面觉得自己被“吃掉”；“在台北的中国奥委会”是“两个中国”的代称；而“中华台北奥委会”，最终定位于一个城市，免除了“国家”嫌疑，前面的“中华”或“中国”（在英文中这两个词是一样的）又表现了两岸的渊源与联系，“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可能在相互理解和妥协的前提下接受这个名称。

看来，中国恢复奥委会席位的进程，百里之遥，只差一步：让国际体育大家庭理解和支持中国政府的建议。于是就有了王猛1979年6月的重要出访活动。他用二十八天的时间访问了西德、英国和法国等主要西欧国家。当时，第三世界对中国的支持配合基本落实，西方发达国家的态度最为关键。王猛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中国对于重返奥运的原则立场和态度：

中国愿意重新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但我们的原则立场不可改变。我国已在国际奥委会之外二十一年。如奥委会关于台湾问题的决定不符合中国的原则立场，我们准备再等二十一年。如无九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奥委会本身也是讽刺和嘲弄。

把原则和底线划清楚，是争取外界理解的前提。中国采取变通态度处理台湾代表权问题，是照顾两岸运动员的共同利益，不意味着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退让。中国积极争取重返奥运，

王 猛

但并不是有求于奥运。王猛进一步明确指出：

下届东道国美国（冬奥会）、苏联（夏季奥运会）如允许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参加，可能引起政治上的麻烦。

西德奥委会主席道默对中国的立场表示支持，并允诺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转告与王猛的谈话内容。在巴黎，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部长索瓦松告诉王猛，他已向国际奥委会表明了立场：“希望找到一个既尊重中国的原则，又能为大家接受的解决办法。”

索瓦松的表态代表了国际体育界的普遍认识：恢复中国的奥运席位，不应导致台湾的运动员无缘参加奥运会。而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只要不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实现与台湾运动员共同参赛的目标，因为这是两岸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中国与国际体育界最终找到了共同目标，也找到了实现目标的方法。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权利的决议，内容如下——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决议（名古屋，1979年10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和歌。会徽交执委会批准。

章程：符合规定。

位于台北的委员会：

名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不能使用其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且必须得到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前进行修订，以符合国际奥委会章程。

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通信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批准了名古屋决议，恢复中国奥委会席位，并同意台湾在改旗、改徽、改歌的前提下以“中国台北”名义保留奥委会会籍。

基拉宁主席实现了在自己任内恢复中国奥委会席位的承诺。他于1980年卸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继任。

从台湾方面说，这并不是理想的结果，但却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如果拒绝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台湾方面就会处于被动，结果只能退出。在各方斡旋之下，台湾方面最终接受了“三改”方案，于1981年3月23日由中华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瑞士洛桑签署协议，完成了确认台湾方面留在奥委会的最后手续。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这个框架下，台湾不仅可以继续参加奥运会，还能参加早先退出的亚运会以及田径、体操等所有专项运动会的国际赛事。

台湾方面此前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三次会旗修改设计，国际奥委会征询中国政府的意见，中方同意了白底梅花图案。这个图案是国家体委提议选用的，邓小平表态：

可以同意国家体委的意见。

关于歌曲，台湾方面使用《国旗歌》的曲调为中国台北奥委会会歌，代替原来的所谓国歌，并将歌词改为奥运内容。《国旗歌》是台湾方面在举行升、降旗仪式时专用的乐曲，并另有“国歌”。这是一个比较敏感而微妙的问题，大陆方面接受了这个方案。邓颖超对此做出解释：

现在的曲调虽然是用了原《国旗歌》的曲调，但当时的国旗还有共产党的一份贡献，满地红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加的。现在的词改成了奥林

匹克内容，曲调不要太计较了。

邓大姐的表态高屋建瓴，体现了政治家的大局观：该不计较的就“不要太计较了”。

1979年11月28日，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祝贺中国成功重返奥委会。邓小平、邓颖超、陈锡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茶话会上讲话，指出：

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但我们也要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在解决统一问题时，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体育界在解决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问题上，做得是好的。

2000年，王猛接受北京电视台记者采访，重提恢复奥委会席位的过程，他说：

在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相互配合，于1979年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妥善解决了台湾问题，恢复了我国在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这是我国体育事业全面走向世界的新起点。这是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思想在体育领域的尝试和体现。

王猛并未将恢复奥委会席位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

在回顾中国重返奥运会的历史时，还要提到王猛领导下的工作团队。经王猛提议，国家体委决定嘉奖十位为恢复奥运席位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志，颁发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他们是：宋中、何振梁、袁载军、王亦洲、魏纪中、楼大鹏、屠铭德、张全德、刘国常、许德迁。

四、与奥运会擦肩而过的遗憾

早在1979年2月，中国恢复奥运席位八个月前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王猛预先提出了与奥运会衔接的中国专业竞技体育发展方针。从1979年9月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始，国家体委实施了与奥运全面接轨的赛事安排，所设的二十二个比赛大项中，除当时还未列入奥运比赛但水平很高、影响很大的乒乓球、羽毛球外，其他二十项全都是奥运项目，这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奥运会。

1980年1月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王猛将中国有关奥运会的体育项目分为四类：一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包括排球、体操、跳水、举重、射击、射箭。二是影响很大，金牌很多，但我们水平很低的：田径、游泳。三是金牌不多，但影响大，国内群众喜爱的：足球、篮球。四是尚不普及的项目，但其中有些搞好了可能出成绩的：如手球、击剑、摔跤、柔道、皮划艇等等。王猛指出，要将前三类项目和冬季奥运会的速度滑冰以及非奥项目乒乓球、羽毛球作为重点项目，抓紧抓好，第四类中的若干项目分工几个省市重点抓好。三十多年的奥运比赛实践证明，这个划分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有效的。

通常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是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这不确切，只能说是第一次参加夏季奥运会。实际上，中国重返奥委会后首次参加的是1980年2月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十三届冬季奥运会。由于中国选手在冬季冰雪项目上水平还不高，参赛选手只有二十八人，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绩，因而在中国国内的影响也不大，所以这个“首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同年的夏季奥运会是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二届奥运会，由于苏军出兵阿富汗，美国等六十多个国家先后声明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中国奥委会也于1980年4月24日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王猛遗憾地错过了率团参赛的机会。

王猛主持了成功重返奥运会的工作，为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制定了蓝图。他主动将在体委领导岗位上的军队干部分批送回部队，建立由体育专业人员和行政人员组成的领导班子。大局已定，王猛向中央提出了回部队工作的请求，于1981年7月被任命为广州军区政委，他提名的李梦华接任国家体委主任。

1984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出现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会场，受到热烈欢迎。中国选手一鸣惊人，夺得了十五枚金牌。已经离开国家体委三年的王猛深感欣慰。

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裁军一百万，同时精简合并大军区领导机构。王猛被安排退出现役。6月初，王猛参加完军委会议，准备离开北京回广州交接工作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岭安奉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派遣面见王

王洪文的升沉

○ 李 逊

王洪文被关注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了解最初得之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初回上海工作时，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汇报上海情况。据徐景贤回忆，毛泽东当时“给了张春桥一个任务，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的人选”。这样，从张春桥一系列书面汇报中，毛泽东陆续了解了工总司及王洪文的情况。

1967年1月夺权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成为市革会的七名主要负责人之一。而从当时市革会传阅文件的顺序看，王洪文排在第七名：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

王洪文当了市革会领导后，一直比较谨慎，对中央各项恢复秩序的措施积极响应，也要求自己手下的工人造反派们紧跟中央部署。他对工人造反派有着很大影响，对他们容易逾越规范的草根行动有着很大约束力。上海除了1968年6月、7月、8月联司和支联站时期比较乱，其他时期一般都比外地平稳。尤其1967年初，王洪文坚决主张吸收保守派入造反队，还有1967年下半年，王洪文坚决要求工总司下面的各联络站实行大联合，哪怕“和稀泥”也要实行联合。这些都是上海局势稳定的重要原因，王洪文起的作用很大。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有威信。他处事比一般

猛，转达总书记胡耀邦要他出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意向。冯岭安曾是王猛文革期间担任体委主任时的党组秘书，王猛客气地说：你回去转告习仲勋同志和耀邦同志，就说我真诚地感谢各位领导的信任和关怀，但我实在是哪里都不想去了，真的想休息了。

确实，人们很难将王猛与统战部部长的职位联系在一起。批林批孔运动中王猛被整得最厉害的时候，在医院结识了赋闲的胡耀邦。胡耀邦对王猛在体委的工作十分赞赏：“王猛同志是比较开明的，在国务院系统的军代表中是很优秀的。”而在外交和两岸事务上既坚持原则又能化解矛盾的突出表现，可能是胡耀邦看中他的原因。在那一段时间，王猛婉拒了有关方面的多次劝说。1985年11月，接替杨静仁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是阎明复。

胡耀邦于1989年4月逝世。离休的王猛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以个人名义到胡府吊唁。晚年的王猛读书、写字、喝酒、跑步、访亲会友，还不时回老部队看看。眼见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近，他虽然已经脱离了体育系统，也绝少出席各类公开活动，但却常把“保持健康奔奥运”的话挂在嘴边。他盼望亲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圆自己的奥运梦想。但人算不如天算。2007年6月29日凌晨，王猛在睡梦中猝然辞世，终年87岁。此时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一年零一个月。

2008年，王猛的家人收到国家体委特赠的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请柬。王猛的孙辈享受了这份殊荣。

国家体委原副主任张彩珍在会议上这样评价王猛的贡献：如果说王猛一进体委是为我国体育写下了光辉的一笔，那么他二进体委，则是为我国体育腾飞奠定了指导思想的基础，包括理论基础。尽管他没有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但每一块金牌上、每一块奖牌上都有王猛同志的心血。■

（责任编辑 丁 东）

造反派谨慎,为人随和。工总司总部的一些老造反,相互之间会有所不服气,但对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数几个人,大家基本都是服帖的。

1967年7月21日至国庆前夕,毛泽东一直住在上海。砸联司那天晚上还和张春桥乘着防弹轿车去外滩。看到工人造反派戴着藤编安全帽,手持长矛,守卫在市革会门前,毛泽东很高兴,说上海工人造反派能够掌控局势。后来,毛泽东在一场批斗会的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了王洪文的形象。当时王洪文正在批斗会上做总结发言,毛泽东仔细听着王洪文的讲话,张春桥在一边向他介绍王洪文的情况。据徐景贤后来的回忆,王洪文在电视中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与王洪文第一次见面,是在1968年的10月1日国庆节。王洪文是上海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团的领队,和上海的许多代表们一起住进了中南海。10月1日那天,检阅游行队伍之后,马天水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时,说王洪文希望见主席,毛泽东同意了。[注1] 张春桥将王洪文带到屏风隔着的贵宾会见厅,随即离开,单独留下王洪文。林彪也在场。这次个别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徐景贤后来认为,毛泽东中央会议上当众推荐王洪文,表扬上海工人,肯定上海局势,显示了毛泽东想从工人中提拔新生力量的念头,从1968年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王洪文时便已开始。

王洪文“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是张春桥当初向毛泽东介绍王洪文时总结的,这样的条件很合毛泽东的心意。毛泽东后来一再对人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毛泽东还十分关心王洪文的文化程度,再三向张春桥打听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不过张春桥此时似乎没有体会出毛泽东的更深意图,只是将此看作是毛泽东对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关注:

主席去年问过我一次,王洪文同志会不会写文章,今年又问过一次。为什么老是问,一方面是主席对王洪文同志很关心,更重要的是关心你们成长的问题。[注2]

国庆观礼后,上海观礼团的其他代表都在10月12日集体离开北京,王洪文却没一起回沪,他被留下列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会从10月13日开到10月31日,会上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还批判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这是王洪文第一次参加党内高级会议。在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赞扬了上海,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形势。”10月31日的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

因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关注,张春桥回上海后,将王洪文在市革会中的位置调整,排到徐景贤之前,紧挨在马天水、王少庸之后。徐景贤后来在回忆中说:“本来上海的红卫兵给我起的外号叫‘徐老三’,现在王洪文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王老三’。”在市革会,王洪文原来主要负责群众组织,以及工宣队、文攻武卫,这以后开始协助马天水负责上海的全面工作,还负责“清队”的专案。1968年下半年,被停止了近三年的中共党组织活动重又开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在筹备中。王洪文担任上海“九大”筹备小组负责人之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中,特地提到上海工人对文革的作用:“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王洪文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担任上海参加“九大”代表团的负责人;还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多次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中央还决定由王洪文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这是一种象征:过去,这样一类全国性的大会往往安排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作为全国工人的表率。而这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却选择了工人中的造反派作为全国工人的代表和表率。

安排王洪文发言,直到4月13日才由毛泽东最后拍板决定。王洪文特地向同去参加“九大”的徐景贤借了十五元钱,去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上身穿着文革中流行的军装。既显示工人阶级的形象,也符合王洪文转业军人

身份。4月14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的这篇由徐景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审阅修改的发言稿，内容不长，完全是表态性的对“九大”各项决议的拥护以及贯彻的决心；发言的意义在于这是被精心安排的政治亮相。王洪文的名字通过这次发言，被媒体报道传播，全国乃至全世界知道了这个正在上升的新名字。在这次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和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杨富珍，都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马天水、金祖敏、陈敢峰、王维国，当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上，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干部，向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发起攻势，张春桥受到与会代表不点名围攻。江青又一次抢在事主前面，与张春桥一起向毛泽东告状并求救。毛泽东当然明白，对张春桥的围攻其实就是对自己发动文革的强烈不满，他又一次选择了江青和张春桥。虽然紧接着受到公开批判的是陈伯达，但是毛泽东与林彪的亲密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庐山会议结束后，江青在住处秘密接见了赴庐山参加会议的王洪文和徐景贤。江青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应该听懂了江青的话，这句话传递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期望。[注3]

奉调北京学习

1972年9月，王洪文奉调北京学习。这是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的，要他移交上海的工作，并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个秘书，因为要在北京待上一段时间。据徐景贤后来回忆，王洪文不知中央调自己去学习什么，也不敢问张春桥，放下电话，就赶紧去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大家都认为，林彪事件后，中央需要增补干部，王洪文去中央学习，肯定是被进一步重用，而且很可能会进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6日晚上，马、徐、王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为王洪文饯行。第二天，王洪文带着秘书廖祖康，在虹桥机场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海市委的常委们赴机场为王洪文送行。

王洪文赴北京后，和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一起。中央对他的安排是一面跟着周恩来参加中央工作，一面学习。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去马、恩、列、斯、毛著作，供他学习。这是对王洪文的培养和考察。尤其毛泽东，更是密切关注着王洪文，毛泽东等王洪文安顿下来以后，连续找他谈了几次话。详细地询问他的历史，并且在交谈中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和观点，既对王洪文进行考察和面试，又对他进行开导和帮助。毛泽东还关照周恩来亲自帮带王洪文，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周都通知王洪文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连绝密的讨论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专案会议，都要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这也是周恩来对王洪文的帮教和考察。[注4]

王洪文小心谨慎，努力按照中央要求去做。中央说调他去北京是为了加强学习，他也就努力认真学习，还向上海市委徐景贤提出，将萧木调去北京继续做他的学习辅导员。[注5]徐景贤十分不情愿放萧木离开上海，因为萧木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主力，工作努力，笔头也好，此时正在与陈冀德筹办《朝霞》杂志，但既然王洪文点名，他只好放人。王洪文还要求徐景贤帮他物色一个英语老师，他要学英语，因为毛主席也在学英语。徐景贤后来从复旦大学外语系调去一个英语教师，从ABCD开始教王洪文。此时的王洪文踌躇满志。他整天不是学习就是开会，毛泽东还派他去新疆、浙江等地区，处理因群众组织派别对立而长期遗留的矛盾。王洪文自己本来就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作为上海市革会负责人，专门处理上海群众组织之间的纠纷，在这方面有经验。虽然对于群众组织的两派尤其对于上海邻居浙江的两派，他心底有倾向，但首次作为中央代表，他基本按中央要求处理矛盾，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满意。据说，毛泽东对张春桥说：

> 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都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注6]

不久，张春桥告诉上海市委的徐景贤等：看

样子，洪文回不来了；经他和姚文元、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这是王洪文将留在中央工作的信号，毛泽东欣赏王洪文。接班人问题一直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一个心病，现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

但王洪文毕竟从政时间很短，没有资历。没有资历不仅是经验不足，也使人无法从资历中了解其真实能力和品德，所以毛泽东对自己又一次选的这个接班人还是有些不放心。中共十次代表大会筹备召开之前，毛泽东要王洪文看《刘盆子传》。王洪文没有听清毛泽东要他看的究竟是什么，也不敢多问，他趁回上海调查研究时，找写作组的朱永嘉等，说要读刘什么子。朱永嘉猜出是“刘盆子”。刘盆子是《二十四史》中《后汉书》里的一个人物，原本是个放牛娃，赤眉起义时被立为皇帝，但根本胜任不了皇帝的职务。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的朱永嘉，听说毛泽东要王洪文看这篇文章，马上领会到毛泽东的意思，是希望王洪文不要像刘盆子那样，不成大器扶不起，但朱永嘉不便明说。朱永嘉去和徐景贤商量，徐景贤出主意：只按文章的字面意思，将古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不做任何其他解释和议论。朱永嘉照此办理，逐字逐句翻译了一遍。王洪文听着，不动声色，没有任何表示。徐景贤和朱永嘉都认为王洪文是个明白人，他应该明白毛泽东的弦外之音。注7

王洪文去中央后，很不习惯中央的行事规则。他给马天水打电话说自己非常寂寞，有时一整天就是开会。注8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5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备事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决定将王洪文调到中央，列席政治局并参加工作；根据毛泽东意见，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的说明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由于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只选出一个主席即毛泽东，一个副主席即林彪。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主席便只剩毛泽东一人，政治局内，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亲林彪者，或死亡如叶群，或被审查如陈伯达、黄

王洪文

永胜等，补充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成为当务之急；而且那个将林彪立为接班人的“九大”党章也急需修改。

最初王洪文负责的班子，写出的是《关于党章修改的说明》，只是个事务性的报告。报告送上去后，在“十大”召开的前三天左右，被送了回来。上面是毛泽东的笔迹：“说明”二字被画去，加了“报告”二字，在下面写着“王洪文”三字。注9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在“十大”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做党章修改报告，“七大”是刘少奇，“八大”是邓小平，“九大”没有这个内容。“十大”由王洪文做这个报告，这表明，毛泽东要重用王洪文。

8月20日，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召开，虽然毛泽东没有到会，但他让周恩来宣布了一个更具震撼性的决定：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排在王洪文名后，都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了毛的这个决定后，立即谦恭地从主持人的席位上退让，请王洪文接着主持会议。一百多个参加会议者立即明白了毛泽东要让王洪文当他的接班人的意图。

毛泽东的这个意图遭到抵制。“十大”召开前，在周恩来主持的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

王洪文（左）在中共十大主席台上

1973年8月24日下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出席并主持大会。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中央，左右分别是王洪文与周恩来。毛泽东宣布，由周恩来做政治报告，王洪文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后，由穿着崭新军装戴着领章帽徽的王洪文念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28日，“十大”闭幕会，毛泽东没有出席。但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时，周恩来宣布：“今天的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王洪文站起，走到毛泽东座位前，拿起桌上放着的毛泽东的选票，走向投票箱将选票投了进去。毛泽东的这一系列安排，使王洪文闪亮登场，一下站到了中国政治的前沿。接着，8月31日，全国报刊统一刊登了前一天举行的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新闻公报，其中，最具新闻意义的就是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

上，当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让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提议后，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们都不表态；张春桥和姚文元因为大家都不吭声，也不便表态，场面十分尴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提出：副主席一个就可以了。他的意思很清楚，周恩来担任副主席，不赞成将王洪文放上去。为了“打通思想”，“统一认识”，8月23日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和解释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思想，说服大家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尽管如此，许世友仍然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毛主席的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讲话后，到会的老干部们用掌声表达对周恩来的敬意。但轮到王洪文讲话，讲话结束时一片沉默，没有人鼓掌。讨论由谁做修改党章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央高层干部对王洪文不认可，使王洪文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老干部们对自己的抵制。王洪文以后对徐景贤提及当时情景仍不能释然。

马天水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面对沉默的集体抵制，马天水以自己老干部的身份为王洪文说话：“我打头阵表了态，表示支持和拥护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我当时说：我同王洪文相处一段时间，觉得王洪文看问题还比较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感到他比我强。”注10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挑选接班人，前两次是刘少奇与林彪。注11

受命王维国专案

1970年庐山会议后，王洪文负责上海的“批陈整风”，即批判陈伯达。第二年9月13日林彪外逃死亡事件发生。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林彪专案组，华东地区的林彪案件，由许世友和王洪文负责，上海设材料组。王洪文推荐，经许世友同意，由戴立清具体负责专案工作；将王知常调去负责文字工作。另外，还调去驻市总工会的军代表康宁一，空军和警备区的一些军人，共八九人，组成专案组。最初的材料都直接报周恩来，同时也报许世友和张春桥，但不经上

海市委和警备区的其他领导。

在对王维国专案的一些处理上，王洪文和许世友经常争论，意见不一。矛盾具体体现在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上。林彪案件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对象主要是驻上海的空四军和驻杭州的空五军。毛泽东派许世友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处理空五军问题。王洪文认为对空五军的干部应以教育为主，不主张都处理。许世友的观点不同。对上海的空四军干部也是这样，“王维国专案组”前后共审查五十六人，其中除四人上报中央“林彪专案组”审查外，其余人员经过一段时间审查后，都没有正式结论，没有硬给他们做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结论。以后都移交空四军处理。注12 王洪文这样做，可能是想为这些军队干部留些余地。王维国的妻子杜贵珍，被认为“参与了王维国一系列反党活动”，但王洪文认为不能因为丈夫的事情株连妻子，在审查了一段时间后将她释放。还有其他许多人，例如李伟信的弟弟李伟隽，空四军政治秘书处韩洪奎，等等，王洪文认为他们不了解真相，只是执行者，责任不应由他们负，对他们从宽处理。文革结束后，这成为王洪文的罪名之一，说他包庇这些人，企图拉拢他们从而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些人也都被重新处理。

此外，许世友在处理驻上海空四军干部问题时，将所有原来空四军的高级干部都换班，另外派人。王洪文认为不妥。张春桥也认为不能怪下面干部，主要是上面的责任。王洪文主张原来的班子能保留的尽量保留，不要另外再派人，打击面不要太宽，包括在杭州的空五军。原空四军军长郑长华，是50年代初期的空军战斗英雄。据说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曾说过：对那些战斗英雄要保。注13 在王洪文上报的关于郑长华的材料中，只说郑曾经吹捧过林彪父子，至于是否参与过林彪的活动，认为查无实据。王洪文希望保留郑长华的空四军军长职务；许世友决定调郑长华去南京军区审查，王洪文拒不肯放，说“在空四军保留这么一个人有好处”。他让郑长华继续主持空四军工作，并对他说，“我还是信任你的”，“你大胆工作”。但南京军区方面执意要对郑长华进行审查，1972年郑长华被送中央专案组审查。王洪文叹道：“这样一来，我想保留郑长华当军长又不成了。”注14 王洪文的一些主张和做法，许多都与许世友发生矛盾。王洪文还试图放宽对浙江空五军陈励耘等人的处理，也都被许世友坚决拒绝。注15

王洪文终被抛弃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跟着周恩来工作，周恩来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与王洪文共同署名。1974年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时期，也正是四届人大酝酿名单的最后阶段，江青希望能掌控以后的国务院，一次又一次地要王洪文向毛泽东进言。身为副主席的王洪文，虽然在党内地位排名比江青和张春桥高，但却跟着江青等的指挥棒亦步亦趋。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加上姚文元是“四人帮”“上海帮”。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遵从江青之意，赴长沙见毛泽东，反对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此时对政治欲望强烈却又到处树敌的江青不满，他更对身为副主席，却总是跟在江青等屁股后面转的王洪文失望。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但王洪文没有悟出毛泽东不满的严重性；或者，他无力也无意摆脱江青和张春桥的控制。他本来个人意志就不强大，在上海工总司时就被认为“耳朵软”。到中央工作，没有政治和人脉资源，更无政治经验尤其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经验，只能听命于江青和张春桥。何况他是张春桥一手提拔的，过去他与张春桥是教诲和被教诲的关系。现在尽管领导关系变了，张春桥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直接教导他，但张春桥的判断和主张，在双方关系中的影响矢量没变。以他的能力，根本不能和张春桥相比，无法抗衡张春桥。加上对文革的共同观点和利益，他根本无法如毛泽东所希望，跳出“四人帮”圈子，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

12月23日，王洪文又赴长沙见毛泽东，这次是和周恩来一起去的，在长沙住了三天，27日回北京。毛泽东再一次要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向毛泽东写了份检查：

主席：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注16]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十几名政治局委员在住处开会。毛泽东长达两小时的讲话，主要内容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要求加强党内团结，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还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前一时期的“批经验主义”进行批评。从可以见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似乎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张春桥，这是唯一的一次。但是，即使可能是唯一的批评，毛泽东也是以批评自己的形式做的：“我也犯了错误……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注17]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无坚决清除江青之意，对江青充其量只是告诫和批评，这也应该是王洪文无力摆脱江青的最重要原因。但周恩来抓住了毛泽东的批评，布置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召集。王洪文一再推托，拖着不召开会议。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注18]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毛泽东始终在一边观察。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政治能力失望。王洪文自己在许多方面也不思进取：一次接待一个国家总统，他本应事先准备，了解对方国家情况。可他对外交部送给他的资料连看也不看。第二天接待时，什么也谈不出，只好翻来覆去地问那个总统：你到中国饭吃得惯吧，住得惯吧？外交部工作人员存心如实记下王洪文的这些话，写成简报，报送毛泽东，据说毛泽东看了很生气。[注19]王洪文的文化知识也让毛泽东无法与之交流。毛泽东对反文革势力总是忧心忡忡，担心“复辟”。一次他对王洪文讲起张勋复辟之事，王洪文不知张勋是谁，问毛泽东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只好说“你自己去查”。[注20]

对王洪文直升机式的提拔，使得王洪文既无法在各个台阶积累工作和政治经验，也无法在各个领域和地区积累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选拔文革造反派作为自己的副手，始终不能被文革的反对者尤其是广大的老干部接受。毛泽东再一次抛弃自己选拔的接班人。毛泽东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7月1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从7月初开始，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从此，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注21]

对于王洪文的工作能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萧木这样评价：

比起一般工人，王洪文无论是在考虑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上，还是在政治上，要强一些。他如

果是一步一步地上去,在各种位置上受到锻炼,也许有可能会锻炼出工作经验和能力。但他却是一下子被提拔上去的,这使他的经验能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而且王洪文实际是奉命造反,没有独立判断政治是非的能力。他对政治是非的判断标准就是"最高指示",毛泽东的话。注22

王洪文接受审判

1975年7月,失意的王洪文回到了上海。同行的廖祖康通知市委办公室,给王洪文准备一间办公用房间。不过人们没有听出言外之音:王洪文打算长住上海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不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不知道王洪文已经失宠于毛泽东。王洪文向他们透露了中央的斗争,说:"当前中央斗争很复杂,要有上山打游击的准备。"8月19日,王洪文去上棉三十厂,临走时说:"只要我不被打倒,不死,下次还要来的。右派上台,我就来不了了。"注23 回康办的路上,同行的王秀珍觉得他刚才的话不妥,说:你这句话讲得太露骨了,能这样吗?王洪文答:"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远没有解决,有些人根本不承认我这个副主席,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不承认新干部,好多地方新干部都被打下去。还要围绕文化大革命再斗。你看邓小平的讲话,不就清楚了吗?"注24 另一次,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楼上,王洪文边喝酒边埋怨:"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指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有一个办工农兵读书班的权!这是毛主席定的呀!"注25

王洪文在上海无所事事,除了视察工作,很多时间放在吃喝、打猎、钓鱼、看电影上。后来他对人说:"去年我回上海,实际上是半休息状态,太气了。"注26 而此时,"王洪文犯错误了"的消息悄悄在干部间流传。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很着急。马天水说:洪文在上海没事干,邓小平这个人很能抓权,我们要劝他赶快回北京。他老不回北京,慢慢权没有了,在群众中影响也没有了。徐景贤说:洪文回北京一见报,政治谣言也就会没有了。要他赶快回北京抓工作。王秀珍说:我们劝他回北京好,他在上海也没事做,情绪不高。大寨会议他没参加不要紧,计划会议他要参加,代表工人在会上讲话。注27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次劝王洪文回去。11月15日王洪文终于回北京。但回北京后,吃喝打猎钓鱼依旧。请王洪文吃饭喝酒最多的是叶剑英,有时半夜三更也会打电话将王洪文叫去。王洪文大概认为中央高干都是这样,吃吃喝喝是一种干部待遇;或者他觉得自己已经被高层政治遗弃,不再被信任,所以也不再愿意收紧骨头谨慎行事。他的秘书看不下去,说:"王洪文这个人完蛋了,照这种样子,肯定完蛋。"这个秘书打报告,执意离开王洪文,后来在文革结束前的半年,终于如愿。注28 金祖敏曾经劝过王洪文珍惜机会,好好学习,王洪文听了很不高兴。注29

萧木也曾经劝过王洪文。一次王洪文又被叶剑英叫去喝酒,酒席散后,萧木与王洪文整整谈了三个小时。萧木以老师的身份,劝王洪文不要沉湎于吃喝打兔子。王洪文听着,最后表示:

我有我的难处,我难以开展工作,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十大"的路线。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认。只有叶帅还是支持我的。所以叶帅叫我来,我也不好推辞。注30

整个邓小平主政时期,王洪文情绪都十分低落。直到1975年底,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实为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开展,王洪文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因北京群众悼念周恩来,引发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革职。但王洪

文也没有因此重新复权。接替邓小平的是华国锋——毛泽东再次挑选的接班人。半年后的10月6日，华国锋永远结束了王洪文的政治生涯。

注释：

注1　司马东去：《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注2　《张春桥1970年5月1日下午在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委员时的谈话》，工总司1967年5月2日。原件藏上海市总工会。

注3　这一节的资料，除注明出处的之外，全部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

注4　徐景贤《十年一梦》。

注5　王洪文在北京有两个秘书，一个工作秘书小沈，另一个生活秘书廖祖康，都是国棉十七厂造反时就一直跟着王洪文的原厂技校学生。两个秘书已经属多，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北京都只有一个秘书。萧木作为王洪文的政治辅导员调去王洪文身边，文革后有人说萧木是徐景贤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安插在王洪文身边的钉子，显然与事实不符。萧木是王洪文自己点名要求调到北京的。

注6　徐景贤《十年一梦》。

注7　以上资料均主要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

注8　转引自张春桥1972年11月2日下午在接见市工代会部分委员时的讲话。上海市工代会会议记录。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文书档案。

注9　这是萧木对笔者回忆的，他参加了《关于党章修改的说明》的起草。

注10　马天水1976年11月21日《我的补充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印发，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

注11　本节内容除注明的外，其余皆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以及徐景贤《十年一梦》。

注12　《上海文革史话》第641页。

注13　这是参加过王维国专案审查的王知常告诉笔者的。

注14、注15　《上海文革史话》第642页、第643页。

注16　转引自薛庆超著：《中国现代史论：中国外交重大突破　毛泽东的南方决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注17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1页。

注18　此小节资料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4页。

注19　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

注20　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注21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态度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9页。

注22　这是2007年间，一次笔者向萧木问起王洪文的工作能力时，萧木对笔者说的。

注23　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专案小组办公室1977年3月《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注24　王秀珍1978年3月29日《补充交代与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注25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

注26　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专案小组办公室1977年3月《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注27　王秀珍1978年12月24日。

注28　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

注29　同上。

注30　这是萧木对笔者说的。■

（本文为《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中的一节）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雪白血红》蒙难记

○ 刘家驹

1989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张正隆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该书颂扬了我军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从弱到强的胜利。由于涉及了林彪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实情,在军内外领导人中引起轩然大波。我作为当事人和知情人,想把这场鲜为人知的风波记录下来,留给历史并供公众评说。

年轻人勇闯禁区

1988年初夏的一天,沈阳军区的作者张正隆来京找我,说:“总政批准撰写解放战争回忆录的长卷,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沈阳军区分工撰写辽沈战役,军区文化部研究决定,让我来担负这一写作任务。”

两年前,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要我写《林彪传》受挫。我知道,这是《星火燎原》编辑部另出的新招,以为只写军事斗争,远离政治事件就不会引火烧身。我对张正隆说:“官方出面,您的采访绝对通行无阻,不需要来找我。”张说:“是我们部长的主意,说你能打通关节。”

沈阳军区文化部部长是我的老战友,他知道我采写过《林彪传》,手中肯定有不少知情人的线索。可我心底生疑,沈阳军区有的是经历过战争的文化人,革命战争的征文都参加过,笔下功夫也深厚,他们上马岂不是轻车熟路?为什么偏偏选个没闻过火药味的张正隆,解放战争他才几岁?战争、战乱有多少感受?我和老战友部长通了话,问他,写战史为什么不用“老枪”?部长解释说,我挨家挨户去求过,没人愿意出山,都有后怕,张正隆有冲劲,不识忌讳,更不会心有余悸地瞻前顾后。部长要我相信,这支“新枪”保证能完成军区给他的任务。

经验告诉我,经历过战争的作者,能最真实最充分地展现战场的血与火。文革开始,这批“老枪”被推到第一线参加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横扫舞台上的资封修,十年文革结束,又反过来批判他们的极“左”,好多人已心灰意冷,坚决表示搁笔洗手,我理解部长的苦衷。我告诉张正隆,只要你敢往前冲,我会全力支持你,我来安排你在北京的采访活动。

我带张正隆走访老军们

从这天开始,我带张正隆访问了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兵老将和林彪女儿林豆豆,还有一大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知情人。张正隆如鱼得水,经过几个月的采访,他满怀激情地对我说:“刘老,我像进了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再也不想出来了。”

我感动了,张正隆像一张白纸开始书写我军的历史,他没有偏见,又怀有激情,上路肯定会得到收获。

我熟悉张正隆。1981年,我带一批军旅作家走访东北边防,来到张正隆所在团,他的宣传股长引荐了他(张是该团的报道员)。我读了他一篇写红卫兵到部队经受磨砺的作品,文笔虽稚嫩,却有棱有角,我欣喜不已,决定把他带上和我们一起转悠,让他和军旅作家切磋。由此,我们建立了友谊。

张正隆负有写东北解放战争的使命,全身心地投入,边走访边大量地读书。我给他推荐了麦克阿瑟、隆美尔的传记,他不满足,上书店买回一捆又一捆的书来给自己“十全大补”。采访没有录音器,全凭耳闻手记,晚上就整理笔记,有人说他一天工作15个小时。正因为他没有战争阅历,什么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想打听,连只言片语都会刻进心碑。我看过他的笔记,他善于从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去研究人、判断人。

艰苦的劳动,得到了丰收,有人说他是在用脚写作。他确实走了大半个中国,访谈200多人,挨冻、受饿、冷遇都经历过,最让他兴奋不已的是,走进了北京西山军委的档案馆,那里史料又全又多,

他抄出了毛泽东和林彪在辽沈战役中你来我往的全部绝密电报。构思《雪白血红》时，他几乎是用电报串成了全书的主轴。

我读了他的初稿，发现他文笔大为长进，词汇也生动，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的情节和细节都得到真真切切的表述，一个未闻枪声的战士，像突然变成了一名老兵，全篇几乎挑剔不出多少败笔和漏洞。特让我感动又吃惊的是，张正隆以他朴素的善恶感情，叙说了我们多年不敢触摸的战争中的人性与残酷。他那横冲直撞的走笔，打破了我们一直恪守用阶级观点区分战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戒律，对敌我双方反人性的做法，他都一视同仁地进行谴责。他的初稿让我看得心都发紧了。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他花了大篇幅记叙了林彪指挥的“机智”“果断”“冷静”和“稳健”，和林独特的、像拿破仑一样痴迷战争的个性。他是调动了文学手段在真情地刻画，把一个顶天立地的统帅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张正隆走南闯北的采访，看到整个社会10多年来批判林彪的余烬未消，连战争中林彪应有的丰功伟绩都给予否定，特别是一些秉官方政治结论为旨意的作家史家，充分利用了报刊这块无产阶级的阵地，把林彪的形象涂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烟墨，说他刚进入东北战场就畏葸不前，当了个逃跑将军；打四平，毛泽东要他打成马德里，他不敢碰硬，不请示中央，私自下令撤退；打锦州有三次动摇，是政委罗荣桓严厉地批评了他，才被迫打的。一盆盆污水全泼在林彪身上。胸怀正气的张正隆，在他的《雪白血红》的自序中愤怒地喊道：“10亿人的泱泱大国，那么多作家、史学家在做什么？”“一会吹捧”，“一会批判”，“变脸儿的史料可信吗”？“历史像个婊子，唯权势者可以弄它一下”！

我对张正隆钦佩又忧心，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就不怕有人找你算账吗？”

“刘老呀，”张正隆说，“四野的干部战士一谈起他们的林总，没一个说他不好，有的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我天天在受感动，能不记下吗？下笔的时候，我省了又省，删了又删，生怕给编辑部带来麻烦，才留下这些。”

我算了一下，写林彪的文字全书至少要占15%的篇幅，在这个还在清算林彪老账的共和国，书稿肯定要挨棒子胎死腹中。我警告他：“你别以为改革开放了，政治关口是无论如何不会给你松动的。”

“我已经尽力了，再删再砍，就伤筋动骨了，编辑部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了。”

我熟知总政的文宣部门，我叫他们是“文艺战线上的公安部”，他们中的老左就像狙击手，只要有人站出来吆喝一声是“反动的”，一本书就会灰飞烟灭。

我去找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主任王伟，我告诫他：“张正隆的书危险系数高，定会遭到官方的和社会的乱棍齐下，你怎么办？”王伟说：“我考虑过，先到外地发行三个月再回到北京上市，封杀了，我们也不会蚀本。”

王伟很天真。《雪白血红》第一版就印刷了93000册。书在外地卖势很好，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王伟眼热了，忙不迭地就向北京各个书店投售，仅几天工夫，厄运来了。

党政军首脑发话讨伐《雪白血红》

总参军务部原部长苏静从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说当年东北局的一位老同志看了《雪白血红》，把书举在空中抖动，对他的秘书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英明吗？”

刚退下来的一位兵种副司令写信给军委，指责这本书是在为林秃子翻案，要军委马上当头棒喝。

另一位军委领导看了，举起手比画成手枪状，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

这是苏静传给我的信息。苏静是老中将，他的上层活动多，消息灵通，我相信他所说是真的。

更甚者，军事博物馆馆长刘汉中将，给“雪”书列了31条罪状，哪一条都够得上把张正隆打成反革命。

出版社一位领导告诉我，359旅老兵20多人在

张正隆

京西宾馆聚会，正火气十足地批判《雪白血红》，要解放军出版社派人去接受问责。

总政宣传部有人给我透了个更大的信息，正在北戴河疗养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看了，致信刚上任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说《雪白血红》我看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它是一部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军委必须做出严肃处理。

高层的震怒，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已非同小可。王伟主任心急如焚，他邀来《解放军报》文化处的编辑商量对策。我闯去了。军报同人的意见是，由军报发篇评论文章，肯定《雪白血红》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它生动地、准确地、客观地揭示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无畏，由于作者是新手，第一次写战争回忆录，不甚了解我军革命文化的传统，缺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敌我，和平民主提得过头了，过多地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性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过当地记述了林彪的指挥艺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我插话：如若从学术上说，可能平息不了大家的争议，还可能挫伤读者的认知。是不是找几个辽沈战役的当事人，如胡奇才（纵队司令）、莫文骅（纵队政委）、蒲锡文（司令部地图科长）等人写出些回忆文章，他们都曾在战斗的第一线，所处的地位和角度都好，对广大读者更具有亲和的说服力。军报的两位表示不同意，认为会挑起一场内战，后患难抑。

军报评论文章未出炉，沈阳军区三个老红军的指控信送到了军委，总政宣传部已放风要批“雪”书。王伟紧张了，他担心的不止是封杀，还有可能对编辑部进行组织处理。他找来张正隆，要他马上改动原著，提示他：增强人民战争思想的主线；不要偏离我军的“伟大、光荣、正确”；淡化林彪的功绩；删除对我军的黑色描述（如359旅把他们在南泥湾种的鸦片，带到东北做军费开支等）。

陈沂去见江泽民，挽救作者

正好，陈沂从上海来京，他是总政第一任文化部部长，1957年被总政打成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劳改了22年，复职后到上海出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他在电话里召我去见他。

他每次来京，都要从我这里打探些北京的小道传闻。我立即到上海驻京办事处见他，并把《雪白血红》犯了天条的事给他做了详细汇报。陈沂说：“明天迟浩田（时任总参谋长）请我全家吃饭，我给迟老总说说，要军委手下留情，不要打作者的屁股。”陈沂又说：“你为什么不让张正隆来上海找我？我事先给他写个序就好办多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给他抵挡一阵子。”

我说：“现在真的要靠您了，杨白冰是您的部下，他至少要听听您的说法。”我说的杨白冰，已是总政主任，解放初期，他还只是个西南军区下属的师副政委。

陈沂说：“我这个右派，又大又老，无所顾忌。”

第二天，我带张正隆去见陈沂，陈老慷慨激昂，要张正隆不当软骨头，说：“改的不是你的作品，是你的人品。”他用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切身体会教育张正隆说：“我写《白山黑水》，是在劳改农场零下40摄氏度写成的。我把林彪写成了正面人物，他既是东北战场的统帅，又是普通一兵。我把手稿交给了江泽民审查，由中宣部下文后出版的，你也可以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或军委。”陈最后忠告小张：“你要想当作家，先要学会打官司。”

一天夜间，陈沂从迟浩田那里赴宴归来就和我通了话，说他在饭桌上刚和迟浩田说了个开头，老伴马楠就干扰他，不让他说下去。1950年初陈沂任总政文化部部长时，马楠是《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辑，陈沂从右派复职到上海任书记处书记，她出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文艺战场的斗争，他俩都吃尽了苦头，她为陈沂担心，不让陈干预这部书。陈对自己部下可以说一不二，对自己夫人总是敬畏三分。陈沂告诉我，他有另一条思路，马上去找江泽民，让他来为《雪白血红》说话。前些年在上海时，江对他很尊重，他俩关系非常密切。

大约5天后的清晨，陈沂要我马上去，说他已见到江，江的表态中肯。我高兴地去了。一进门，见总政文化部原部长徐怀中在座，他也是来听陈传

左起：刘家驹、马成翼（《雪白血红》责任编辑）、陈沂

我大惑不解的是，出版此书是总政宣传部批准的，小马被指派为责任编辑，对战争生活一知半解，只是给书稿做了些文字修饰。按规定，这部书经过“三堂会审”，编辑主任看过，社长看过，都署有“同意”的批示，同时，付型前还将成书的内容提纲报给了总政宣传部，为什么用高规格抓一个小编辑当“钦犯”？

与此同时，受命写作的张正隆也同样遭到厄运。沈阳军区接到总政逮人的指令，由军区的副政委带上保卫部部长，半夜赶到六十四军驻地本溪抓捕张正隆。由六十四军收押监护。

达江的态度的。陈说：“江看了杨尚昆给他的信，认为，如何表现我军的重大战役是件大事，不能一出了问题就挖一锹土把它埋了。这是历史，总政要承担主要责任，不能只让一个作者来负责吧？对作者只是个教育提高的问题，要保护作者。”我一听江有如是的表态，一颗悬浮的心放下来了。徐怀中说：“这本书，编辑在处理上有责任，他们老想去冲撞禁区，如果只要删除书中对林彪的描写，只需去掉250多个字，恐怕事情就不会这么严重。”

徐部长原是昆明军区的作家，和他同事的6位作家在作品或言论上冒犯了天条，都成了右派，唯独他的作品，从不在政治上惹是生非。比如他的《她们在播种爱情》，写解放军和藏族同胞军民友情的故事，得到官方和社会的肯定和好评。他对《雪白血红》，能精确地计算出250多个字的失误，说明他是很有政治心力的。

作者、编辑隔离反省

实际上，事态并未因陈沂居间说项出现转机。陈沂刚离京，总政就开始抓人了。由总政副主任亲自出马，还带上总政军事法院院长，午夜来到解放军出版社，把该书的责任编辑马成翼召到办公室，对他宣布，他编辑的《雪白血红》一书，犯了政治性错误，要他隔离反省。当即由法院院长把马成翼带走。后来小马告诉我，他被关在总政警卫连的楼上，一日三餐送饭，洗澡时由两个士兵持枪押着进澡堂洗浴，大池里的10多个泡澡的被赶走，小马一个人边洗浴边反思。

总政治部以文问罪，加大了对这部书的讨伐力度，急令全军上上下下都要批判《雪白血红》。

这可忙坏了各大区的领导，济南军区的政委正在青岛警备区检查工作，得知要批《雪白血红》，跑遍全城的书店，怎么也买不到，他急不可待，宣布说，谁转让他一本，愿出300元；武汉军区请示总政，说市面已没有此书出售，望能批准自己印刷发给部队；南京军区报来干部需人手一册，连队一个班一册；北京军区认为这是在扩大放毒，批判最好限于中高级干部中进行。总政不知所从，转而电传全军，通报张正隆的人品，说他当红卫兵后，在公社殴打数名干部，有致伤致残的恶行，让人们知道张正隆是“混进军队的坏人”。

后来，形势有了变化。总政主任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召开的政工会议上宣布：“《雪白血红》一书有严重政治错误，但我们还是准备解除作者张正隆、编辑马成翼的监禁。”并点着在座的六十四军政委说：“我们把张正隆放了，你们六十四军不要对他有任何歧视。”这位政委会后愤然对我们说：“安排张正隆写书，是沈阳军区决定的，抓张正隆是你们总政下达的命令，放人也是你们说的，我们有什么歧视不歧视的？”

抓人放人都凭领导人出示口谕，无须法律程序，张正隆被关了一个月，马成翼被关了23天。释放后，张正隆对他遭受的无情整治没有怨天尤人，仍保持了刻苦的创作作风，拼尽全力写罗荣桓、韩先楚等人的传记。他在政治上“成熟”了，在军事文学的道路上，懂得绕开“雷区”前行。■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山西补选四届人大代表风波

○　石名岗　　李　辅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筹备召开四届人大提上了议事日程。按照宪法，全国人大代表应由各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文革中，经过夺权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于是四届人大代表由各省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选出后，发生林彪事件，接着批林批孔，四届人大召开时间搁置数年，代表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到1974年四季度，中央才部署各省补选四届人大代表。

在山西，补选前刚刚发生一场政治动荡。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谢振华积极批极"左"，得罪了江青。他与陈永贵在政治上也有矛盾。1974年初，江青以晋剧《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为借口，出面炮轰谢振华。在中央主持的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谢振华受到江青、王洪文、陈永贵、纪登奎等人的严厉批判。回省后，陈永贵继续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对谢振华进行了4个多月的批判，谢被革职，他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席位成为空缺。中央指定，由王谦（文革前为山西省省长）主持山西省委、省革委工作。

1974年12月23日至26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补选四届人大代表。省革委共有236名委员，除去死亡和工作调动，应到228名，实际参加全会的169人。中央安排山西补选的代表名额有7名。他们是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太钢三轧电炉工冀秀敏、西山矿务局劳模李生义、石屹节煤矿党委书记谢拴贵、245厂老工人窦新丑、自行车运动员王建业、昔阳水泥厂工人毛联书。

在省革委全委会之前，召开了省革委常委会，讨论补选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主持会议的王谦指名让省革委常委、北郊区委副书记刘灏表态，刘灏说："你一不代表人民，二不关心群众利益，我不同意你当代表。"接着，王谦又问省革委常委、团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宋捷和省革委常委、清徐县委副书记段立生，他们也明确表态反对王谦当人大代表。他们虽然表了态，并没想到能选掉王谦。但争议就此开始。由于会议补选的名额只有7个，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等额选举，讨论其他候选人时，没有太大意见，唯有王谦成为争议的对象。

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委员，尤其是与军队关系密切的委员，对批判《三上桃峰》事件以来的一系列做法有不同看法，对王谦追随陈永贵批斗谢振华意见更大。他们因为观点不同，不愿意进行流于形式的讨论，自然扎堆在一起议论。对"批谢"不满意的委员，不论原来是领导干部，是劳模，还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凑到了一块议论王谦的所作所为，大家都认为王谦没有资格代表他们出席四届人大。胡文秀委员是刘胡兰的母亲，她公开表态："我不选王谦！我要告诉我女儿也不选王谦！"她的女儿刘芳兰时为现役军人，也是省革委委员。

议论归议论，真的让王谦落选，不是一件易事。要完成这件事需要票数集中到另一个人身上。违背上级的意图另选他人不是一件小事情，干部和劳模没有这种意识、胆量和魄力挑头，这自然地落在了原来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头上了。至于说到替代王谦的候选人，选择起来也很有讲究。时任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李瑞芳委员提出，出身大同煤矿技术员的韩英，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比较合适。李瑞芳提醒了大家，尽管韩英不在候选名单中，他如果当选，应该为各方面所能接受。

这样的看法很快在会外形成舆论。太原街头出现了大标语："不同意王谦当代表""我们要选韩英当代表"等等。一些委员开始在会场内传播社会上大标语的内容，许多委员心照不宣，一

点就明，自然有了选举韩英不选王谦的想法。

正式选举前的一个晚上，刘灏去看望老劳模李顺达，说到选举时，刘灏问李顺达选不选王谦。李顺达说："我对王谦是有意见，但是省委常委做了决定，我是省委常委，还是要选王谦！"来自平顺西沟的另一位劳模委员申纪兰说："老李，这次我可是不跟你了，我不同意选王谦！"

赞同和反对王谦的双方，都有活动。王谦的秘书就找过来自山西机床厂的一位委员谈话，做出封官许愿的表示。

时任水利厅副厅长的李兆田委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与晋中的一些委员通气时，大家都同意选韩英，不选王谦。

12月25日会议开选，会场平静，未现异常。

宋捷专门坐在王谦的旁边，当着王谦的面在王谦名字下面画上×，填写选票时，王谦光顾提防宋捷看自己的选票，无暇顾及下面的情况。一切按工作顺序进行，委员们等待宣布选举结果。当选举结果公布时，票数相当集中，韩英当选！王谦落选！此时，多数代表一片欢腾。

王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他一生经历选举无数，但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他太大意了。以往的选举，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大家也习惯了这样的选举。如果王谦事先有一些危机意识，下功夫做一些工作，可能还不至于落选。

中央在程序上认可了山西省的选举结果。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75年1月13日开幕，山西省代表团团长由此前当选人大代表的省委书记王大任担任。王谦作为列席代表参会。从1954年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来，省委第一书记落选全国人大代表这是第一次。

这件事当时引起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极大震怒，他批示："这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的严重政治事件。"接着，中央把此事作为严重政治事件通报全国。1975年1月12日晚，在四届人大各代表团团长预备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吴德都对王谦落选事件进行了批评。王洪文说："最近有个问题很重要，在人民代表会议上，我们不要和资产阶级站到一起去，山西有教训。王谦同志是省委提名、中央同意的代表候选人，选举时落了选，这是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作为一个省的主要负责人，省委提名，中央同意，回了电报，仍然落了选。所以，中央决定，在四届人大中，首先要召开党员大会，是十分必要的。那里的情况很复杂，完全违反党纪，王大任你们事后要追查。有人背后搞小动作，千方百计不让选王谦。"张春桥说："山西省委开革命委员会选代表，不开党员会，是两个党，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这是不允许的，把两派观点带到会上是不允许的。"1月22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接见了出席四届人大的山西代表团部分党员，谈话中再次提到了王谦落选的问题，并点了段立生、刘灏、宋捷的名，特别指出会后要追查，借以教育全党。

四届人大会议结束后，山西省委多次开会传达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1975年2月22日，韩英在省直机关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省委常委说："这个事件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山西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段、刘、宋三个人为什么不选王谦当代表，其目的是反对中央对谢振华错误的批判和反对王谦主持山西工作。段、刘、宋三个人一再散布批谢批错了。企图搞乱山西。"

省委组织专门人员，检查选票，辨认字迹，调查对投王谦反对票的委员。强令投反对王谦票的委员的单位办"学习班"，让那些委员坦白交待，组织群众批斗。据段立生回忆，在山西省委传达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对王谦落选的批评之后，段立生即被停职检查一年之久。其间，被押解到他所任职的清徐县境内30多个基层单位接受批判。刘灏在1975年春节后参加在昔阳召开的全省学大寨会，遇见省委书记王庭栋，王说刘灏："你犯了大错，中央点了你的名！"会议结束，刘从昔阳回到太原，就被停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展清查运动，王谦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不选他的委员进一步打击报复。将段立生、牛发和、刘灏、宋捷等人投进监狱，非法关押三年之久，批斗数百次。女知青蔡立坚也是不选王谦的委员，当时生孩子尚未满月，就被关进"学习班"，检查批判。

王洪文、张春桥指责"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其实逻辑不通。因为不选王谦不等于不选共产党，王谦不是共产党的化身。韩英也是共产党员，还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和候补中央委员。

民国时代的律师伦理

○ 张思之

历史在曲折行进中总会有相似之处，更难免重复，于是有传统形成，逐代流转。

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优良传统，无一不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延伸，同时受着民族文化的影响与支配，律师传统不会例外。传统在融通之中的代代传承，维系着、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故不应轻易舍弃。但又因其往往发生于、产生在特定历史阶段，有的不免局限，是故也不宜听任左右而应超越。说到底还是那几句老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融会贯通，推陈出新。问题在于继承什么，怎样继承。这是应加思考的永恒命题，要力避盲目性。

西方文明的影响，租界的现身示范，催生了中国的律师制度，几与民国同步孕育，在民主宪政尚待建立的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有所发展，不幸终未壮大。然而为了存活，也曾在挣扎中锻炼出凝聚合力顽强抗争的传统：百年沧桑史，“典型在夙昔”。（文天祥《正气歌》。）

及至上世纪中叶，内战频仍，政权易帜；夺鹿初期，执政横扫法制，脆弱的律师制度几度断层，终致夭折。

然而尽管历史进程常有曲折，不免停滞甚或倒退，保守的、腐朽的力量毕竟不能永远阻挡住它的前行，时代大潮则更是汹涌澎湃。试看中国律师现状，幸或不幸，已被推至维护人权的最前沿，承担着保障人的自由与尊严、实施民主宪政、构建公民社会的责无旁贷的重任。为达到这些目标，自须从优良传统中吸取思想力量。

切莫认为律师从事个案维权纯属技艺范畴。须知维护个人权利，就是为全体公民维权，也正是为国家的光明前程维权，意义重大。1912年3月，共和肇始，江苏山阳县民政长姚荣泽被控告“惨害志士”，“枉杀亲属”。姚被捕后，社会各界、政府上层对如何审判激辩数月，孙中山认为不宜听一面之词，同意专设“临时裁判所”由法庭公开审讯，允许两造各聘律师参与讼事。时任司法总长的法学家伍廷芳发表意见说：“民国初立，办理此等重大案件，不得不注意前时滥用法权之覆辙，凡此非为姚荣泽一人计，为民国之前途计也。”非为一人计，掷地有声语，至今发人深省。（姚案被称为“民国第一案”，详情可参阅《律师文摘》2011年第三辑刘永峰《姚荣泽案》。）整整二十年后，章士钊律师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当庭宣示：“真理在是，不得不争。”更进一层地提升了这一传统的品格。浩然正气，“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王谦落选只能证明上级对他的选择不当。王洪文、张春桥的指责暴露了专横和无知，他们在文革中鼓吹过无产阶级大民主，其实他们的意识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

当时王谦、陈永贵在批判时说，这次选举是“派性”在作怪。以此批判选举者的动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时参选的委员中曾任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不到1/5，多数委员是干部或劳模出身。况且，有支持谢振华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并未参加选举，如省革委委员李辅时任襄汾县委书记，他与王谦个人关系不错，认为选举是走过场，不如忙县里的工作，就没有来太原参加选举。王谦落选，看起来是一批省革委委员投反对票所致，其实背后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历史证明：批谢确实批错了。1981年，中共中央发文为谢振华彻底平反。由批谢而引起的王谦落选事件，与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拒绝赞成开除刘少奇党籍事件一样，都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笔。■

（石名岗：太原锅炉厂高级工程师；李辅：晋中市榆次图书馆馆员）

（责任编辑　丁　东）

当代中国律师的现状，不论有多少缺点，多大缺陷，队伍怎样参差不齐，甚至杂有败类，全面来看，毕竟在继承传统中发展着、壮大着，且在不断超越。鄱阳湖畔，嘉陵江边，北海之滨，巴东西蜀，从首善之区、通商口岸到僻壤边陲、渤海中央，凡有侵权处，总能听到律师的回声乃至呐喊。“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已构成为律师伦理。一批批盛年才俊，把平凡艰巨的诉讼个案与神圣的使命审慎地、踏踏实实地结合起来，直面那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公权，勇敢说“不”！他们为了明道，不计其功，直至为了殉道，不惜捐头。严守底线，义无反顾；凛然风骨，傲然屹立。他们以法庭内外的实践统领着二十万大军，追寻自由，企盼民主，为法治的实现鞠躬尽瘁。老传统，新血脉，支撑着中国律师的脊梁。

令人深以为憾的是，历史也会出现“误会”：那些无视文明潮流的蛮横势力一无例外地把律师视为异己，断为异端。或压或打，计谋常新。北洋军阀如此，国民政府如斯，其他试图阻挡时代脚步的力量亦复如是。他们在继承着“自己的”传统，也会有所“超越”！

时至今日，尖锐的对立集中地表现为维权与维稳的碰撞。执政者把维政权之稳视为第一生命，可以理解；而作为律师，则必须坚持一个光照百代的传统观点：人的自由权利、生命尊严是我们应予维护的至高利益。您说不是吗？请温习孟老夫子两千多年前的阐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寥寥十字，层次清晰，重轻分明；合乎实际，理中含情。谁敢唱反调道个“否”？我以为这里没有争论的余地。

诚然，眼下律师执业维艰。公权恣意滥施，强横干扰严重。队伍中常有绝望之叹，一些人情绪悲观，也不免有各种负面的表现。然而历史的发展昭示我们：社会一旦削弱或竟去掉律师的执业，必导致秩序丧失，混乱滋长，公权会失去信赖，法治将化为幌子，弱势群体的权益时被践踏却不能得到维护。为避免这种困境，与其在绝望中偷生苟活，何如在希望中挣扎奋进？绝望与希望，往往只是一步之遥。从现实状况出发，跨越的关键一步，在于养浩然正气，怀博大胸襟，发扬独立精神，坚持自由思想。真理系命，道义为根，直逼真善美：入斯境，一派光辉灿灿。我们也许不能成为“燃灯者”，难道不能擎起前贤烛火，给暗境发来丝丝亮光，指引奔向明媚春绿的路？

会有风险。先贤也有。1930年8月2日，上海张星垣律师为“政治嫌犯”辩护不就被一伙暴徒殴伤了吗？但细查百年史，似无统一的“传统模式”。实践证明：只要做得到自爱、自重、自强，区区“风险”算得了什么？“是气所磅礴，……生死安足论？”文天祥之歌，何尝不是今日中国律师的心声！更何况上述“三自”正是实施自我保护的最佳方略。

自强最关重要。谋求之道重在勤勉读书。先贤所谓“学而后知不足”与苏格拉底“知己无知”（此句的译法不一。这里所引是赵越胜《燃灯者》中的译文。）的伟大思想实在有双曲同工之妙！作为后学，应慎思之，应体察之。暮年方逐渐克服骄气，减少浮躁，觉悟自己无知，说句心里话，毕竟晚了一些。青年诸君，可否以愚翁为鉴？■

（作者为本刊法律顾问）

（责任编辑　丁　东）

（上接83页）我咋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主持会议的人把他在北京填的那张表亮出来，说，白纸黑字，你还狡辩什么？蔡化楠惊得目瞪口呆。批判了一段时间后，就将他开除党籍，调离了炼铁厂，后来又将他调离了鞍钢。

杨书记的讲述让我们弄清了事实真相。外调材料一人签字无效，杨书记又带我们到三冶公司，找到当年和他共事的王书记，共同在证明材料上签了字。外调大功告成。

回到厂里，公司便下文为蔡化楠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撤销处分，提拔为钢研所所长，两年后，调到公司担任副经理。后来在公司副总工程师岗位上干到退休。他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殚精竭虑，发挥专家特长，为公司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酒钢公司也乘改革开放之东风，奋力拼搏，建成了年产100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成为甘肃省的利税大户。■

（作者为酒钢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丁　东）

中国律师的本土传统

○ 傅国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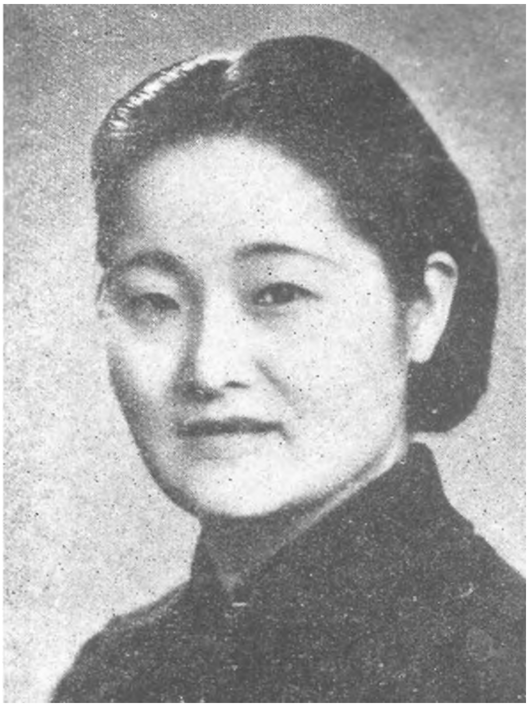
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1937年合影

一百一十多年前，上海租界的法庭上出现了外籍律师的身影。1879年，薛福成就在《筹洋刍议》中主张在通商口岸聘请外国律师办理华洋讼案。1888年，此文被选入当时的《皇朝经世文续编》。1891年，在上海格致书院秋季课试中项藻馨在策论中直接建议培养本国律师。1894年出版的郑观应《盛世危言》对西方律师制度做了介绍。这一年，23名上海商人联名上书道台聂缉椝："中国自与各国通商以来，于交易一端，华人往往有受亏情事，历年来稍能与之抗理者，全恃有律师得为华人秉公伸（申）诉。"起因于当时上海的英国商会抵制律师担文署理国家律政司，担文一向为华人主持公道，受到华商的信赖。项藻馨也对外国律师的执业伦理表示肯定。（参考孙慧敏《清末中国对律师制度的认识与引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

1904年发生震惊一时的"苏报案"，国学深湛的章太炎和少年邹容相继入狱，清廷作为原告，与他们这些被告，分别聘请外国律师，就言论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在法庭上展开一场又一场唇枪舌战，每次的公开审理，《申报》等报纸都有追踪报道。结果，不可一世的朝廷也未能如愿以偿。虽然，我们今天已很难知道，在这一起载入青史的文字狱中，律师的出场，对于最后的审判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但这一幕将永远留在这个古老民族的记忆深处。

不过，那只是发生在上海的租界里，在清廷按照前法治方式垂拱而治的地方，律师在那时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角色，在我们的民族记忆里只有不具合法地位的讼师。"苏报案"3年以后，鉴湖女侠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杀戮时，没有法庭公审，没有律师辩护，没有最后陈述，一句话，还没有一切近代的法律程序，只有秋瑾留下的一句绝笔："秋雨秋风愁煞人"，百年来回荡不息。

在晚清变革的潮流中，1906年，由沈家本、伍廷芳主持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已引入律师制度，而且有具体的设计。伍廷芳曾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在香港等地执业。在他们给朝廷的折子中建议各省法律学堂培养律师人才，择其优者考试合格，颁发证书，分拨各省，以备办案之用。许多掌握实权的地方督抚则不以为然，四川总督锡良、广西巡抚林绍年、山西巡抚恩寿、江苏巡抚陈夔龙等都对此表示疑问，《刑事民事诉讼



律师史良

法草案》最终没有付诸实施。次年12月，沈家本呈上的《法院编制法草案》，也有律师制度的设计，到1910年底草案公布施行，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这年10月27日，邮传部路政司主事陈宗藩上了一折，力陈司法独立、律师制度的重要性。1911年，修订法律馆以日本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完成《刑事诉讼法草案》和《民事诉讼法草案》，其中明确律师的代理、辩护等职能。还没有送资政院讨论通过，清廷即已告终。（参考孙慧敏《清末中国对律师制度的认识与引介》，同上）

1912年元旦，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横空出世，浙江、江苏各地的律师就要发起律师公会，上海14名律师成立了“中华民国辩护士会”（或称“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到年底解散时已有170多名会员）。当年9月12日，司法部参考日本的辩护士法，颁布《律师暂行章程》，正式确立律师的地位。虽然在此之前，少量的本国律师事实上也开始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执业。到1913年8月，全国有1520位律师获得执照，多数在日本学习过法律，少数毕业于本国的法政学校。

1913年，青年邵飘萍时在杭州办《汉民日报》，因笔下不留情，得罪当地权势人物，被告上法庭，阮性存律师出庭为他辩护，以胜诉告终。在“宋教仁案”中，律师杨景斌为成了众矢之的的嫌疑人应桂馨辩护，在几乎一边倒的公众舆论和政治情绪的压力之下，他却要求保证嫌犯的人身安全，要求嫌犯在上海地方审判厅受审，以保证司法制度的独立，等等。结果被司法部吊销了执照，上海和周边各地律师公会纷纷为他执言。这是律师为捍卫合法程序和律师职业权利做的一次努力。此后，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听到律师的声音，看到他们傲然独立的姿态。一些在政坛上浮沉多年的人物，在离开权力场之后，也会选择律师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做过国会议员的刘崇佑、沈钧儒，做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学者、政论家章士钊，曾参与起草《临时约法》、在民国前15年三任司法总长的法学家张耀曾，做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法制编纂馆的董康，都是当年享有盛名的大律师。从1918年到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院645名毕业生中，有228名在上海做律师，其中包括9个女性。1926年到1934年，上海律师公会就从235位会员增加到1174人，到1937年，律师人数达到1328名。

1927年夏天，上海律师公会公开主张取消律师的性别限制。虽然在此之前，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郑毓秀1926年就已在上海租界执行律师职务。1927年底，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新的《律师章程》及《律师登录章程》，其中最显著的变动就是取消对律师性别的限制，意味着女性也可以成为律师。中国的法庭上因此出现了史良这样年轻的女律师，她于1927年毕业于私立上海法科大学，能背诵《六法全书》，几年后拿到律师资格，1931年开始在上海执业。女律师的出现受到上海小报的关注。1932年3月28日，《正义》记者王剑夫在《律师公会改选详闻》中报道女律师杨志豪“交际圆活”、周文玑“辩才敏捷”、朱素萼“文笔犀利”。同年9月5日，《金刚钻》记者了翁一以《脂粉不让须眉》为题报道周文玑在上海地方法院出庭时的英姿：

女律师中有周文玑者，前日在地方法院出庭，坐有律师多人，初漠然视之，及开庭后，周律师应声而起，操纯粹之北平语，婉转而沉着，态度闲雅，从容不迫，援引法理，亦殊明晰，一时在庭诸律师咸相惊叹。

1934年3月，《晶报》介绍，“海上女律师，如史良、方剑白、罗亮、杨志豪、李彩霞诸女士，颇著

称法界。”（转引孙慧敏《民国时期上海的女律师（1927—194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4期，2006年12月）

历史不会忘记，1923年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枪杀的律师施洋，他当时是人力车公会的法律顾问、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并加入了共产党，在1921年底的人力车夫罢工中，他以律师身份出面与资方谈判，罢工胜利，他在工人中建立了威信，赢得全汉口人力车夫的爱戴，都称他为“施先生”。包惠僧说他胆子大，有才气，勇于任事，他是一个公开的“过激派”“危险人物”，“他自己也从不避讳一切活动，并把他的好打‘抱不平’、好帮助穷人，说成是律师的天职，法治的精神，保障人权。”“二七”惨案时，他正在汉口地方出庭，为一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他被捕后抗辩：“施洋不是军人，不是江湖大盗，本来就没有犯法，即令犯了法，也应该由夏口地方法院审理，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无权审理律师施洋，如果你们一定要审理的话，那么你们就是藐视国法，逾越权限，你们首先就犯了国法，你们就要考虑你们对法律上应该负什么责任！”（《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33年4月，国民党主宰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与陈独秀一起办过杂志、政见并不相同的老朋友章士钊挺身而出，义务为他辩护，在法庭上雄辩滔滔，从法理、逻辑和事实多方面证明，“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他的辩护词洋洋万言，经当时《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报道、转载，轰动视听。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发表社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进行反驳，章士钊则在《申报》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予以回击，这场法庭内外的论战，不仅凸显出当年律师的风采，更让后人感慨的是章士钊的辩护词和陈独秀的自辩词，当年一经出版，就被一些大学的法学院列为必备的参考书。我们从中可以深刻地体悟到，律师不是孤立的，没有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等领域存在的正气，没有社会各层面的合力，无论是多么有胆气、有职业水准、有道义追求的律师也不太能有什么作为。换言之，没有社会大舞台上的各种角色，律师不可能单独演出精彩的活剧。章士钊律师的辩护未能改变国民党方面对陈独秀的审判结果，但他维护了法律和律师的尊严。

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夕的“七君子案”，沈钧儒等人因组织“救国会”、奔走抗日并组织罢工后援会而入狱，7个人中律师就占了4个（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为他们7人辩护的律师团更是一个庞大的阵容，21名律师皆一时之选，包括张耀曾、李肇甫、陈志皋、江庸、汪有龄、江一平、刘崇佑、张志让等，当年中国律师界的精华几乎倾巢而出。这些律师既有做过司法总长、国会议员、大理院（最高法院）审判长的，也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和苏州的律师公会会长，其中许多名律师都是仗义而来，义务为他们辩护。“七君子”的政治观点，他们并不完全认同，有的甚至不无分歧，比如对于组织“人民阵线”，张耀曾等律师就不赞同，汪宝楫之所以做沙千里的代理律师，是因为同乡关系，“尽可能地帮助一个朋友，而不是为了表明某个政治立场”。但是，针对起诉书对七君子“危害国家”的指控，律师团明确指出起诉书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对法律尊严的摧残，也是对历史功罪的妄断。很长一段时间，法庭上和新闻媒体始终回荡着当事人、律师和报人的浩然正气。因为“七君子案”，使史良成了当时曝光率最高的女律师，《金刚钻》等小报的多篇报道对她的看法前后并不一致，11月26日《关于史良被逮之所闻》说：“沪埠女律师队里，舍周文玑外，当推史良为最享盛誉。史自悬牌应征，执行律务以来，阅时已久，至年前始与一老律师唐豪合作，平日营业，雅称不恶。惟史之家累殊重，益以本人手头异常散漫，金钱到手辄尽……”12月10日又有一篇《史良之近况》称她“自悬牌律务以来，不独对于社会事业活动甚剧，抑且史本人，性喜夸诞，至平时开支，每月达一千五百元之巨。……而结果因入不敷出至迄今犹负债累累也。”到了1937年2月的几篇报道又称她“勇敢果毅”。抗战期间，她在重庆执业，战后回到社会。1946年，社会律师公会对会员律师的所得额进行评级，分6个级别，在958位律师中，史良成为进入前三级的3位女律师之一。在上海档案馆的“上海律师公会档案”中保存着她当年的26卷文件，主要是1946年到1949年之间的卷宗，在她承办的72件案子中大部分是民事案件，只有4件

刑事案件。

1948年，上海发生舞潮案，大批舞女权益受损，张红薇、陆惠民等女律师主动伸出援手。当事人陈慧玲（金美虹）回忆，张红薇很诚恳，她们在舞潮案期间见过几十次面，“以我的切身体验，张对我们的同情是真实的，也确实想帮助我们。”史良等也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办过许多妇女案子。（转引孙慧敏《民国时期上海的女律师（1927—1949）》，同上）

同一年，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停刊之后，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曾聘请章士钊、江庸、江一平、周一志等6个律师，起草了万言“诉愿书”，从法律、事实、情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有力的申辩，要求撤销处分。这份于情于理于法都无懈可击的“诉愿书”如同石沉大海，最终归于无效。尽管如此，他们诉诸法律层面的抗争、努力也并非毫无意义。在前法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时代，公民运用法律的武器，一点一滴地在法制框架内维权，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天长日久，这种积累会导致社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关键是这种努力是可持续的、长期的、韧性的，律师的作用也因此举足轻重。这就和那种诉诸一次性的冲动，很过瘾、很激烈的选择呈现出了不同的方向。在长远来看，前一种选择即渐进的积累所争得的进步无疑更可靠、更坚实。

历史也不会忘记当年律师协会的作用，这个律师行业的团体在社会不义面前并不缺席。1933年，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因文字狱而遭枪杀，举国上下的抗议声浪中不仅有新闻界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声音，还包括全国律师协会在内，他们公开通电，提出追究、惩办责任者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被迫做出回应，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1936年，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4位上海律师公会成员被捕，其中沈、沙还是执委会委员，在他们入狱期间，“公会内部从来没有人建议也从来没有任何行动来填补他们的职位。”相反，1937年8月初，当他们获释之后，执委会通过决议，为4位会员举行晚宴以致慰问。

当然，律师不仅要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生命的权利，律师要担当捍卫公民财产权和其他正当权益的职责。年轻的史良早年在上海开律师事务所，就是因为打民事纠纷官司而一举成名。在她办公室的桌上摆着一个醒目的银盾，上面镌刻着“人权保障”4个字，她不断以此自勉，要做一个正直的律师。律师执业不仅要直面不按法理、法条出牌的强权，而且要直面形形色色的社会恶势力，包括炙手可热的黑社会、助纣为虐的讼棍（律师界的败类）。张耀曾在上海执业时就曾多次遭遇这样的案件，有人劝他放弃，他说，律师的责任就是保障人权，如果无人在法律上为弱者说话，岂非律师之耻？“虽知与此种恶势力抗，殊多危险，然职责所在，亦不敢辞。”这些话至今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责任编辑　丁　东）

更　正

本刊第8期41页图片说明中的“县报座谈会”应为“全国首次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工作座谈会”。

2015年出书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①**文学及小说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游记、通讯等；历史、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②**社科、人文、历史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③**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行政、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和学术专著；④**美术类书稿：**画册、书法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08-8708　传真：010－65735038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王双、牛萍萍、文馨(编辑)
约稿详情、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zuojiaba.com
投稿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朗廷大厦A座515　编辑中心收(邮编：100024)

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

● 专业作家为您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等作品；● 只要您口述就行了，其余交给我们来做；● 作品以图书、光盘、摄影集、视频等形式发行；● 咨询热线：400-608-8708　邮箱：bookzj@126.com

★咨询即有精美新书赠送(有限量)！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我参加饶漱石专案组的遭遇

○ 陈 虹

一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总参政治部组织部任副部长。1967年4月12日深夜，杨成武代总长办公室主任来电话，让我马上去京西宾馆东休息室开会。我给参政值班室打电话，要值班员派车送我去宾馆，并请他将汽车的牌照号码，通知京西宾馆警卫科，以便门卫放行。

在宾馆等我的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赵宗和科长。他对我说，杨代总长在开会，会一完就来。说完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这时屋子里已有一个同志坐着，那就是后来一起工作的王成恩。他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位副科长，我们从未见过面。随后又来了两位空军干部，他们的姓名职务，当时我一无所知。

我们四人等了约半个小时，江青、叶群、戚本禹来了，杨成武随即也到了。江青一进门，手里拿着一个纸条，挨着点名：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我们一一答到后，她宣布：由陈虹为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最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收到一个名叫王征明的写来的信，揭发有人通敌，给台湾发电报。信中提到总参的张爱萍副总长。这些电报底稿都在上海，种种迹象表明，底稿有被转移的危险。现在底稿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要靠你们去寻找。江青还说，到上海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帮助，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去上海。工作中发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任务完成后立即回京。

去上海的介绍信，由戚本禹拿着，当面交给我们说，你们拿上这个，上海会帮忙的。如果遇到王征明，就把他一起弄来。这时江青又交给我一个便条，是张春桥写给秘书何秀文的。

任务布置完，江青对杨成武说："杨代总长，具体的事，你负责抓一抓。"叶群说，从现在起，你们不要回家，也不要给家里打电话了。小组中有人说，出差连洗漱用具都没带。叶群说，这些东西，你们到上海买新的吧。说完她和江青起身走了。杨成武送她们到门口，回来又对我交代："你们到上海，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发现什么情况，随时和我电话联系，可以用保密机打。"

接受了任务，我们四人坐上汽车，直奔沙河机场。空军三十四师女飞行员王云驾驶的伊尔14专机，已做好了准备。我们一登机，飞机就起飞了。这时我看了看手表，是13日凌晨2点。这次任务来得突然、神秘，人员互不认识，情况又不了解，到上海如何工作，我们在座舱中议论了一番。经过三个半小时飞行，降落在虹桥机场。下飞机时，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翟处长来接，将我们安排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

吃过早饭，我请翟处长先把何秀文找来。何秘书见到我给他的介绍信说，"这封信是本禹同志写的！"他看信时，我看到信的落款是陈伯达和江青的签名。

何秀文说，要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请来，政法系统由他管。一个电话打去，李彬山很快就来了。他是个老红军，办事认真负责。听完我们介绍，他说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存在警备区的一个弹药仓库里，可立即陪我们去。

弹药库远离市区，我们坐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四面有电网，警戒严密的军火库。李彬山向公安局管理材料的朱品涛做了介绍，我们又说明了来意。朱说，这里存放好几百箱材料，你们要的档案需逐个箱子查找。他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打开，为我们查找所需要的材料。

第三天，老朱指着一个箱子对我说，这是市

公安局领导交给我保管的材料，说是“通天”的，放在这里不安全，请你们带回北京去吧。我说，这件事现在决定不了，要请示领导。

16日中午，我到兴国路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用他的保密机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杨成武答复说，要报告江青，才能决定是否带回，并要我回北京前，再给他打一个电话。

当晚，我又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夜航返京。杨成武说，“关于那一箱‘通天’材料，下午已报告了周总理、江青同志，他们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我们接到指示后，随即去公安局，办理了手续，将这一箱材料带回北京。在飞机上，我们高兴地说，这一箱材料，是意外的收获。17日早晨到北京，材料原封未动地存进办公室，20日向江青写了请示如何处理的报告。

6月下旬，杨成武办公室的张忠庆秘书来电话说，首长要你和王育民来一下。那时杨成武在总参翠微路五所南楼办公，我和王育民按时到了他的办公室。杨成武说，那一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们看一下，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向中央报告。

二

我们二人回到办公室，关起门来，将箱子打开看。原来是一个人1954年写给江青的匿名信，经公安部立案，由上海市公安局侦查破案的材料。装在一个一尺四寸的小箱子里，共计二十三个卷宗，有的卷宗比较厚，有的只有几页纸。这些卷宗包括：一、匿名信。信的原件究竟有多少页不知道，因为没有存放在里边，但有信的第一页和信封的两幅放大照片。从照片上看，信封左下印有“华东文委”字样。信的第一页内容，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等等。二、笔迹照片。为了破案，当时从文艺界、公安系统、党政部门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干部，公安局技术部门逐个进行了鉴定。三、侦情简报。自立案侦查后工作进展情况、发现的线索，均及时向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陈丕显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及上海市公安的负责同志写了报告。侦查工作中形成的文书材料有五六个卷宗。从侦情简报上看，案子从1954年到1962年，侦察了八年，尚未有明确的结果。四、侦查对象调查材料。将笔迹鉴定中发现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有作案条件的人，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一些对象怀疑是作案人，进行调查，但搞了一段时间证明所侦查的对象不准确，予以否定。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如江青过去的女佣秦桂珍，她了解江青的历史，就被列为侦查对象；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朱岚，也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被列为怀疑对象，立案侦查过一段时间。侦查时间最长的，是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因为曾菲的笔迹经公安部门鉴定认为与匿名信很相似，曾菲对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那时贺子珍住在上海哥哥处，曾菲有时去看望她，安慰她。对1952年毛泽东到上海没有与女儿李敏见面，曾觉得不尽合适。而赖少其在上海党代会上又提了一个议案，建议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侦破小组得知这些情况，认定曾菲有作案条件和思想基础。因而对她长期侦查，把对敌侦查那一套手段也用上了。后来赖少其调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菲随之去合肥大学宣传部任职，但对她的侦查并没有放松，由此而形成的材料相当多，有五六个卷宗。五、江青的卷宗。仅有一个，写着“若干历史材料”六个字。有文字和照片。文字共三篇。一篇是江青（蓝苹）30年代在上海写给她当时的丈夫唐纳的公开信。破案人员是从那时的报纸上抄下来的。一篇是江青到延安和毛泽东结了婚，上海一小报的报道。还有一篇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江青带着孩子到重庆看病后的新闻报道及怀抱孩子的新闻图片。照片共两帧：一帧系江青扮演电影《王老五》的剧照；另一帧是结婚集体照，即唐纳、赵丹和顾而已三对，中间坐着主婚人沈钧儒。

我和王育民审阅了全部材料后，对这个案子是否已破搞不清楚，因为此事过去是公安系统管的。因此我们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仍由公安部专人负责处理。

报告送上去，江青大为不满。她跑到林彪那

里去闹，说保存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对江青说，这事好办，让他们重新写个报告，将材料销毁。林彪让杨成武落实。

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成武又找我和王育民到他的办公室说："报告送上去了，江青看了。她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林伯渠的妻子朱明自杀身亡，材料也没有必要保存了。你们重新写一份建议中央指定专人集体销毁材料的报告。"我们问这个报告怎么写。杨成武说：报告的内容，就根据我传达江青的意见，你们做的记录，在文字上做些整理。7月7日，按杨成武口述的内容，由我和王育民署名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

林彪看后用红铅笔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四人负责集体销毁。"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周总理阅后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法宪）、傅（崇碧）送来的一包材料一并销毁。"转呈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

批示传下来后，正值谢富治去昆明调查，不在京。7月13日起，杨成武和汪东兴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8月关锋又被抓了起来。因此，销毁材料的事被搁下来了

9月23日，杨成武随毛主席由南方回到北京。谢富治告诉杨成武，江青几次大发脾气，说是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要放长线钓大鱼。杨成武将实情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周总理明确指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监销。他们通知王育民将材料送到中南海勤政殿汪东兴那里，先按目录核实材料，然后由谢富治动手点火，王育民负责向火里一卷卷扔。他们三人坐在一边守着，谁也没有翻看材料的内容。谢富治还说："谁说我不亲自动手啊！"烧完后，三人都在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是1967年9月27日下午。这个报告和批示的原件，存在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处。

三

1967年11月上旬一天的晚上，杨成武召集中央专案"二办"各专案组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散会时，他交给我一张纸条，上写"江青叫你们去提审扬帆，搞清他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的事"。并对我说：你们审后，把口供记录带回来给我看看。杨成武布置任务时，吴法宪也在场。

本文作者陈虹

扬帆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是怎么回事，要弄清什么问题，我都不清楚，便向杨成武提了些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给了这个任务，我负责办理就是了。"

第二天，我和王育民、王成恩去秦城监狱提审扬帆，由我和王育民问话，王成恩记录。警卫战士将扬帆带到审讯室。在一个腰鼓形的圆凳子上坐下后，我们开始审问。我说："扬帆，你把向中央发电报的事交代一下。"

扬帆长期做情报联络工作，上海解放后，任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他对于审讯这一套是内行，有丰富的经验，脑子清醒，思想敏锐，回答问题很注意分寸。他定了定神，回答说："我根本没有向中央发过电报，也根本没有条件自己发电报。不知你们问的是哪一年的事。"王育民说："不管哪一年，凡是发电报的事，你都可以交代。"王育民故意把问话范围拉大些，因为我们对这件事的经过并不清楚，心里没有底。

扬帆说，如果你们问的是1939年的事，我

1954年被关押起来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来问过了。

我们就要他把1939年的事交代清楚。

扬帆说，1939年我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文化队任指导员，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项英。他跳下马来边走边问我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因为我来皖南前在上海电影评论协会任书记。唐纳在我们影协办的杂志任编辑，写电影评论文章。江青那时叫蓝苹，在协会下边的“无名剧社”当演员，曾经被捕过，脱过党。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向项英做了回答。扬帆说：“如果有电报的话，那一定是项英用我的名字发的。因我本人根本不具备直接向中央发电报的条件。”扬帆还承认他对项英讲的那些话，是提供了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炮弹”，当了“弹药手”。扬帆非常细心，交代问题时没有敢提江青的名字，我们的记录也是按他讲的，写着“中央负责同志”。这份审讯记录抄清经扬帆看后，他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指印。我们将记录先报送杨成武，他看后批给吴法宪，转送了江青。

江青看到扬帆的文字交代，于1968年1月19日晚上，在怀仁堂西休息室要我们汇报工作时说：“你们送来扬帆的口供记录，我看后很高兴，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他过去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都是署名殷扬，反对我和毛主席结婚。你们再去提审。”

但事后我们再没有去审扬帆。我们觉得，审来审去都是同一个内容，而且扬帆已经交代清楚了。

江青还要我所在的饶漱石专案组查一个“黑大汉”的下落，我们在上海市公安局50年代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材料中找到了，并写了报告送江青。报告的原文是：

关于黑大汉的情况，已查明。黑原名赵耀珊，又名赵立人、赵立容、老韩，安徽人，1933年春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6月20日被捕，当即叛变当了特务。解放后被我政府逮捕，1954年3月被处决。档案存上海市公安局和苏北劳改农场。

与黑同时被捕的有省委交通叶蓁，又名（李文碧，无锡阿妹）叛变后与赵同居，现住上海欧阳路131号。

饶漱石专案组　1968年1月20号

当时“饶案”不知道江青为什么要查找黑大汉的下落，后来了解到，原来这位黑大汉是30年代江青被捕后的审判者，掌握江青的实情。江青得知黑已被处决，她也就放下心头的疑虑了。

1968年初，潘汉年在狱中写了一份“认罪书”，我们报给江青，她看后签了字。2月潘汉年又写了“认罪书”之二，江青看后，就在这份“认罪书”的标题旁边写上：“为什么不将认罪书之一送给我看？”她多次说“饶案”是她亲自抓的，但是现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四

1968年3月下旬，发生“杨、余、傅事件”，我于4月12日离开专案组，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1968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中央“二办”专案组给我来电话，说吴法宪让我立即去京西宾馆，并派车来接我。我离开“二办”已两个多月了，走时移交手续办得清清楚楚，突然要我去干什么呢？一路上心里很是不安。

我走进宾馆六楼会议室一看，邱会作、王育民和接替我工作的北京军区炮兵师政委齐路安，已在那里坐着。见面时谁也不说什么，气氛显得相当紧张。不久吴法宪进屋坐下，开口就批评，你们提审扬帆压根儿就不应该做文字记录。又指着我说，现在你们把口供整理成材料放在那里，一旦被人看了，扩散出去，这个后果你要负责！他宣布立即销毁。随后由邱会作点火，将扬帆的口供记录，在会议室的痰盂里化为灰烬。

专案组的所有材料，都有编号，缺少一份，事后无法交代。因此要求我们留下一个字据。王育民当即用一张白纸，写了“饶案”某某号口供记录经军委办事组决定销毁。监销人邱会作，执行人王育民、齐路安，见证人陈虹。下边是年月日。这份简单的字据，吴法宪是代表军委办事组来宣布决定的，不属于监督者，没有在上面签字，我们都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我起身回家，在车上想，事情是你们叫办的，为什么都成了我的错误呢？所谓搞“通天”材料，审扬帆，查黑大汉，

这些事都是江青要我们去办的。“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江青却反咬一口，首先发难。她1968年3月在驻京军队师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说我们搞了她的黑材料。

在1968年4月20日中央专案“二办”全体人员大会上，江青大声问道：“陈虹来了没有？”下面有人说，他已经回原单位了。江青说：“回去了也跑不了，我已叫人对他进行审查了！”不久，就宣布我“不是好人”。1968年12月14日，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罪恶活动”的罪名，将我拘留，送进监牢，一蹲就是6年零5个月之久。在狱中，我受到训斥、体罚、打骂、逼供信。他们诬害我不仅整了江青的黑材料，而且还说被杨成武派去广州搞阴谋，要把黄永胜打倒。说关锋插手广州，也是由我去搞。由于我从来不认识关锋，没有单独和他说过一句话，我据理驳斥了这一谎言。

五

我被捕以后，这件事还没有完。

1969年11月2日，江青接见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专案组时说：“杨成武在1967年春天利用合法手段搞我的四篇文章，实际上是立我的专案，从上海拿了几箱材料。”

1970年1月24日，江青对审查杨成武的专案人员说：“我同杨成武斗了几次，杨成武与戚本禹勾结起来搞黑材料。杨成武假借饶漱石的专案，立了我的专案。”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不好再说杨成武反对林副主席了，她又诬陷杨成武“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

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全体人员时，江青利用这一时机，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二办’饶漱石这个专案是我负责的，而杨成武却对我封锁，还给我立了一个专案。让陈虹、王育民、朱铁铮三个人整我的材料。能有什么材料?只不过是我过去的一封公开信。杨成武这么干，我才下决心找我的这封公开信，还是春桥同志帮我找到的。这封公开信，很是说明我的问题：第一，我是坚决抗日的；第二，我是抵制国民党特务的……他们还提审扬帆搞黑调查。”

周恩来当即问道：“王育民来了没有？是怎么回事？”王育民站起来据实回答说：“审扬帆还是杨成武管‘二办’那个时期，是吴法宪参加布置的。”

江青说，现在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了，你说吴法宪参加的，吴法宪却咬了一口说是康老叫他们搞的，康老又不管这个案子，我才不相信。江青问王育民，杨成武是怎么布置你们整我的黑材料的？

王育民回答：杨成武根本没有布置我们整你的黑材料。

王育民在周总理面前，如实地报告了杨成武传达江青的指示，审问扬帆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的具体情况。江青立即矢口否认说：“我怎么能叫你们去审问呢？”

会后，江青撤销了王育民“二办”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和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令他交代问题，回空军劳动改造，指示空军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让他转业。“四人帮”垮台后，王育民的冤案才得以平反，回到军队工作。

1974年，毛主席多次口头指示和文字批示：“‘杨、余、傅’案的性质应重新考虑”，并说他“可能偏听偏信了”，明确表示“搞错了，要翻案，要平反”。江青对杨成武的问题仍然揪住不放。1974年2月7日，中央讨论专案组整理的《杨成武问题的报告》时，江青说：“报告的第二页对我个人意见不计较，但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写报告欺骗中央，不写不妥。”幸亏周恩来说：“我认为杨成武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有路线错误，他自己可以写出材料。”不久，专案组将整理的杨成武的材料上报政治局讨论，决定予以平反。杨成武于1974年5月23日恢复自由。

1974年10月11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办”来人审查我的问题，1975年5月16日15时释放回家，恢复自由。1980年8月6日，总参党委发出〔80〕参政字第116号《为陈虹同志平反的决定》。我于1980年10月恢复工作，任总参管理局营房处正师级政治委员。

（2015年7月29日）■

（责任编辑 丁 东）

亲历延安抢救运动

○ 杜 惠

一、入狱

我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长寿县，初中在四川省丰都适存女中读书，接受了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高中在成都省女中读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冬到延安，先后在女子大学和西北公学学习。

在西北公学情报班，我学习默记暗语，准备到国统区做秘密工作。1942年下半年，开始学习整风文件。讨论学校的总结时，多数同学认为需要补充修改，我和另外六个同学要求学校重新总结，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1943年2月，我和郭小川结婚。3月，延安各机关学校关门整风，大家停止往来。不久又转入审干运动，大家写自传，查思想，查历史，查经历。不久又转入“抢救失足者”，“坦白光荣”“坦白有功”的口号响成一片。坦白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有的戴了大红花，有的上了大会主席台，有的吃上了鸡蛋挂面，有的领到了西红柿或老南瓜。这都是当年艰苦环境下难得的珍贵食物。延安伙房都烧柴火，老南瓜往柴火灰里一煨，又甜又面，别有一番美味。西红柿也是那两年刚引种到延安的，我也种过，产量不高，大家都喜欢吃。一时坦白成风，坦白是特务就没事了，轻松过关。同班中还出了个“坦白光荣”的典型张克勤，到处做报告。

又传来消息，说四川党、河南党都已经查出是“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务党），某某上吊畏罪自杀了。这些对我并无影响，我坚信，我接触到的四川党的人都是好同志。不久，也追到我的头上，逼我坦白参加的是“CC”还是“复兴”。我回答：“我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别的什么组织也没参加，也不知道什么是‘CC’，什么是‘复兴’。”我当时有一个要求：“假如有人冤枉我，说我是特务，我要求到毛主席面前跟那个人对质。”我当时有一个单纯的想法：任何人在党的领袖面前是不能说假话的，在领袖面前对质，什么问题都能弄清楚。我到延安在办公厅为毛主席抄过文件，他请我们吃过丰盛的春节年夜饭，一定是信任我的。他们一再逼问，我火冒三丈，昂首挺胸、横眉怒目地对抗。心想：对我政治生命的怀疑，是最大侮辱，只能对抗到底，决不低头！开了几个白天的逼斗会后，接着来了个三天三夜不让休息的车轮战。领导追查会的是个瘦高的红军老大姐。除了那两句追逼的话，也别无它话。他们态度时而严厉，时而和缓，有时用口号骗我，有时又用好吃好喝的引诱我。我一概不动心。他们从未打过我，没有动我一个指头。因为我历史清白，充满自信，什么也不怕。后来困得快要倒下，也咬牙坚持下来。内心也曾有过死的想法。窑洞里什么也没有，桌上只有一盒洋火（火柴），心想抓过洋火吞进肚里，跳进茅坑算了！这一闪念刚刚划过心头，头脑立刻清醒过来：这样死去，永远跟茅坑一样臭，永远会背上叛党的罪名，永远无人为我洗冤，决不能死！一定要斗争到底，还我清白！

90年代初，我曾看望枣园老同学凌云、梅建群夫妇。凌云问我：“三天三夜车轮战最后一天，是谭政文亲自突审的，你知道吗？”我一点也不知道。凌云说：“他拍着胸脯说：你们社会部不就一个杜惠没有解决吗？我就不信降伏不了她。我亲自去突审一天，看她还那么死顽固嘛！”谭政文到底怎样突审我的，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我迷迷糊糊，就想睡觉。那几天我是否吃了饭，吃的什么饭菜，喝没喝水，什么人审我，周围人物、事物、天气等，完全没有印象。我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一句话：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不是特务。

车轮战第三天的午夜，迷糊中觉得有人推门进来，说：“前沟李副部长叫杜惠去谈话。”我睁眼

一看,门边站着两个小战士。我记得,李克农有点胖,给我们做过报告,人很慈祥和气,像老妈妈一样亲切。现在叫我去谈话,好像伸手给一个沉入深水的人,要拉我一把。我心里泛起一丝兴奋。我想抬腿,却不会迈步了,身上没有一点劲。又听见一个声音说:你们好好拉着她点儿,她要摔倒了会起不来的。

不知走了多久,来到了克农同志的办公室。两个小同志一直把我牵到他的办公桌前。李克农和蔼地看着我说:“你坐吧。”我就坐到他的桌子对面。他叫小战士给我端来一大杯温水,他一定想到我非常渴。看我一下子喝下多半杯,又问我:“饿不饿?想吃饭吗?”我那几天不知道饿,说:“不想吃。”他说:“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赶快谈谈吧。如果能很快帮你解决问题,你也能好好休息一下了。”然后更关注地看着我问道:“开了这么多天的会,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天叫你来,最后问你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特务?在这里坦白了,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杜惠1936年在成都

我坚定地回答:“我绝不是特务,也不知道什么‘CC’,什么‘复兴’。我是庄严宣誓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我从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室内沉默了一会。李克农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了,只好把你送到后沟去,由他们去解决你的问题吧。”当时我并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心想:也就是回学校再挨斗吧!反正我不怕!

他把两个小战士叫进来送我,领我上了半山坡,我看到左边有两孔窑洞,窑前的平台比较宽,台地可以转到后面去,可能往沟里方向还有窑洞……

离我近的窑洞里有灯光,窗户纸很白,门上挂着白布门帘,既像招待所,又像医务室。战士说:“你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我在山坡边站岗,有事可以叫我。灯可以不用灭。桌上有水可以喝。”

我进到窑洞里一看,墙很白,高处挂的马灯显得特别亮,除了一盘炕、一张桌、一杯水,什么也没有。我一口气把水喝完,倒头和衣睡下。多少天的紧张、疲累全抛到脑后,立即沉沉地睡去了。

一觉醒来时,已是次日的下午。走出窑洞,看到日头已向山后转去。战士给我端来一碗饭、一杯水。吃过饭后,坐在炕沿,我还想再睡一会儿。正在这时,忽然有人掀开门帘,疯了一般地向我扑来,把我推倒在炕上。他正要向我身上压来,我两手推着他,大叫:“快来抓坏人!快来抓坏人啦!”战士像箭一般冲进来,拎起那人的后衣领,让他站起来。我一看,是我西北公学的同班同学、长一脸络腮胡须的许某。我骂了他一句:“无耻!”战士也生气地问他:“你从哪儿跑出来干这种坏事?赶快走开!”把他赶走了。

我再也不想睡了,坐在炕沿,脑子一片空白。

天色快要变成灰蓝色,走来一位工作人员说:“跟我走吧。”领我上了又一层山坡,向山里又转了转,到一排窑洞的平台上,一个背枪的战士来回走动着。领我的人指着第一间窑洞说:“以后你就住在这里了。”他推开门。我进来后,他在外边就把门锁上了。

一看,原来是一间牢房。门上只有一个比巴掌稍大的小洞,窗上是密密的格子,糊着很旧的纸,室内光线昏暗。六张空空的木板床,一边放着三张,中间是条窄道。门内角上还有一个木桶,用作马桶。土墙高处,挖进去一个小洞,洞里一盏小油灯,射出一闪一闪的微弱黄光。他们很快从小门洞送来饭和水,好像还有一方土布毛巾、牙刷、牙杯和一小盒牙粉。

我选了靠里的一张床。天黑下来,我倒头睡下。正睡得香甜的时候,忽然有人打开门,叫我起来跟他走。转到对面山坡的一间窑洞里,靠里有张大长桌,桌后坐了六个人。中间坐的是康生,我认识,他给我们做过报告。他向我宣布:

“这里是关押特务和反革命的监狱。中央专门成立了审查你的五人专案小组，成员是：汪金祥、陈龙、杨超、王涛江、汪东兴。关在这里的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坦白认罪，悔过自新，走光明大道；另一条就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今天这是第一次提审你，你必须坦白交代：什么时候加入特务组织的？是加入的‘CC’呢，还是‘复兴’？”

我的性格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一点也没有吓唬住我。我昂起头来直视着他们说：“我冤枉！”然后把前几次那些话又说了一遍，最后又叫了一声：“我要到毛主席跟前对质！”

开始，他们想命令我跪下。我说：“共产党员，杀头都不怕，我决不会下跪。”逼问来逼问去，第一次提审毫无收获地收场了。我回到牢房又倒头睡下。

第二天早饭后，他们打开门，给我戴上脚镣。到晚上，戴着脚镣我照样能睡得深沉。脚镣只在半夜提审时才给打开，审问结束又给戴上。这样每天半夜提审，每天戴脚镣，大约有十天。他们每天遭我怒目对抗，也许觉得无趣，以后就没有再重复这两个项目了。

不久又遇到了一件令我愤怒的事。有人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说：“这是监狱长办公室，进去吧。”我进去后，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矮个儿男人，脸黑红，身材结实。他用四川口音说：“我叫杨浩然，长征过来的，在这里负责。对你们治病救人嘛！”接着又说了些“坦白从宽”之类的话。看我一声不响，他也没兴趣再说下去了。沉默了一会儿，他让我坐在桌旁一张凳子上。这时他带点儿友好的态度说：“你是四川人，我们还是老乡咧！”我也没说话。过一会儿，他从桌子那边的凳子上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说：“你没参加过劳动吧？参没参加过劳动，一看手就知道了。”他抓起我的手，翻看了一下，说：“没参加过什么劳动，以后还得好好改造改造。”然后，他忽然抓着我的手抚摸起来。

我噌地一下站起来，愤怒地叫道：“你干什么？你以为我是犯人，好欺负？我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员！我敢向领导告你！你敢无礼，我叫你垮台！”

他立刻吓得脸色发灰，赶快缩回了那双脏手，连连说：“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你走吧！”我气冲冲地跑出他的房间，回到我的牢房。

再没有人敢提审我，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当时也不懂得要点书报来看，整天闲坐。

二、想通了

一天早饭后，我被叫出牢门，一看，门前已排了有近二十个人，双手都捆在背后，绳子把大家连成了一串。我被捆到最后，心想，大概都拉出去枪毙吧？死，我不怕，可太冤枉！我能表示的只有愤怒和敌视，在心中我拟了几个口号，临死也要高喊出来：“我冤枉！”“我是坚强的共产党员！”

一串人被拉着走啊走啊，却没有往后沟野山坡去，而是向前沟走，来到了西北公学大礼堂。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这一串被拉到了礼堂最后，靠墙根站成一排。我想，也许大会宣判以后就会行刑吧。

因为轻度近视，主席台上有些什么人我看不清。有人开始讲演，听声音我认为是毛主席，后来我才得知讲演的是徐特立老人。我认真听着，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这段话：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快要到来，我们党需要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而大批从国统区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党还不很了解，同时也需要对大家进行思想改造，开展整风、审干就十分重要了。一切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大家就会理解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了。现在还有人对党抱敌对、抗拒的态度，希望这样的同志跟党站在一条心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冷静地向党说清自己的情况。现在抢救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真真假假，要通过改造世界观，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解决。刘志丹同志曾受过党的怀疑和审查，但他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在陕北地区党内身居要职，被怀疑受审查时，有人建议他出逃，有人建议他举兵起义，分庭抗礼，而他却沉着冷静地命令警卫员将自己捆起来，送到上级机关去接受审查。当然，他的问题也就很快弄清了。他为党内审查工作留下了一段光辉的佳话。

这讲话深深打动了我。刘志丹的光辉榜样使我惭愧。我要重新考虑我的态度，重新解剖我自己。被捆绑着押来大礼堂时，我是昂首挺胸，

杜惠(前排中)1945年9月17日摄于延安

怒不可遏。现在捆绑着走回监狱,我已变得低头深思,平心静气,眼里浮着感动的泪花。我与来时判若两人。

走进牢房,我第一次轻轻地安坐在床铺上,心潮翻滚如大海的狂涛巨浪。我问自己:既然庄严宣过誓,为党的利益,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为什么一碰到怀疑我就如此敌视、对抗、怒气冲天呢?这样做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誓言吗?

我问自己:为什么自己的自尊、骄傲、面子就那么强、那么大呢?不就因为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是天之骄子,谁也不敢惹吗?应不应该彻底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呢?

这种自问自审,我才发现,自己灵魂里面还有个人主义的脏东西。

晚饭后,我请人拿来纸笔。当晚,我就在油灯下奋笔疾书,直到第二天深夜,写出了万言检讨书。我检查了自己灵魂深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王国,还检查了自己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比如:在川陕路上顺利到达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最骄傲的内心中只看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敢无畏、随机应变。事实上,没有四川省委、赵大姐的周密安排教导,没有周大姐一家的帮助,没有哥老会侯表叔及其司机的掩护,没有西安三轮车工人的帮助……我怎么能顺利到达?这样一自审,骄傲的王国便不攻自破了。我决心进行思想改造。

写出检查,交给领导,自己解放了自己,心平如镜,一身轻松。至于何时走出牢房,这一切都已不在我的关心范围之中了。从此,我把监狱看成了锻炼自己的课堂。怨气与怒气烟消云散。

不久,我被带离了单人牢房,搬到下一层窑洞的三人牢房。这里大门常开,窗户上糊着白纸,但按规定不能相互交谈,各自思考各自的问题。三人之一叫陈今,东北人,是我女大六班同学,歌唱得好。另一位姓李,年龄稍大,高个,瘦弱,脸色也不好,看似有病。我们同住了大约几个月,都不说话,相互情况一概不知,无言中和平相处。

住在这里,可以下山坡到沟底一个小水坑里打水,洗脸洗脚。从此,不论天冷天热,我开始了每天冷水擦澡。长期住牢房,精神亢奋,思想活跃,身体却有点衰弱了。每天冷水擦身后,体力很快恢复起来,血液循环强劲了,面色和全身皮肤红润了,精神更旺盛了。这一时期的冷水锻炼,对后来几十年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影响。

以后,又让我参加了纺线活动,就在窑洞外的平台上。纺的是细线,用三股合在一起可以缝衣服。每天只能纺几钱棉花,我都认真努力地做。纺线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学习党的七大文件,学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七大的报告。我也学得很认真。

1945年8月的一天,日寇投降前夕,五人专案组向我宣布审查结论:“杜惠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恢复党籍,分配工作。但杜惠作风不好。”

我对后面一句是有意见的,但为了立即迈出监狱之门,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还我清白,这是最根本的。至于说我作风不好,以后有机会再问清吧。我会用今后一生的思想言行来证明:结论这后一句话是完全错误的。

结论一宣布完,我就迫不及待地大步奔出门外,跑到沟底,我恨不能脚生云,背生翅,一下子飞到小川身边去。这时,一切甜美的回忆都涌上心头。沿途的道路、景色、风物,怎样走上他窑洞门前,都没有留意,只记得我扑到他的怀中,只记得长久的欢笑和热吻。等我们都喘过气来,他才捧着我的脸仔细端详,问我:“你怎么更红润了?不像是从牢狱出来的。”

我笑了，说："我进行了一次自我革命，思想升华了。"我们真正尝到了久别胜新婚的生活，一分钟也不愿分离。

小川告诉我，8月13日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央决定他参加第一批新区工作队，16日告别延安。

我们如胶似漆地待了两天两宿，在中央组织部门外送他出发南去时，我说，等他确定了工作岗位，我就争取和他共同战斗。他说，他在新区等着我。后来，我随第二批新区工作队，到了热河丰宁县，与小川一起工作。送走小川，我回到枣园西北公学看望同学。大家见到我都惊奇地问："你哪像从监狱出来的，倒像是从前方打了胜仗回来的，满脸欢笑，又红又健壮了。别人从监狱出来，可是灰溜溜的啊！你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同学说："把你们押到大礼堂听报告时，看你那神气，真是个最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咧！今天怎么完全变了？"

我讲述了自我思想解放的过程。之后，同学王演说："大家快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去工作了，不容易再相聚。让杜惠给我们题几句话留作纪念吧。"

我拿起笔来，即兴写了下面一段话：

当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自己全心的狂热，奔向真理，奔向革命，奔向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之路只是开始！

我们开始获得了真正的快乐、自由与幸福！

在这里，我们决不能停留，必须迈开大步，突破自我存在的气象，抛弃狭隘的个人优越感，磨掉那些外露的表现的棱角！

我们经受而屈服于真正新的阶级的洗礼，我们就开始成长起来了。

这个留言，反映了我经过烈火锤炼后的真实想法。

三、再遇李克农

1953年我调到中宣部工作。1954年夏，中宣部派我搭乘中央专列，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卫生工作会议。在列车过道里，我遇见了李克农。他向我微笑地打招呼，让我到他包厢里落座。

他问我："你知不知道，当时中央怎么发现抢救运动搞错了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到处坦白自己是"特务"达到高潮时，你在西北公学的同学施英也起来坦白说自己是特务。学校向我们汇报后，我马上报告中央，引起极大震惊。你也知道，施英是赵世炎烈士的侄儿，没有任何条件和机会接触国民党特务机关，他的家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最可靠的秘密据点，他全家都是共产党员，包括厨师、老妈子和看门人。施英从小长大，进出学校，都有人暗中守护，他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坏人。他15岁就来延安，一直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分析了一切条件，他绝不可能是特务。但他为什么承认呢？中央有关同志立即找他来谈话，问他：你怎么也是特务呢？你参加的哪个特务组织？什么时间、地点？谁介绍你参加的？他一问三不知。我们再问："那你为什么坦白自己是特务呢？"他说："号召说'坦白光荣''坦白有功'，又给戴大红花，又给发西红柿、老南瓜，还给吃鸡蛋挂面，我当然愿意坦白自己是特务啦。"

我大笑说："施英这个小鬼太滑稽可笑了！太天真幼稚了！"

克农同志也勉强地笑了一笑。接着他的神情变了，看着我苦笑着说，我们觉得问题严重了！又分头找了几个小鬼来问，叫他们说说是怎么成特务的，也是一问三不知。有的和施英的想法差不多；有的说，那么追逼，他逃不脱，大家说"坦白了就没事了"，他就坦白了。他们说实际上并不知道特务是怎么回事。我们感到问题太严重了！抢救运动搞错了！我们把情况立即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立即起草指示：运动马上转入甄别阶段。

这时，我和克农同志都沉默下来，陷入了沉思。克农同志说：后来发现，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假坦白、假特务。

我们谈的时间不短，他把我送了出来。

在列车上遇见李克农同志后，我到了北戴河，在中央小范围的舞会上，我与毛主席和周总理跳了舞，心情非常愉快。我的历史澄清了，也不需要到毛主席面前对质了。■

（作者为《光明日报》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丁　东）

随周总理陪同外宾参观二三事

○ 华方治

1973年，我在中央警卫团担任干部大队副大队长，曾经三次随同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到外地参观访问。

第一次是4月23日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参观大寨。火车专列从北京经娘子关进入山西，列车停在阳泉市，同车还有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娘子关地处太行山上，山势陡峭，在古代可谓险要；4月山上干旱缺雨，一片荒芜，没有绿色；过了关，进入峡谷地带，出现绿色，到了阳泉，山上又呈光秃，除树初露绿芽外，少见绿色。参观结束后，列车返回石家庄，埃切维利亚总统乘飞机走了，我和三中队的同志随车回北京。

第二次是1973年9月15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山西省大同云冈石窟等名胜古迹。事前，专列专程试车，用两辆内燃机车，前拉后推。试车时邓颖超大姐也来参加，列车到大同时没下车，很快返回，试车顺利。那天出了长城，路旁庄稼长势不良，玉米长得如谷子，穗小秸细，张家口周围也是如此，到了大同开始呈现庄稼长势旺盛的景象。

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下火车后乘汽车直奔云冈。云冈石窟系北魏所造，石窟处在河岸，石雕高大雄伟，技艺高超。随同的中外记者有百余人，周总理几次对法国记者说：“是你们总统把我带来了。”后来参观结束时，一法国记者问：“总理先生，你多次说是我们总统把你带来的，那么你以前为什么不来呢？”总理答：“特朗瓦意—博古（法语：工作很忙。）”大家听了哄堂大笑。总理对记者说：“四年后请记者先生们再来参观，四年后一定要修理的，一定会修好的。”又指着文物管理局王冶秋局长说：“如果四年修不好，唯王先生是问。”蓬皮杜总统听后说：“总理先生，你把任务交给王先生，你不拨经费给他，他怎么能完成任务？”总理答：“交任务的同时，经费就拨给了。”大家又是一阵大笑。参观完石窟后，去宾馆休息。

总理由王冶秋局长陪同，观看了九龙壁，王局长介绍：“九龙壁是明洪武廿四年所建，为朱元璋第十三子，代王朱桂府前的影壁，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座琉璃九龙壁。”他又向总理建议说：“詹天佑对我国铁路建设是有功的，文革中红卫兵把他的铜像推倒了，在青龙桥车站，应该重新竖起来。”总理同意他的建议。王局长还问总理：“以前来过大同吗？”总理说：“抗战期间曾路过。”

中午，大同市长设午宴款待总统一行，周总理作陪。宴会后，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参观了华严寺大雄宝殿和善化寺，参观后，乘火车返回北京。我和三中队的同志，随车警卫往返顺利。

第三次是这一年10月13日到14日，周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洛阳龙门石窟，专列从北京出发经石家庄、郑州到达洛阳，下车换乘汽车去石窟。石窟处在洛河岸边，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齐名，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参观时，外宾不时称赞中国古代的高超文化，说着走着把特鲁多夫人落下了，总理说：“咱们得等等夫人。”待夫人赶上来时，特鲁多总理指指夫人怀孕的大肚子说：“她是这个原因走得慢。”夫人笑了。特鲁多总理说：“总理先生送我的印章我很喜欢，将来给你写信一定盖上印章。”总理说：“那是中国名家篆刻的，也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艺术。”

参观完毕，中午，洛阳市市长设午宴款待特鲁多总理一行，周总理出席作陪，宴会上市长致欢迎词，特鲁多总理致答词。特鲁多总理的英语讲话要再翻译成法语，中方讲话要翻译成英法两种语言，因为加拿大法律规定官方语言是英法两种。宴会后周总理陪外宾乘飞机走了，我和三中队的同志乘专列回北京。

1973年周总理已经75岁，并查出癌症。当时出现了外国领导人纷纷访华的热潮，周总理都要待之以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作者为原中央警卫团常务副团长）

（责任编辑　丁　东）

一次难忘的外调

○ 于峰华

我于1978年底调到酒泉钢铁公司钢铁研究所工作。酒钢1958年上马，当时的口号是要建成鞍钢、武钢、包钢、酒钢四大钢铁基地。然而尚未迈开步子，便遇到了大饥荒，被迫下马。五六万职工有的下放，有的调走，有的到新疆建设兵团易地就食，只留1700余人留守看摊子。

1965年，国家把酒钢定为"大三线"重点工程，再次上马，并从首都调来了冶金、建筑、运输、医疗等各方面的职工，又从鞍钢、本钢等地调来了一大批职工。不久，文革开始，直到1970年，酒钢第三次上马，终于建成了1513立方米的炼铁高炉，炼出了第一炉政治生铁。由于选矿、烧结等项目不配套，自出铁后，连年亏损，出现了"干不干，一年亏损三千万"的窘境。1979年《工人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三上三下的酒钢不能再上马了》。此文不光在酒钢一石激浪，同时也惊动了中央和省里的领导。

1979年4—5月，甘肃省委领导陈光毅、贾志杰到酒钢蹲点调研，深入厂矿、车间、班组了解情况，又召开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一系列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座谈会上有人说，酒钢上不去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人才。有一位老工人反驳说，谁说酒钢缺乏人才？1965年酒钢二次上马时，国家分来了500名大学生，加上原有的技术人员有数千名。关键是放着人才不用。譬如钢研所工程师蔡化楠是我国著名的炼铁专家，在《炼铁》杂志上发表了很多论文。他的同学徐矩良担任了冶金部副部长，而他却窝在这里得不到重用。陈光毅、贾志杰听后就问公司领导，蔡化楠这样的专家为何不重用？公司领导说，蔡化楠有历史问题，至今没有搞清楚。陈光毅说，现在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他的问题怎么就弄不清？公司领导说，公司两次派人去外调，三次函调，都无结果。陈光毅说，你们再派人去外调，一定要搞清他的问题。省上领导发了话，公司领导自然十分重视。

我原先在核工业23公司工作，调到酒钢时，领导在鉴定表上写了这样一段话："该同志搞外调很有经验，曾为多位同志搞清了历史问题。"1979年6月，钢研所党委书记于永清把我找去，讲了陈光毅、贾志杰的指示，对我说，这次派你去搞外调，我们考虑你不认识蔡化楠，去后不会有私心杂念。你去后，一定要顺藤摸瓜把问题搞清楚。从机关给你派个助手，以你为主。

这样，我和另一位同志到了鞍钢炼铁厂组织部。组织部刘部长听我们说明了来意，瞥了一眼介绍信，很不高兴地说，你们怎么又来了？我说，我们这是第一次来，以前并未来过。他说，你们未来过，不等于别人也未来。以前，你们公司两次派人前来外调，又三次函调。我们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蔡化楠的问题不属于这次平反冤假错案的范畴，他是因为骄傲自满才被开出党籍的。我说，刘部长能不能把开除他党籍的过程详细谈一谈？他说，蔡化楠1954年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我厂当技术员，很快被提升为炼铁高炉值班长，享受科级干部待遇。那时大学生少啊！升为值班长后又入了党。尽管他的毛病很多，但在支部大会上还是通过了。入党不久，他就翘尾巴，骄傲自满了。他和他的大学同学，就是现在冶金部当副部长的徐矩良，两人分别带着甲班、乙班，在交接班日志上互相打笔仗。你说他的卫生未打扫，他说你的工具未摆放好。厂长蔡博出面都未解决他们的矛盾。最后，就把他开除党籍。我说，打笔仗是两个人的事，为这点儿事，一个当了副部长，一个背了处分，从道理上讲不通。他说，蔡化楠骄傲自满的毛病到现在也没有改。我说，你们几十年没有见过面，怎么知道他的毛病到现在还没有改？

刘部长拉开抽屉，拿出一封信说，其实我并不认识蔡化楠。1958年他背处分的时候，我还

在基层。这次平反冤假错案没有轮到他,他就给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写信。你看看,这是胡耀邦亲自批转给我们的信。

我接过一看,是蔡化楠写给胡耀邦的申诉信,在结尾的空白处,有胡耀邦的亲笔批示。大意是:鞍钢炼铁厂负责同志,请认真核查蔡化楠同志反映的问题,给予落实政策。后面是胡耀邦的亲笔签字和年月日。字迹清秀,是用深蓝墨水书写的钢笔字。

看完信我说,其实我也不认识蔡化楠。他给中央写信,说明确有冤情,还请你们按胡耀邦的批示再复查一下。刘部长说,他哪里是给中央反映自己的冤情,这不是明摆着向中央告我们的状吗?我找好几个人了解过,他们都说蔡化楠是因为骄傲自满而背处分的。他这毛病看样子是一辈子也改不了了。

我说,凡是有本事的人可能都有这毛病。像我这没本事的,想骄傲也骄傲不起来呀。国家培养一个知识分子不容易,请刘部长再考虑一下。他说,好啦,我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你们到鞍钢的外调工作到此结束。你们来一趟东北也不容易,现在7号高炉马上出铁了,7号高炉2500立方米,是全国最大的高炉,我现在带你们参观一下出铁,回来后,我帮你们购买返回的车票。其实,在钢铁厂工作,对出铁早已司空见惯,但出于对主人的尊重,我们只好客随主便,去参观了7号高炉出铁。

通过到厂区参观,拉近了和刘部长之间的距离。回办公室后,我再次提出,蔡化楠的问题搞不清,我们不会草率收兵。刘部长看我态度坚决,就说,我很佩服你们认真负责的精神。这样吧,我再提供一个线索,你们去了解。听说钢研所的成所长是蔡化楠的校友,当年他也在炼铁厂工作过,或许他能知情。万一不行,你们回去路过北京时,到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找一下蔡博。蔡博是蔡和森的儿子,蔡畅的侄儿。他在苏联留学时学炼铁专业,回国后,分到我厂工作,不久便提为厂长。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说了一些真话,被打成右倾分子,又被调出我厂,那才叫冤呢。我估计,他的问题这次肯定能平反。如果他对蔡化楠的问题说不清,那就没办法了。

告别刘部长,我们到钢研所找到了成所长,成所长说,我和蔡化楠是校友,他当年背处分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情。我建议你们去找一下当年炼铁厂的一位副厂长,他现在退休在家,或许能知道内情。

我们按成所长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那位退休的副厂长。当时他正在楼前的大树下乘凉。我们说明了来意,结果一问三不知。正巧过来了一位老工人,知道了我们的来意说,他现在80多岁了,自己吃饭了没有都记不清楚,哪能记起以前的事。建议你们去找矿山公司的杨书记,他当年是炼铁厂的组织部部长,或许他能说清楚。

我们谢过那位老工人,到矿山公司找到了杨书记。杨书记一听我们是从酒钢而来,激动地说,你们肯定是为蔡化楠的事来的。我大吃一惊说,杨书记还没有看介绍信,怎么知道我们是为蔡化楠的事来的?杨书记感慨地说,唉!我当干部几十年,一向小心谨慎,唯独有一件缺德事,就是1958年坑害了蔡化楠。虽说对蔡化楠的处理是党委集体讨论通过的,但我要负主要责任。每当想起这事,晚上就睡不好觉。平反冤假错案以来,我到处打听蔡化楠的下落。有人说,蔡化楠在酒钢。所以你们一说是酒钢来的,我就猜到是为蔡化楠而来。你们找我找对了,要是别人,谁都对蔡化楠的事说不清。

接着,他就讲起了蔡化楠背处分的过程: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时,冶金部下通知,部里举办一个学习班,要求各钢厂派技术权威参加,为全国大炼钢铁,完成1070万吨钢建言献策。蔡化楠是我厂技术尖子,就把他派去了。在学习期间,部里组织他们去参观北京郊区的沙河铁厂,学习小土群、大洋群两条腿走路的经验。回到部里,举行了座谈会,让学员发表参观感想。蔡化楠在会上说,小土群炼铁违背客观规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座谈会后部领导让学员们填表,把会上发言的内容如实填上,说是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学习班结束后,蔡化楠乘火车回到了鞍山。刚一下车,就有很多人来接站。一出站台,就把他押上卡车,回到厂里便开批斗会。蔡化楠被搞得晕头转向,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批判他的人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还装什么蒜。蔡化楠辩解说,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又是共产党员,**(下转66页)**

盲从与利益考量

——读《我们忏悔》

○　陶东风

王克明、宋晓明主编的《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由数十名文革等政治运动亲历者的忏悔回忆录组成,兼备为自己作传的自传性和为时代作证的见证性。书中以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出生的作者最为集中,多为"老三届"中学生,只有个别作者出生于30年代,超过70岁。书名"我们忏悔"已经充分表明本书的特点,就是回忆、反思、忏悔的三位一体,追忆者角色和思考者角色的高度统一,"我"既是回忆主体,同时也是反思主体:今日追忆和叙述之"我"反思、审判昨日行为言说之"我"。回忆、忏悔和反思的是自己的过失甚至罪行。

不能独立思考还是放弃独立思考?

各种政治运动的参与者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盲目跟风,对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声音,以及主流媒体说的一切,盲目听从和追随。在解释这些现象的时候,多数人常常归之于洗脑的结果。也就是说,红卫兵之所以没有独立反思的能力,是因为除了革命文化以外没有别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不能独立思考的原因是知识性的缺憾,而不是道德的缺憾。盲从源于真诚地相信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但本书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盲从,这就是由于道德或人格缺憾造成的盲从。他们即使具有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但是因为利益考量,缺乏说出真理的胆量和勇气,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违心地说谎、跟风,批斗自己知道的好人。后一种盲从实际上是犬儒、投机,而不是愚忠、狂热。文革时期有大量的盲从属于此类。大多数回忆录很少谈这种利益和畏惧驱动的盲从,本书提供了例证。

赵遐秋《跟风整人的忏悔》(第41~50页)是书中唯一一篇回忆自己的反右经历的文字。1957年反右期间,北大中文系学生赵遐秋是班里的团支书,正在准备入党。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的第二天,班级党小组开会批判邵家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由赵主持。赵觉得邵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不管是否过激,动机是好的,因此发言不积极。做总结时也是轻描淡写,并未上纲上线,结果受到党小组长义正词严的警告,说她的总结"语气平平","没有战斗性"(第43页)。第二天,赵又受到牛某更严厉的警告,并把问题提高到"相不相信毛主席""相不相信党"的吓人高度。这给了赵"当头一棒",使她"后怕了起来"。"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的确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要绝对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毛主席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两意。"(第44页)很明显,赵遐秋与其说是被说服了,不如说是被吓倒了,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怀疑:"我必须给自己下一个死规矩,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第44页)经过这样的思维转换,批判邵家基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第44页)

如果说赵遐秋对权力的恐惧是她放弃独立思考的直接原因,那么,利益就是间接的或根本的原因。赵对"组织"的畏惧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她要求"积极上进"。果然,转变立场和思考方式之后,她的表现终于得到肯定,1958年如愿入党。抚今追昔,赵遐秋感叹:"反右派斗争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从表层看,那就是永远和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的指示,我严严地关上了那智慧的大门。"(第45页)值得注

意的恰恰是：这个“智慧的大门”是被作者自己有意识地关闭的，她不是不能想或无能力想，而是“不敢想”。

赵遐秋记叙的第二件事是关于彭德怀案的。组织上传达了庐山会议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决议后，赵遐秋本来怀疑其正确性，心中的疑问“像水里的葫芦瓢一样，按下了这个，那个又冒了出来”。“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立刻警觉了起来——这是毛主席亲口下的指令，是党中央的决议，应该相信，必须相信！”“有了反右的‘教训’，我不敢说出内心深处的困惑。”（第46页）说到底，还是“不敢”。

更有意思的是，庐山会议后赵遐秋下放到京郊平谷胡庄，农村极度贫困的现实使得赵遐秋认识到：自己参与反右倾运动，批判同学高永波和邢志恒是错误的：“胡庄农民的极度贫困，自己的饥饿感受，一下子轰毁了我对三面红旗的信念。”那一刻，她想起了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我不再困惑了，不再犹豫了，我否定了我盲目相信的这一切。我后悔莫及”。（第49页）但就在这个时刻，恐惧再次袭来，“我又害怕了起来，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不是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犯吗？那是‘前车之鉴’，我该怎么办？——我胆怯了。”于是再次说了拥护反右倾的“套话、假话”。（第49页）这个例子说明，即使不掌握独立的思想体系和知识，只要具有基本认识能力，仍然能够基于经验而发现极“左”意识形态的荒谬。但是由于缺乏坚持的勇气，最后她仍然选择了放弃独立思考。

赵遐秋是诚实的，她坦率地承认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政治前途”不能仅仅理解为仕途的升迁，而且关系到能不能保住生命。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政治立场不仅决定仕途，而且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不但不可能得到升迁，而且还会失去自由，失去生命需要的基本物质资料，直至失去生命。毕竟不说真话毋宁死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个过高的道德要求。虽然历次运动中很多人的盲从不乏真诚，但这种真诚的盲从者肯定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很多人，特别是曾经盲从、跟风的知识分子，夸大自己盲从的真诚无知的一面，而避讳其利益考量的一面，犬儒和投机的一面，大概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君子耻于言利”的心理在作祟。好像无心之失总比有意犯错要光明正大一些。但这样做的后果，夸大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洗脑的力量，低估了其对物质、经济、政治资源的垄断意义，看不到这种垄断才是极权主义统治得以维持的根本保证。“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大饥荒爆发后暴露无遗。但由于权力垄断了生命得以维持的物质资源，便很少有人敢于指出其荒谬性，更不要说纠正它了。

今天获取反思的思想和知识资源已经比以前远为容易，因为无知而盲目跟风者已经越来越少，绝大多数是投机分子和犬儒之辈。如果权力依然牢牢控制着人们的生存资源，意识形态与人们基本生存的联系依然不能被打破，说真话仍要付出高昂的生存代价，那么，大多数人仍然会选择说假话。

打人的另一面

文革中，一方面打砸抢被冠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堂皇理由，一方面又随意得如同儿戏，对于那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乃至小学生而言，“继续革命”或许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吸引力在于：革命给了他们释放兽性的最佳借口。

刘伯勤《我的文革经历》反思自己文革时期打老师的恶行时，分析到了自己少时的顽劣，指出“恶作剧是孩童顽皮的特征”。而文革充分释放了这种“人性之恶”。（第127页）他写到周志俊先生是著名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曾担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初他家被抄后，卧室窗玻璃破了一角，糊上了报纸。刘伯勤曾好几个夜晚和伙伴一起，用缝纫机线轴绑上皮筋做弹弓打破其窗玻璃，并感到“乐不可支”。（第127页）对于

苏军的性暴行与斯大林的态度

○　李建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和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由于民族性格和军队素质的不同，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的主要参战国中，军人的强奸犯罪记录大有不同。英军的素质最高，“无论在私人回忆，还是历史档案记载，涉及到英军士兵个体强奸平民的记录都比较罕见，而英军集体性的性放纵记录更是闻所未闻。”（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第308页）同样，进入印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也军纪严明，未见有性犯罪的记录，不负仁义之师的令名。与英国军队和中国军队相比，美军的牛仔们就显得有些粗野：“史料记载，在美军在德国境内长驱直入的1945年3月到4月间，美军军事法庭在160万驻德士兵中共审理了487起强奸个案，犯罪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纳粹军队虽然残暴成性，但是，据“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提供的信息：“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这不单单因为他们有“重视荣誉的传统”，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会造成“种族异化”，害怕“性病影响战斗力”。（同前，第309页）

在“二战”中，军人强奸犯罪极其严重和恶劣的，是日本的法西斯军队。由于受到高级指挥官的纵容，日军就像一群穷凶极恶的野兽，歇斯底里地对占领国的平民百姓施暴。他们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所犯下的强奸罪行，人神共愤，罄竹难书。另一个犯有严重强奸罪行的是苏联军队。

少不更事的刘伯勤而言，不知道多少阶级斗争理论，更不可能基于亲身经历对阶级敌人有刻骨仇恨。这种打人的快乐更像是一种恶作剧。是人的低级本能的释放，它给人的不是美感享受，而是施虐的快感。如果一切束缚制约人作恶的规则统统失效，那么，人就会变成野兽。文明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法律和教化抑制和驯化这种本能，而文革恰恰无度地释放了这种本能。红卫兵的年龄特征和生理、心理特征，可以解释为什么是他们打砸抢最积极。

因此，在分析文革暴力现象的时候，不能仅仅把打砸抢行为理解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做出的自觉选择。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那些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参与打砸抢的积极性：他们的革命觉悟哪里来的？他们看了多少马、列、毛的书？受过多少“阶级斗争”教育？即使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估计很多初中生和小学生也没有完整读过。事实的真相或许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或许只是激发打人者本能的一个契机，是满足其动物性快感的借口。正如高宜在《最黑暗的夜晚》中写到的：“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第54页）据其回忆，1966年5月，天天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很是无聊，“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第54页）这个时候传来参加三个月军训的消息，“我们正烦得要命，忍无可忍，参加军训，还能参加实弹射击，这个消息简直是天大的喜事。”（第54页）。孰料由工作组安排的军训匆匆结束，学生们被召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作者这样分析当时的心理：“年轻的人，渴望热闹，渴望打破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平静”，“我们要革命，要造反，要冲出教室，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高声的呐喊，激动人心的语言，字字冲击着我们年幼而欢喜热闹的心灵。”（第55页）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这个方面也不应当忽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丁　东）

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通过远东大审判的揭露，世人知之甚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苏军的强奸犯罪，人们至今仍然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深入的反思："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过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同前，第312页）

一

二战期间，在德军的"闪电战"攻击下，苏联军队一开始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后来，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军事援助与配合下，苏军才转败为胜，攻入柏林，占领了德国，并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了法国、捷克、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中国等欧洲和亚洲国家。

苏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同样需要正视的是，在许多国家，苏军军纪涣散，抢劫，奸淫，给所在国的居民带来极大的恐慌，而大规模的强奸，则给成千上万的妇女造成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据英国学者杰弗里·罗伯茨说："……相当一部分红军士兵的暴行和抢掠也给红军胜利进军柏林蒙上阴影。红军强暴行为的数量之多尤其令人震惊。对于这种罪行，人们的估计从几万到百万出头不等。真实的数字可能介于两者之间，而绝大多数的强暴行为都是发生在大柏林市，因为这座城市到1945年的时候基本上只剩下妇女了。大规模强暴的受害者不仅是柏林人。在维也纳发生的强暴行为可能多达7万~10万起。在匈牙利，估计有5万~20万起。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被解放的国家，都有妇女遭到红军士兵的强暴，只是数量要少很多。"（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第362~363页）可见，苏军对妇女的强暴行为，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而是在长时段、多地域发生的普遍现象。

旅德学者朱维毅博士通过访谈、查阅资料等方式，叙述了苏军在德国的大规模的强奸犯罪行为，详细记录了普通德国居民尤其是妇女所遭受的侵犯、凌辱和伤害。一位脱下军装的德国士兵斯奥莫回忆说：苏军进入柏林，经常将居民集合到一起，然后收走所有人胳膊上的手表。苏军士兵劫掠手表之事，甚至见之于那幅著名的将红旗插上帝国大厦的摄影镜头中的一个细节：举着红旗的苏军士兵阿卜杜勒哈基姆·伊斯梅洛夫竟然两只手腕上都戴着手表。后来，拍摄这幅照片的塔斯社记者哈尔捷伊接到了修改照片的命令，要他把旗手右手上的手表修改掉（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第306~307页）。

在罗塞尔市一家医院里工作的阿诺特尼登楚博士，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苏联人献出手表和烈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苏联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苏联人大怒，用脚狠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脱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苏联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苏联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苏联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我相信，只有很少的苏联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同前，第314~315页）一位叫兹策威茨的受害女性在回忆录《大逃亡》中写道："苏联人要把女人们都带走，其中也有我的母亲。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套间，他们把母亲往里扯，我们四个孩子一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后，结果他们就当着我们的面把母亲强奸了。为了确保我们不叫喊，苏联

人多次朝天开枪吓唬我们,那枪口喷出的火焰至今好像还在我的眼前闪烁……”(同前,第316页)苏军甚至不放过儿童。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哈纳罗荷·科尔也曾遭受过苏军的强奸,那年她才12岁。苏军的强奸甚至到了不顾“阶级友爱”的程度。他们竟然极其放肆地强奸了一位配合苏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市长的母亲:“马茨考夫斯基是德共党员,蹲过纳粹的监狱,曾对苏军的到来充满期盼。苏军占领东普鲁士后,在柯尼斯堡市指定了一批德共党员来管理城市,马茨考夫斯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市长。上任后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并无管理的实权,他甚至不能约束苏军普通士兵的强奸行为。他曾经尽其所能去帮助当地的妇女免遭‘苏联同志’的蹂躏,但最终却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保护。1945年的圣诞,他的老母亲惨死于苏军士兵的强奸。”(同前,第318页)

迄今为止,调查最为深入的,是德国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桑德和作家焦尔博士。他们的调查工作耗时5年,采访了许多受到苏军性侵害的女性,甚至设法接触了一些当年的苏军士兵。除此之外,他们还查阅了大量的日记、传记、文献以及医院档案。在此基础上,他们给出了一组数字结论:“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约190万妇女遭到了苏军士兵的强奸,其中140万人受害于在德国东部的逃亡途中,50万人受害于后来的苏军占领区。苏军占领柏林后,共计190万柏林妇女遭到了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一万人被强奸致死。……把以上数字加在一起,被苏军强奸的德国妇女合计约200万人。这个数字被联邦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的历史统计资料所证实,美国历史学家奈马克教授在《俄国人在德国》一书中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至于在苏台德地区、奥地利以及东南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住区里有多少德意志妇女遭受了强奸,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同前,第316页)还有十几万女性被苏军士兵强奸后残忍地杀害,单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忍受苏军暴行而自杀。

苏联随军作家格罗斯曼记述了一个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在一家农舍不停地被人强奸,她的亲戚都来恳求士兵们让她休息一下给孩子哺乳,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哭。这一切都发生在指挥部附近,而那些视而不见的军官们本应负责维持好纪律。”(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54页)甚至,连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未能幸免。那些左翼派别的德共人员,走出来欢迎占领威丁区的苏军部队指挥官,并出示自己隐藏多年的“党员证”:“他们主动让自己的妻女来帮助苏军洗衣服做饭。不过,据一名法国战俘称,这支部队的军官们就在‘当天晚上’强奸了她们。”(同前,第290页)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苏联红军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放过。许多被纳粹抓到德国的苏联妇女,终于盼来了解放她们的红军,可是,红军却像强奸德国妇女一样粗暴地强奸了她们:“这些妇女感到恐惧、沮丧和极度的不满,其中一名叫玛利亚·沙波瓦尔的人说:‘我整日整夜地盼望红军的到来,我在等待解放,而现在我们的士兵对我们比德国人还差,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另一个名叫克拉夫杰伊马·拉先科的妇女说道:‘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艰难的,而现在我一样感到很痛苦。这不是解放,他们对我们太差了,不停地在我们身上做着可怕的事情。’”(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87页)出生于1926年的19岁的叶娃·施图尔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可是,当她哭着告诉一个高级军官她的父兄也在红军里的时候,却遭到了他的毒打和强奸。这让她痛不欲生。(同前,第88页)

二

苏军在盟友国家也同样进行严重的抢劫、强奸和滥杀女性的犯罪。

1944年秋天,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解放了贝尔格莱德,随即就发生了“成批的红军战士危害南斯拉夫公民和军人的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些严重的事件为数之多,使南斯拉夫新政府和共产党不能不视其为政治问题”,而几乎同时进入南斯拉夫的英国军队,则“没有那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为了遏制这种野蛮的行为,铁托“用非常和缓的、很有礼貌的形式”向苏联的军事代表科尔涅也夫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科尔

涅也夫却“用粗暴和侮辱的方式表示拒绝”,大喊大叫地说:“我代表苏联政府抗议对红军的这种造谣和中伤……”(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66~67页)事实上,根据南斯拉夫公民的反映,苏联红军进来没多久,“共发生了一百二十一起强奸行为,其中有一百一十一起是强奸后还杀了人,此外,还有一千二百零四起抢劫并伤人事件发生。”(同前,第68页)时为南共领导人的米洛凡·吉拉斯激愤地说:“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不能对强奸我国的妇女(而且我从来把这些行为看成是最卑鄙的罪行之一),侮辱我们的战士和抢劫我们的财产无动于衷,保持沉默。”他因此被苏联代表诬蔑为“托派”。1944—1945年冬天,吉拉斯随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在招待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宴会上,斯大林发飙了。他颟顸而失态地数落了吉拉斯一通:“他泪痕满面地喊道:‘这样的军队却受到了吉拉斯的辱骂!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我是如此热情地接待了他!我们的军队为了你们不惜流血牺牲!吉拉斯本人是作家,可是他是否了解什么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感情?难道他能了解一个经过几千公里浴血战斗的战士的心吗?如果这样的战士和妇女逛一逛,或者拿走了某一件小东西,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不断地举杯,奉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开玩笑,和第三种人寻开心,嘲笑他们一下;他和我的妻子接吻,因为她是塞尔维亚人。然后,他又为红军所受的艰难困苦得不到南斯拉夫人的感激而流了泪。……他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但过多地提到斯拉夫人、斯拉夫民族、苏联人同南斯拉夫人的联系,最后还是回到红军的英雄主义、苦难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的话题上来。”(同前,第73页)

1945年4月,为了签订苏南两国的同盟条约,吉拉斯再次来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依然不能谅解他,很长时间里,与他不交一言。直到有一天,在斯大林的别墅里,等到气氛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斯大林才觉得可以结束与吉拉斯的“争执”了。他倒了一杯白酒,半开玩笑地建议吉拉斯为红军干杯,而吉拉斯则错会了他的意图,建议为斯大林干杯。斯大林笑着用考验的眼光看着吉拉斯说:“不必,不必,还是为红军干杯!为什么?您难道不愿意为红军干杯吗?”吉拉斯喝了酒。斯大林这才问他在南斯拉夫“出了些什么事”,就在吉拉斯解释的过程中,斯大林打断了他:“是的。您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吗?您看到人的灵魂和心理状态是多么复杂吗?您想一想,一个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战友和最好的朋友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对周围事态怎么会是正常的呢?在如此可怕的战争之后,他和妇女玩一玩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把红军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军队,就是红军里没有那些刑事犯的话(这些刑事犯是我们让他们参军的),红军也不会是理想化的军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少校飞行员戏弄了一个女人,出来一位工程师,这位骑士要保护这位女人。少校拿起了手枪,喊着说:‘你这个后方的老鼠!’就一枪把这位骑士——工程师打死了。少校被判了死刑。此事交到我这里,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战时我作为最高统帅有权过问这类事情,我释放了少校,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他现在是一位英雄。必须懂得战士的心情。是的,红军不是理想化的军队。但重要的是,它应该打击德军,而且打得很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同前,第85~86页)

1945年3月,斯大林也曾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苏代表团讲过类似的话:“大家都在赞扬我们红军,是的,它应该得到这样的赞扬。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客人将来不会对红军感到失望。问题在于,红军现在有将近1200万人。这些人远远不是天使。战争已经使得这些人的心肠变硬了。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战斗中跋涉了2000公里,从斯大林格勒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中部。他们一路上见到了太多的让他们悲伤的事情,见到了太多的暴行。因此,如果我们的人在你们的国家行为不当,不要感到奇怪。我们知道,有些没有什么头脑的士兵的行为是丢人的,他们纠缠并侮辱姑娘和妇女。让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现在就知道这一点,这样他们对红军的赞扬就不会变成失望了。”(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第363页)斯大林的解释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甚至隐隐然流露出故意纵容红军的隐秘心理。红军固然不是天使,但也不是魔鬼。既然知道他们的“心肠变硬了”,那就

要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和有效的纪律制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使他们不丧失高贵的人性，不丧失革命军人的教养和无产阶级解放者的荣誉感，不辜负那些被解放的“阶级兄弟”的期待和“赞扬”，不要让那些尊敬他们的人“失望”。苏军如此大规模地抢劫和强奸，斯大林明明知道，却利口捷给，巧言曲辩。

三

如同在欧洲的苏军一样，1945年8月进入中国的苏联军队，也同样抢劫、强奸，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和妇女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抗战胜利后，刘顺元先被东北局分配到辽东省委任副书记。不久，因为需要加强苏军管制的旅大地区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在从安东到旅大的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索！’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刘顺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空降旅大，当地曾经出现万人空巷欢迎苏军的热烈场面。但是群众的欢乐情绪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些苏联士兵，看到年轻的中国妇女，便要动手动脚，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猥亵活动。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不断发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渐另眼相看；苏军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上的百吨塔吊也不放过，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刘顺元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过苏军的纪律问题。苏军司令部也像模像样地进行过一些整顿。但是这批苏军的某些恶习并未因这种整顿而根本改变。”（丁群：《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

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在一次“轻松的探讨”中，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这次，斯大林没有像对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那样发火，而是表示了“歉意”。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作为事后诸葛亮，我认为我们当时太傻了。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很大伤害，东北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大量牛羊等牲畜。斯大林既承认苏军的劣迹并道了歉，如果我们趁势索赔，是完全办得到的，然而根本没有提索赔问题。我们总是以中国人的邻里关系想问题，认为他应该主动给我们，殊不知人家到手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岂能拱手让人？！以致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我们反而‘偿还’了许多冤枉债！”（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07页）

苏军进入东北的70多年后，作家龙应台专程到东北，采访了那些知情者，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苏军强奸中国妇女暴行的细节：“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齐，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你听说过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这个人吗？……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〇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

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然后女人变成尸体……”（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95～196页）

段洣恒曾经叙述其父段苏权将军1945年的经历，“8月24日中午，苏军派库兹涅佐夫上校乘车从张北来到张家口，向我军表示祝贺。交谈中，段苏权依照中央指示，向苏方通报敌情、我情，拟配合苏军火速南下，直取北平、天津、保定，并告知平绥路两侧都是根据地。库兹涅佐夫解释说，他们上级有规定，部队不能越过外长城。段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中央，事后才知道，这是《雅尔塔协议》的一部分。段请他吃了饭，并把在宣化洋河南救治的一名跳伞飞行员交还给他。库氏挑了不少吃的、用的东西，汽车上堆得满满的。他又提出要女人，段说八路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事使不得，库氏才悻悻地走了。”（段洣恒：《1945年中苏军队会晤的一些情况》，《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这个细节就不能不让人思考，苏军的性暴行仅仅是一些官兵的自发行为，还是军队的组织行为？

总体来看，关于苏军强奸和伤害中国女性的记录，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对知情者的访谈，没有深入的调查，没有要可靠的档案资料，就连龙应台等人所做的这种简单的采访和描述，也难得一见。血流了，泪流了，人死了，但是，时间的尘土遮蔽了这可怕的惨象，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四

斯大林对苏军在被占领国家的强奸犯罪行为是知情的。在苏联，没有什么事情能瞒过斯大林。正像他从吉拉斯那里知道了苏军在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从来自前线的报告中，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苏军正在如何伤害无辜的德国妇女。斯大林和贝利亚从一份报告中得知：“‘许多德国人说，所有留在东普鲁士的妇女都惨遭红军士兵强奸。’报告还列举了许多红军士兵轮奸德国妇女的例证——‘不满十八岁的少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妇都包括在内。’报告还说：‘跟随第43集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员发现，留在斯普雷滕的妇女都不顾一切地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委员们审问了其中一个名叫艾玛·科恩的女子，她说：‘红军在2月3日进入这个城市。他们进入了我们躲藏的地下掩体，用枪指着我和另外两个女人，命令我们到院子里去。在那里，我被十二个士兵轮奸。其他的士兵也对另外两个人干了同样的事情。第二天晚上，来了三个士兵，2月6日，来了八个，他们对我们施暴并且打了我们。’三天后，这几个妇女试图割脉了结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命，但显然她们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页）显然，这份报告的提供者希望所汇报的事情能够引起斯大林的重视，期待他作为最高统帅能积极地回应和处置。

然而，尽管有着绝对有效的控制力，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制止苏军的暴行。苏联的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在他的著作中，尖锐地批评斯大林“丧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质”：“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仁慈为何物，他丝毫不理解什么叫善良。”（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5月，第431页）至少，在处置军人大规模的暴力强奸问题的时候，他确实缺乏对无辜妇女的同情心和仁慈态度。他以默许的方式，放纵自己的军队。不仅如此，由于他的许可和纵容，“红军对待妇女的方式已变为公然占有，尤其是在斯大林允许军官拥有一名‘战争妻子’以后，这些年轻的妇女被高级军官选为情妇，他们通常在司令部做发报员、秘书或医生——她们戴着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檐帽。”（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页）事实上，这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有组织的强奸行为罢了。

斯大林甚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苏军士兵的“强奸”行为进行批评。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伏龙芝军校给军官们授课时，谴责了红军在东普鲁士的抢劫和破坏行为，并将这归咎于部队文化水平的低下。但是，当他唯一一次提到强奸时，却说“苏联士兵无法拒绝德国妇女对他们的敬意”。尽管如此，斯大林听到了关于此事的报告，还是很不高兴，认为爱伦堡的思想和言论“在政治上十分有害”（同前，第160～161页）。

事实上,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纵容苏军大规模的强奸犯罪,与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意识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的。

斯大林自己就不怎么尊敬女性。即使在小他23岁的妻子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面前,他也经常“说一些难堪的笑话和流露出丑陋的表情,使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都难以忍受。他感到这种行为使自己受了侮辱而他却得到了明显的满足,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在有人来吃午饭或晚宴时。阿里卢耶娃的烦恼自然引起了斯大林粗暴的反击。每当喝醉酒时,他就用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骂她。……警卫员们都很喜欢她那平易近人的性格。他们经常看见她一个人暗自哭泣。”(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秘闻》,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205页)1931年夏天,她终于忍无可忍,与斯大林吵了起来:“你是个虐待狂,你算个什么人!你折磨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你折磨所有的人。”(同前,第208页)在女儿的回忆中,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也是“不幸、幻灭和抑郁的”,“她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斯维特拉娜·阿里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1980年9月,第132页)。1932年11月,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死于枪杀,射中心脏部位,年仅30岁。

在一个性质特殊的社会里,元首的意识和人格,会极大地影响全社会的心理和行为。由于缺乏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斯大林漠然地忽视了女性在战争状态下可能面临的危险,忽视了她们可能受到的伤害,所以,也就没有制止苏军的抢劫和强奸暴行。

今年是人类战胜法西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七十周年。历史已经宣告,取得胜利的同盟国一方代表了正义,最终失败的轴心国一方代表了邪恶,这是不容颠覆的基本结论。在坚持这个基本结论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对某些战胜国违背人类文明和尊严的丑恶现象,也不能回避,而应当认真地清理和反思。

2015年5月20日,北京平西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丁 东)

欢迎订阅2016年《炎黄春秋》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老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资深的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订阅方式:

1、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82—507

2、直接向本社汇款邮购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　话:(010)68532048　　传　真:(010)68522852

3、淘宝网在线订阅:https://yhcqwd.taobao.com/

每期定价:10.00 **元**　　**全年定价** 120 **元**

对《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的质疑和辩疑

2015年8月22日，王书瑶先生致信本刊，对2015年第8期蔡家麒先生的文章提出质疑。他在信中说：我的右派学友燕遯符给我打电话，说她在2015年第8期看到一篇蔡家麒先生写的“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其中颇多可疑之处。“蔡家麒先生说自己是北大历史系学生，如果他同陈洪生同班，那就是二年级学生，他竟然敢说北大‘五一九运动’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他写的，真叫人吓掉了眼镜！”“北大的五一九运动有数以千计的大字报，但是，第一张大字报却是非常醒目的，因为它是第一张，因此，它的作者是谁当时也就受到极大的关注，不可能没有结论，结论是：作者是历史系三年级团员学生许南亭。……当时就有人怀疑是不是许南亭受了民主党派的指使才贴大字报的，后来结论是查无此事。莫须有的。其后许南亭没有参加过其他右派活动，尽管他没有参加其他右派活动，他还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他被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为由，判了八年有期徒刑。……现在居然有人竟敢冒充说那篇大字报是他写的！蔡家麒算什么？从来没听说过。”

王书瑶先生的信在网上公布以后，蔡家麒先生于2015年9月9日也致信本刊：

贵刊2015年第8期刊登了我撰写的《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一文，该文原来的标题是《北大“五一九”第一张大字报及其他》，写于1999年。现在，我认为有必要将1957年5月19日仅署名我班“历史系55级二班一群团员和青年”的大字报形成的过程向读者说明。

那天是星期天，早上和我同寝室的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读到当天报纸报导北京召开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消息，以及记者访问清华大学代表的文章，遂提出我校的代表是谁的问题。我班班长张兰馨和宋建国（两人均为北京教育学院教授）为此事立即询问了我班团支书和系团总支等，都说不知道，在场的同学认为这事校方有关人员有不民主的官僚主义作风，来到30斋我住的寝室，提议写张质问校团委的大字报。为慎重起见，宋建国当即征求时任系团总支书记的顾德融（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和我班团支书殷瑞渊（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俩都不同意写大字报，后来又问半途进来的党支书我班的孙淼（北大历史系教授），他认为可以写，但用语不要太激烈。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把我从床上叫起，由于我的毛笔字被认为较好，推我执笔，我就在一大张粉红色的纸上将在场同学们的意见归纳成三个问题写成，于当天上午10时许张贴在北大大饭厅东墙右侧上方，是陈鸿生爬梯子张贴上去的。当天上午，我们没有见到或听到校园里于我们之前贴出过大字报的事。这张大字报贴出不久，校内有人称赞我们这张大字报是“拓荒者”，我们表态不接受这个赞誉。当天参与第一张大字报的除上面提到的同学还有张学仁（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吴家林（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张健之（已故）和陈鸿生（已故）等。凡是健在的同学都可以为此事作证。

拙文叙述完第一张大字报的出台后，接着写出我所在的历史系二年级四位同学的不幸遭遇，其中一班的沈元和三班的杨秉功均未参与本班大字报事项。拙文显然不是涉及北大“五一九”之后被错划成右派的所有同学的结局，因为我从未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不清楚这些受屈同学的情况，但刊物编辑改动了标题，才产生一些问题。当天上午我和本班同学贴完这张大字报后即返回中关村家中，这天相继贴出的大字报，我是在晚饭后返校才有所见闻。这些大字报先后张贴的时间等情况，因记忆不准确，拙文同实际情况不符，后经读者指正，深表感谢。

这件事距今已有五十八载，有的记忆不清了，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在十六年前撰写该文时，从未听说过当年5月19日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历史系三年级许南亭同学所写，只是在

近年有同班级的老同学在电话里告知，有人说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本系许南亭所为，我们都极感惊讶！宋建国（又名宋荐戈）为此事曾撰文《回忆“向科学进军”的岁月》，文中专门有一大段写了当年5月19日我班级的这张质问校团委大字报出台的详情，刊登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06年第1期上。近查“百度网”，出现北大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是许南亭的字样，校友王书瑶说我这篇文章是“造谣撒谎”。从网上得到的信息，不少人辗转相抄说，许的这张大字报也是质问校团委正在北京召开的“团三大”我校的代表是谁，怎么选出来的，内容同我班级写的大字报如出一辙，还说许的大字报也是集体署名“一群团员和青年”。事情竟有这般的巧合？再及，许的大字报说是贴在北大大饭厅东门右侧，我班级的大字报是贴在大饭厅东墙左侧上方，这里表述的“左侧”和“右侧”并不矛盾。因为大饭厅东门的右侧也就是众人面对东墙的左侧，大字报贴的方位是何其的一致，这又是一巧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呢？退一步说，如果许南亭贴出过北大当年第一张质问校团委的大字报，那么，他贴出的时间是问题的关键。网上有说是“5月19日中午”（王书瑶），有说“1957年5月19日下午5点左右”（陈奉孝），有说“1957年5月19日傍晚”（杜光），等等，众说纷纭。看来都是属于他们见到这张大字报的时间，不一定是大字报贴出的时间，这就需要当事人许南亭先生出来说出真相了。但许先生似乎一直未对此事发声，都是他人为他做嫁衣，不足为凭。我们始终不知道这条有关许南亭是北大当年第一张大字报的首创者的信息是何人在何时何处出于什么动机以讹传讹至今的，其中蹊跷之处颇多，确乎令人深感费解。我说过，这件事我们无意同谁争第一，只是当年历史的事实应该得到尊重。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把多年误传的事实予以澄清，还历史原来的面目，以正视听。

王书瑶对于我班级写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个事实之否定，拿不出任何证据，只说是“许南亭为了这张大字报蹲了八年监狱”。许冤坐八年大牢不假，究竟因为何“罪名”咱不清楚，如果仅仅是因为这张质问校团委的大字报坐了八年牢，我深表怀疑。当年为了团三大我校代表问题，校团委书记石幼珊承认这方面的工作有缺点，她还说，对于大字报既不提倡，也不阻止。校党委崔副书记曾为此辩解说（大意），北大八千团员我们不能搞人人选举。此言一出，被一些同学抓住，说崔将当时北大八千同学误说成八千团员，足见其官僚主义等。我班被错划右派的张学仁和陈鸿生两人曾参与过这张大字报事，但是，在多次组织批判他们的各种会上，从来没有人提及他们的“罪名”同这张大字报有关联，后来在整团时，参与大字报的团员同学（包括我）在接受批评帮助时，也无人提及过这方面的问题。王书瑶说我“冒名顶替篡改历史”，“轻轻松松”“堂而皇之”“自吹自擂”写出“造谣撒谎”的“荒谬文章”。按照他的这个逻辑，似乎只有坐过大牢者才有资格戴上北大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桂冠，好像这事的“专利”只能属于许南亭，已成定论！我现在郑重地说：许南亭根本没有写过这张大字报。

王书瑶说：“有的刊物在文章后面都注明此文的责任编辑是哪一位，但是《炎黄春秋》好像没这个习惯，所以我不知道此文的责任编辑是谁，但是，我敢肯定地说，这个责任编辑是极不负责的‘责任编辑’。”我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批评。现在我才悟出拙文被责编改动标题之缘故，作为局外人，他事先可能知道当年北大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一事同我的文章所言不一样，所以在我的标题上删去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六个字，是自有其道理的，刊登不同意见的文章，不仅没有错而且是必要的。王指责《炎黄春秋》杂志没有注明文章的责任编辑的习惯。拙文最末一行，明白无误地署名该文“责任编辑杜明明”，怎么说没有刊出责编的姓名呢？我们讨论问题，要紧的是根据事实拿出证据，即“言之有据，论之有理”，切不可一味主观行事，空谈空放，这往往是我们知识分子经常会出现的毛病，包括我自己，应多加注意克服。从最高学府北大出来的人，应有的文化素养是文明、自重，尊重别人，包括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

在此须指出我的文章有一个错误，将匿名信的收信人“卢郁文”误写成“卢绪章”，经读者指出，借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此外，文中有一笔误，当年北大贴出的大字报小说《阿O外传》，不是《阿Q外传》。■

（责任编辑　丁　东）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顾准追思录	罗银胜编	68.00	9.00
墙上春秋　大字报的兴衰	罗平汉	29.00	7.00
我的八十五年　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8.00	7.00
平生六记	曾彦修	35.00	6.00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美]格雷弗·弗著　马维先译	89.00	9.00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张聿温	68.00	9.00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光　李晓江译	88.00	10.00
一本书的历史　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金冲及	38.00	7.00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邓　野	38.00	7.00
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48.00	8.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9.00
潜规则	吴　思	28.00	7.00
我们忏悔	王克明　宋小明	48.00	8.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于光远	36.00	7.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38.00	7.00
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	张　化	39.00	7.00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邵燕祥	38.00	7.00
叶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　周锡瑞	58.00	8.00
一片冰心在玉壶　叶笃庄回忆录	叶笃庄	68.00	8.00
“四人帮”兴亡(全四卷)	叶永烈	198.00	20.00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口述　徐秀丽撰写	38.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苏采青	98.00	10.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38.00	7.00
独裁者手册	[美]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著	42.00	7.00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斯特　英格里德·宗塔格 著	59.00	9.00
大元帅斯大林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198.00	17.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98.00	11.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68.00	9.00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	伍宇星编译	39.80	7.00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吴庆彤	36.00	6.00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58.00	9.00
改革都有红利吗	雪　珥	38.00	7.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	46.00	7.00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　瀚	35.00	6.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32.00	6.00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列·姆列钦	56.00	9.00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冯筱才	38.00	7.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刘维开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十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314.00	43.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Ⅰ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Ⅱ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图书介绍

《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大字报滥觞于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1957年5月19日,富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贴出了这场运动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反右运动暴风雨来临之前,由于允许“大鸣大放”“香花”和“毒草”也就不免随着鸣放而产生。这本是正常现象。但由于中共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又采用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不少人怀着忠诚的进谏之心,利用大字报提意见和看法,结果等到“这是为什么?”的一声怒吼发出后,相当多的大字报作者成了“右派分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工具”的大字报,在反右运动中却成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武器。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年代,大字报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和冤案。有人因写一张“革命”大字报就飞黄腾达,而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许多人被大字报诬陷为“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打倒,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大字报在中国折腾了20余年。反思历史,减少未来道路的曲折,这是作者的希望所在。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二战后的四十年中,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和精英们竭力想保住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克里姆林宫把谋求加强苏联的实力放在首位,但也以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名义,建设并捍卫着自己的社会主义帝国。列宁主义思想的种种承诺写在苏联的旗帜上和党纲中,从斯大林到安德罗波夫的各位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精英们,对于自己采取的举措,总是要用意识形态的一套说辞来证明其合理性,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加以表述。

在美国宣布自己是自由世界反对苏联扩张的保证人后,苏美对抗从一开始就与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有关,鉴于美国对共产主义采取的遏制与逼退政策,斯大林试图用一连串越来越残忍的清洗来加强自己对苏苏联精英的绝对控制。尽管后来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但他也感到,在把苏式的共产主义制度作为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替代品在全球推销的时候,有必要证明,他能够洗去这种制度中的斯大林主义的罪恶。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以及勃列日涅夫之后的缓和政策,在苏联国内造成了第一次严重的分裂。

苏联的意识形态依旧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苏联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它非但不能起到动员作用,反而带来了虚伪、犬儒化和怀疑,在1968年对“布拉格之春”的残酷镇压之后,人们都开始把官方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仪式,这种仪式与他们的思想倾向完全是两码事儿。意识形态的教条仍然是管理国内政治言论和描述国内政治状况的工具。

戈尔巴乔夫是自斯大林以来第一位对意识形态与苏联安全利益的关系作出重大调整的苏联领导人。他没有照搬革命与帝国的范式,而是倡导自己的“新思维”,拒绝把武力作为强权政治的基本手段使用,哪怕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秩序。实质上,这位总书记最终更靠近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苏联的失败除了经济、政治和金融崩溃外,另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的退化。在斯大林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

苏联的帝国为何会失败?读过此书你将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人人出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媒体宣传 众筹出版 电子书运营 代理发行 排版设计 评职称出书

出书类型：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网上书店）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1. 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3000元，300页印刷100本4000元(以上费用不含排版、设计与彩页费用）。
2. 小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000元，300页印刷100本6000元（以上费用不含排版、封面设计与彩插）。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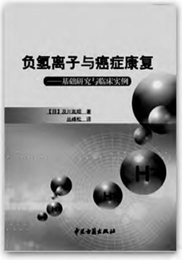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 “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国内出版作品展示



无书号出版作品展示

出版热线：010-58426176　57223540　57273434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录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　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　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五十本起编印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家史家谱、纪念册

一、定制出书：

2008年10月，本机构首创“定制型个人出书、家族出书”服务模式，作者把自己的手稿、笔记、日记、书信、老照片交给我们整理录入、编辑排版、设计出样、定稿印制，至今编印家谱传记五千余种，受到离退休老同志的由衷喜爱，三十多家中外媒体都有专题报道。

二、展览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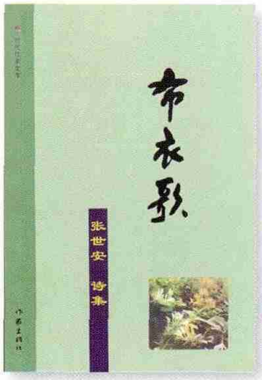
长期举办“百姓寻根、家风传承”展览讲座。展览部分：百家姓寻根手册、家谱族谱；百年家史、画册、纪念册；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讲座部分：个人出书座谈会，百年家史纪念会，姓氏移民文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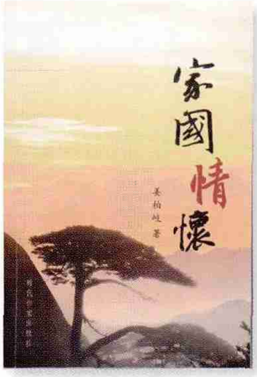
三、民间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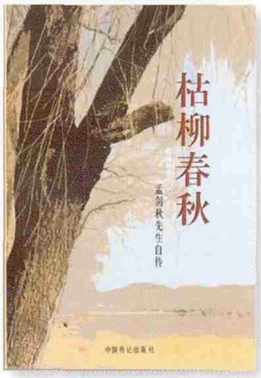
（一）民间记忆丛书：个人自传、百年家史，民间纪实、生动亲切，稍加整理、常编长销。愿与文化出版机构合作，选取精粹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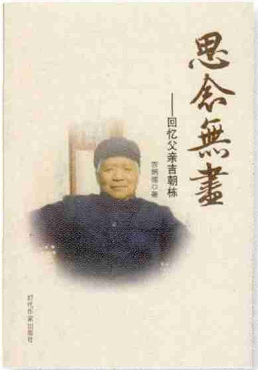
（二）民间记忆网站：民间记忆可分为地方记忆、年代记忆、身份记忆，又可按特定人物与事件分类，百年民间记忆，百姓家国情怀。五千多种家谱传记作为首批内容注入，三千多名作者自任版主，亲朋好友是自然粉丝，人人相传将蔚为大观！愿与趣味相投者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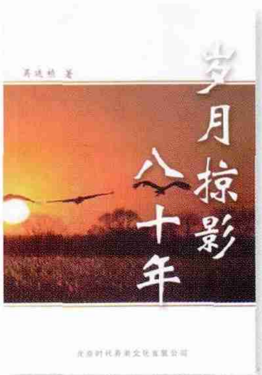
愿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愿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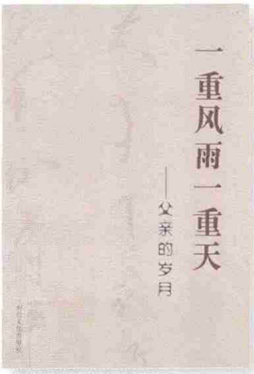












010-6892 0114、6252 5116

地址： 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楼”

单位：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文化网》www.jzwhw.net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2015年第10期

王猛与奥运会

曾彦修来信类抄

“八老”与1980年代政治格局

“红色词语”的勃兴和流变

邓小平“8·18”讲话的现实意义

《雪白血红》蒙难记

ISSN 1003-1170
1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10.00 元